



列 宁 斯大林

論 中 国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斯大林

# 論 中 国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列 宁 斯大林  
論 建 中 國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8 · 字數 174,000

1963年7月第1版

1965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559 定價（四）0.65元

印數 14,001—44,000

一 (略)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 .....	29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	33
斯大林：不要忘记东方 .....	36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民族生活报》第三号社論	
列宁論东方各族人民的觉醒 .....	39
——摘自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列 宁：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 .....	43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	
附录：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 补充提綱 .....	50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 大会通过	
列宁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压迫的加强和东方民族解放运 动的开始 .....	54
——摘自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八月七日《共产国际第 二次代表大会》第一部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 任务的报告(七月十九日)》	
列宁論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 .....	58
——摘自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八月七日《共产国际第 二次代表大会》第三部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员会的报 告(七月二十六日)》	
列宁論东方的一九〇五年 .....	64
——摘自一九二二年五月《〈真理报〉創刊十周年紀念》	
列宁論东方的民族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	66
——摘自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斯大林論十月革命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 .....	67
——摘自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和中間阶层問題》	

- 斯大林：俄共(布)中央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70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真理报》第六〇号
- 斯大林論民族問題的新阶段……………71  
——摘自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會議上的演說《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 斯大林論国际形势……………73  
——摘自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向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总结》
- 一 国际形势 ……………73
- 二 (略)
- 三 殖民地和附屬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 ……………74
- 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屬国所担負的任务……………77  
——摘自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說：《論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 斯大林論民族問題的实质为农民問題……………84  
——摘自一九二五年六月《再論民族問題》
-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摘录)……………88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 一 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摘自第一部分《国际形势》第二节)……………88
- 二 关于苏联宣傳的問題(摘自第一部分《国际形势》第六节《苏联的外部状况》)……………89
- 三 中国革命的力量(摘自第一部分《国际形势》第六节《苏联的外部状况》)……………91
- 斯大林：論中国革命的前途……………93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會議上的演說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 .....	93
二 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 .....	95
三 中国的革命军队 .....	96
四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	98
五 中国的农民問題 .....	100
六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	103
七 中国的青年問題 .....	104
八 几个結論 .....	104
斯大林論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事件 .....	106
——摘自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斯大林：給丘貢諾夫的信 .....	110
斯大林：中国革命問題 .....	112
——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給宣傳員的提綱（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真理报》第九〇号）	
一 中国革命的前途 .....	112
二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	113
三 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	115
四 反对派的錯誤 .....	117
斯大林論中国革命的几个問題 .....	120
——答馬尔秋林同志	
斯大林：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們 .....	126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真理报》第一二一号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談話 .....	128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第一个問題 .....	128
第二个問題 .....	130

---

第三个問題 .....	133
第四个問題 .....	137
第五个問題 .....	139
第六个問題 .....	141
第七个問題 .....	143
第八个問題 .....	144
第九个問題 .....	148
第十个問題 .....	149
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	151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 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說	
一 几个小問題 .....	151
二 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	154
三 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及与共产党人保持联 盟的武汉左派国民党 .....	161
四 論中国工农代表苏維埃 .....	163
五 两条路綫 .....	171
斯大林：时事問題簡評 .....	175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 論战争的威胁 .....	175
二 关于中国 .....	181
斯大林：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摘录） .....	207
——摘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監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說	
一 反对派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攻击 .....	207
二 关于中国 .....	209

- 
- 斯大林：关于中国問題…………… 232  
——摘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說
- 斯大林：关于反对派在中国三个問題上的政治面貌…………… 235  
——摘自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  
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會議上的演說节录：《俄  
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
-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238  
——为紀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七日《真理报》第二五五号）
- 斯大林論中国革命的重大成就…………… 247  
——摘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联共（布）第十  
五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十二月三日）



## 目 录

列 宁：中国的战争……………	1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火星报》第一号	
列 宁：关于中国革命……………	6
——摘自一九一二年一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 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列 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7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五日《涅瓦明星报》第一七号	
列 宁：新生的中国……………	14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八日《真理报》第一六三号	
列宁論亚洲是世界風暴的新泉源……………	16
——摘自一九一三年三月《馬克思学說的历史命运》	
列 宁：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	18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真理报》第六八号	
列 宁：亚洲的觉醒……………	20
——一九一三年五月七日《真理报》第一〇三号	
列 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22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八日《真理报》第一一三号	
列宁論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及其胜利 条件……………	24
——摘自一九一六年七月《論尤尼烏斯的小册子》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 (摘录)……………	29
——摘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和十九日《真理报》第二四一 号和第二五〇号	

## 列 宁

# 中国的战争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火星报》第一号

俄国正在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动员了好些军区，耗费了数亿卢布，派遣了几万名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次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的确，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勇敢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文化击败中国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使命”在远东的新成功。

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只是听不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觉悟工人的声音。但是，这次新的胜利征战的重担，完全是由劳动人民承担的，从他们中间抽了许多人到远方去。为了弥补庞大的开支，向他们征收了重税。那末，社会主义者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这次战争对谁有利呢？俄国政府的政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试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国政府首先想使人相信，它甚至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它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虽然是不宣而战，但是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因为战争毕竟是在进行。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

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瘋狂鎮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說，“这是由黄种人敌視白种人”，“中国人仇視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們之間并无冲突，他們是憎恶欧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来进行欺騙、掠夺和鎮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販卖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們嗎？欧洲各国資產階級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現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加了进去。我們通常把这种掠夺政策叫做殖民政策。凡是資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很发达、还多少保留着父权制特点的国家，它們可以向这里傾銷工业品，从中牟利。为了让一小撮資本家大发橫財，各資產階級政府进行了連年不断的战争，把士兵整团整团地开到有損健康的热带国家去送命，耗費了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錢財，使居民的起义風起云涌，使他們瀕于餓死的边緣。我們不妨回忆一下印度土著的抗英起义<sup>①</sup>和印度的饥荒，以及現在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sup>②</sup>。

欧洲資本家的貪婪的魔掌現在已經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現在却揚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

① 指在一八五七年开始的印度起义。这次起义带有民族解放的性质；于一八五九年被鎮压。——《列宁全集》編者注

② 英布战争（一八九九年十月——一九〇二年五月），其結果使南非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尔共和国和奥倫治共和国——淪为大不列顛的殖民地。——《列宁全集》編者注

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俄国专制政府在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二日给各国的照会中宣称：俄国军队占领牛庄并且开入满洲境内，乃是临时的措施；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由于必须击退中国叛乱者的侵略行动”；“绝对不能说明帝国政府有任何违反政策的自私计划”。

好一个可怜的帝国政府！它简直像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人们竟冤枉了它，简直太不公平了！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占据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包工头、工程师和军官集结在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不得不引起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在修筑中东铁路时，每天只付给中国工人10戈比的生活费，这难道还不是俄国毫无私心的表现吗？

但是，我国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实行这种狂妄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对谁有利呢？它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向亚洲市场倾销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定期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包工头有利（有些生产武器、军需品等等的工厂正在拼命地干，并且增雇成千的日工）。这种政策对一小撮身

居軍政要职的貴族有利。他們所以需要实行冒險政策，是因为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升官发财，建立“功勋”揚名于世。我国政府为了这一小撮資本家和狡猾的官吏的利益，竟断然牺牲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沙皇专制政府这一次也和往常一样，暴露出自己是甘願充当資本家大亨和貴族的奴才的昏官的政府。

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参战而破产，国債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稅加重，剝削工人的資本家的权力扩張，工人的生活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鬧饥荒——这就是对中国的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經带来的灾难。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不得到政府官吏的許可，它們就不敢登載任何东西，因此，在对中国的战争中人民付出了多少代价，我們沒有确切的材料，但是，这次战争的費用达好几万万卢布，这是沒有疑問的。有消息說，政府遵照一項沒有公布的指令，一次就撥出軍費 15,000 万卢布，而目前的战費开支每三四天就要耗掉 100 万卢布。政府大把大把地花錢，但是給饥餓的农民的救济金却一扣再扣，斤斤計較每一个戈比，不願意把錢用在国民教育上，它和一切富农一样，从官办工厂的工人和邮局小职员等的身上榨取血汗。

財政大臣維特曾經宣稱，截至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国庫尚存閑置現款 25,000 万卢布，但是現在这笔錢已經沒有了，都投入了战争，政府正在发行公債，增加捐稅，因財政拮据而縮減必要的开支，停止修筑铁路。沙皇政府虽然面临破产的危險，仍然拚命实行侵略政策，这不但需要大量資金，而且有卷入更可怕的战争的危險。进攻中国的欧洲列强，已經在分赃問題上爭吵起来了，誰也不能断定这次爭吵会怎样收場。

沙皇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不仅侵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竭力毒害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例如对犹太人的仇恨，卑鄙的报纸中伤犹太人，说犹太工人不像俄国工人那样受资本和警察政府的压迫。目前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还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钱袋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拚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中国人民也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那种苦难，他们遭受到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的压迫，遭受到侵入中国的资本的压迫。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从人民群众所处的那种政治上受压迫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更使人民破产，更使人民腐败和受压迫。沙皇政府不仅使我国人民变成奴隶，而且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如一八四九年，俄国军队曾镇压匈牙利革命）。它不仅帮助俄国资本家剥削本国工人，把工人的双手捆起来，使他们不能团结自卫，而且还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别国人民。要想打碎战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唯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迫使政府不光是照顾宫廷狗党的利益。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四卷第334—338页）

## 列 宁

# 关于中国革命

——摘自一九一二年一月《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  
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鉴于政府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论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利用中国发生革命运动的时机掀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叫嚣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代表会议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的行为。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七卷第 457 页）

## 列 宁

#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五日《涅瓦明星报》第一七号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一篇论文<sup>①</sup>（我們是从布魯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Le Peuple》<sup>②</sup>上轉載来的）使我們俄国人非常感兴趣。

俗話說，旁观者清。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旁观”者，因为他虽然是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但是显然完全不了解俄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这位已經爭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代表，在完全离开俄国、离开俄国經驗和俄国著作的情况下，向我們提出了純粹俄国的問題。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簡直像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議論。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他們在基本思想和許多看法上是完全相同的。

旁观者清。偉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綱領（孙中山的論文正是这样的綱領），迫使我們（同时也給了我們一个良好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現代资产阶級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

---

① 指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这篇文章的譯稿与列宁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涅瓦明星报》上。——譯者注

② 即《人民报》。——《列宁全集》編者注



主义的相互关系問題。这是俄国在从一九〇五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代面临的最重大問題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綱領中，特别是把这个綱領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問題，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問題。俄国在許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紀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

俄国资产階級民主派，从它的最早的和唯一的先驅者貴族赫尔岑起到它的群众性的代表——一九〇五年农民协会会员和一九〇六——一九一二年前三届杜馬的劳动团代表止，都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現在我們看到，中国资产階級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这里我們試就孙中山的例子来考察一下，目前已經完全卷入全世界資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思想的“社会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孙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認識到“种族”革命的不足，絲毫沒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問題，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剝削者，相信他們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們接触到的是真正偉大的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人們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总统比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资产階級的奴僕、走狗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階級則已經腐朽

透頂，从头到脚都沾滿了髒污和鮮血——不是皇帝們的鮮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的鮮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則早已拋棄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經彻头彻尾娼妓化了，已經完全把自己卖給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滿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個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拋棄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怎么？这是不是說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經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发出光輝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說，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又会有几万万人为爭取西方已經实现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經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經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还有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紀末叶的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动家的同志。

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凱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則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結而出卖民主派。

沒有真实的民主主义高潮，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

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潮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們創造奇迹。在孙中山綱領的每一句話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潮。

但是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願望結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傳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計劃結合在一起的。正是后面这两种政治思想傾向使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

这两种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們的意义如何？

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緒的蓬勃高漲，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爭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漲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們的压迫者及剝削者的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正在經歷这种高漲，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問題已經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問題。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們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們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們反对压迫群众和剝削群众。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五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剝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縛是他們受封建剝削的根源；这种剝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腦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

因此，这个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綱領，事实

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綱領，仅仅是消灭封建剝削的綱領。

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綱領以及他的所謂社会主义理論的实质就在这里。

从学理上来說，这个理論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論。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說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論，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正处于工业”（即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将大大发展”，“五十年后我国将出现許多个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主义財富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

試問，孙中山有沒有用自己反动的經濟理論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綱領呢？这是問題的全部关键所在，是最重要的一点，被截头去尾和被閹割的自由派假馬克思主义往往停留在这里。

沒有，——問題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辯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反动的理論，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論制定純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綱領！

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談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含糊的“經濟革命”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結果呢？

結果是：把地租轉交給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什么单一稅来实行土地国有。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經濟革命”，决不会带来其他实际的东西。

穷乡僻壤的地价与上海的地价的差别，是地租量上的差别。地价是资本主义化的地租。使“增加的”土地“价值”成为“人民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与洛贝尔图斯论战时非常清楚地发挥了这一点<sup>①</sup>。

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

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中，是什么经济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被人接受呢？这是因为必须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

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

---

<sup>①</sup> 指的是：（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九四一年俄文版第131—14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180—191页）；（2）马克思《资本论》一九五三年俄文版第三卷第662—686页（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1047—1062页）；（3）《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二卷第一册第192—202页（参见《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九五七年三联书店版第二卷第277—292页）。——《列宁全集》编者注

最迅速的发展。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各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民主主义，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是极其复杂的。这要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定。看来皇帝一定要把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保皇派变成自由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正在尽量启发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主动性和勇敢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八卷第 151—157 页）

## 列 宁

# 新生的中国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真理报》第一六三号

先进的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是不感兴趣的。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 $\frac{1}{4}$ 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

文明的欧洲却不加理会。直到现在，法兰西共和国甚至还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法国众议院内，不久将就这一点提出质询。

为什么欧洲这样冷淡呢？因为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已经腐烂了四分之三，准备为了取得对付工人的“严厉”办法或1卢布多赚5戈比利润而把自己的全部“文明”出卖给任何一个冒险家。在这个阶级眼里，中国不过是一块肥肉。现在，当俄国“亲密地拥抱了”蒙古以后，日本人、英国人、德国人等都想来争尝这块肥肉。

但是，中国还是日新月异地前进着。目前，正在开始选举国会——专制制度推翻以后的第一届国会。众议院将由600名议员组成，“参议院”将由274名议员组成。

采用的选举制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直接的。只有年满21岁、在选区内居住两年以上、缴纳2元左右的直接税或有500元左右财产的人才享有选举权。首先选出复选当选人，再由复选当选人选

举議員。

这样的选举制就已经說明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結成了联盟，而无产阶级沒有参加或者根本沒有力量。

中国政党的性质也表明了这种情况。主要的政党有三个：

(1)“激进社会”党。这个党实际上同我国的“人民社会党”和 $\frac{9}{10}$ 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絲毫沒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它的主要要求是：爭取全国的政治統一，“在社会方向下”(这种用語同我国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慣用的“劳动原則”和“平均制”一样含糊不清)发展工商业，维护和平。

(2)第二个政党是自由党。它与“激进社会”党联合，共同組成“国民党”。这个党很可能在中国第一屆国会中占多数。它的領袖就是人所共知的孙逸仙博士。現在他正忙于制訂大規模的铁路网計劃(告訴俄国民粹派：孙逸仙这样做是为了使中国“摆脱”资本主义的命运!)

(3)第三个政党叫做“共和派联盟”。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招搖撞騙的典型！事实上它是保守党，主要依靠中国北方也就是中国最落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資产者。“国民”党主要依靠中国工业較发展、較先进、較发达的南方。

“国民党”的主要支柱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它的一些領袖是曾在外国留学的知識分子。

农民民主派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使中国爭得了自由。沒有得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究竟能否坚持民主主义立場对付那些伺机向右轉的自由党人，——这在不久的将来便見分曉。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八卷第 395—396 頁)



## 列宁論亚洲是世界風暴的新泉源

——摘自一九一三年三月《馬克思学說的历史命运》

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拚命贊美“社会和平”，拚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風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風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現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們現在正处在这些風暴盛行及其“反轉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偉大的中华民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鏟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有些不注意群众斗爭准备条件和发展条件的人，看見欧洲反資本主义的决战长期迁延下去，就陷入失望和无政府主义的境地。現在我們看到，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失望是多么近視，多么懦弱。

八亿人民的亚洲已經投入实现欧洲的理想斗爭，从这个事实中所应吸取的不是失望，而是勇气。

亚洲各国革命同样向我們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卑鄙无耻、民主群众独立活动的特殊意义、无产階級与任何資产階級間的明显界限。有了欧亚两洲的經驗，誰若还說什么非階級的政治和非階級的社会主义，誰就只配关在籠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

欧洲也跟着亚洲行动起来了，不过不是按照亚洲的方式。一八七二——一九〇四年的“和平”时期已經一去不复返了。物价

的飞漲和托拉斯的压榨已使經濟斗争空前尖銳化，甚至使那些受自由主义腐化最深的英国工人也动作起来了。就是在德国这个最“頑固的”资产階級地主国家里，政治危机也在迅速成熟。狂热的軍备竞争和帝国主义政策，使得現代欧洲的“社会和平”活像一桶火药。一切资产階級政党解体与无产階級成熟的过程，是在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自馬克思主义出現以后，世界历史三大时代中的每一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階級学說获得更大的胜利。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八卷第 583—584 頁）

## 列 宁

# 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真理报》第六八号

大家知道，亚洲人民群众先进的民主派用极大的牺牲建立起来的伟大的中华民国，最近遭到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被认为是文明国家而事实上实行最反动政策的六“大”强国，成立了银行团，一致停止借款给中国！

问题在于，中国革命在欧洲资产阶级中间所引起的不是对自由和民主事业的热忱（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有这种感情，赚钱自肥的骑士是不会有这种感情的），而是对掠夺中国、开始瓜分中国、攫取中国领土的欲望。六个强国（英、法、俄、德、日、美）的“银行团”力图使中国破产，以便削弱和破坏共和国。

这个得到全世界劳动群众同情的年轻共和国的巨大胜利，就是这个黑帮银行团的瓦解。美国总统宣称：美国政府将不再支持这个银行团，它在最近的将来要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现在美国各银行都退出银行团了。美国现在正给予中国十分必要的财政援助，它正在为美国资本开辟中国市场，促进中国的改良事业。

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起初日本甚至不允许孙中山到日本去！现在他已经去了，日本所有民主主义

者都热烈地欢迎同共和中国建立联盟；同中国締結联盟已經提到日程上来了。日本資产階級像美国資产階級一样，懂得对中国实行和平政策比实行掠夺和瓜分中华民国的政策更有利。

强盜般的銀行团的瓦解，自然也是俄国实行的反动对外政策的一个很大的失敗。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九卷第9—10頁）

## 列 宁

# 亚洲的觉醒

——一九一三年五月七日

《真理报》第一〇三号

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随着一九〇五年的俄国运动，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骚动也正在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民主运动现在又遍及荷属印度，爪哇以及其他将达4,000万人口的荷属殖民地。

这个民主运动的代表者：第一、是爪哇的人民群众，他们在伊斯兰教旗帜下掀起了民族运动。第二、是资本主义在熟悉当地风土气候的欧洲人中间培养的当地知识分子，这些欧洲人是主张荷属印度独立的。第三、是爪哇和其他群岛上的很多华侨，他们从本国带来了革命运动。

荷兰马克思主义者万-腊韦斯坦在描述荷属印度的这种觉醒时指出，荷兰政府历来的专横与暴政现在正遭到土著居民群众的坚决反击和抗议。

革命前夕的通常现象出现了：协会和政党以惊人的速度在产生。政府企图加以禁止，因而引起更大的愤恨，使运动得到新的增

长。例如，不久前荷兰政府解散了“印度党”<sup>①</sup>，因为党的章程和纲领中谈到了要求独立的意图。荷兰“巡按”（顺便说一句，教权派和自由派都是赞成他们的；欧洲自由主义已经腐朽了！）认为这是想脱离荷兰的犯罪的企图！当然，被解散了的政党改换了名称又恢复起来了。

在爪哇，产生了土人的民族协会，这个协会已有 8 万名会员，并组织了群众大会。民主运动的增长是不可遏止的。

世界资本主义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工人，关心地、兴奋地注视着全球各地和各种形式的世界解放运动的这种强大的增长。被工人运动的力量吓坏了的欧洲资产阶级，投身到反动势力、军阀、僧侣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怀抱里去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亚洲各国年轻的、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和为群众充满信任的民主派，正在起来代替这些活活地腐朽了的资产阶级。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九卷第 67—68 页）

---

<sup>①</sup> 这里指的是荷属印度党。——译者注

## 列 宁

#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八日《真理报》第一一三号

本文标题所用的语句，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谁不知道欧洲先进，亚洲落后呢？但是用作本文标题的语句，包含着一种辛辣的真理。

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衰老的资产阶级与一切衰败了的和正在衰败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陷于动摇状态的雇佣奴隶制。

在先进的欧洲，当权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欧洲在现时之所以先进，并不是由于存在资产阶级，而是由于不顾资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争取美好未来的百万大軍日益增长起来，只有它才能保持和扩展对落后、野蛮、特权、奴隶制和人侮辱人现象的深恶痛绝的仇恨。

在“先进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的阶级。而尚存的资产阶级甘愿干一切野蛮、残暴和罪恶的勾当，以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奴隶制。

欧洲资产阶级为了一些财阀和资本家骗子的贪利目的而支持亚洲反动势力的事实，要算是证明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已经腐朽的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了。

在亚洲，到处都有强大的民主运动在增长、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万万人民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和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懂得只有通过民主制度才能达到集体主义的觉悟工人多么欢欣鼓舞！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对年轻的亚洲是多么同情！

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民主、自由的敌人！

请看一笔很简单但又值得注意的帐目吧。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为什么它要拥护袁世凯呢？因为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公债数目约为25,000万卢布，按100卢布折合84卢布的行市计算。这就是说，“欧洲”资产者实付中国人21,000万卢布，而他們向大众要去22,500万卢布。你看，在几个星期内，一下子就赚得1,500万卢布的纯利！这岂不是一笔绝妙的“纯”利吗？

若是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公债呢？在中国不是有共和制度以及国会中的大多数反对这笔公债吗？

啊！那时“先进的”欧洲就会大喊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和“祖国”了！那时它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

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

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有各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他们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一同解放出来。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九卷第82—83页）



## 列宁論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 战争的可能性及其胜利条件

——摘自一九一六年七月《論尤尼烏斯的小册子》

尤尼烏斯的第一个錯誤論点表現在“国际”派的提綱第5条：“……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紀元)，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民族利益只是欺騙的工具，驅使劳动人民群众为其死敌——帝国主义效劳……”以这个論点結尾的第5条，一开头就說明了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很可能，否认一般民族战争，不是疏忽大意，便是在強調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这个完全正确的思想时的偶然偏見。但是，既然也可能有相反的情形，既然各种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誤把这次战争当成民族战争而錯誤地否认任何民族战争，那就不能不談一談这个錯誤。

尤尼烏斯強調“帝国主义环境”在这次战争中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說塞爾維亞背后有俄国，“塞爾維亞民族主义背后有俄国帝国主义”，并且說荷兰的参战也是屬於帝国主义性质的，因为第一、它是保护自己的殖民地；第二、它是帝国主义联盟的盟員之一，这样說是完全正确的。就这次战争來說，这是不容爭辯的。既然尤尼烏斯在这里特別強調指出：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同“目前支配着社会民主党政策的”(第81頁)“民族战争的怪影”进行斗争，那就不能不认为他的論断既是正确的，又是完全恰当的。

他的錯誤只在于夸大了这个真理，脫离了馬克思主义的进行具体分析的要求，把对这次战争的估計搬到帝国主义时代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上去，忘記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为“再也不会有民族战争”这个論点辯护的唯一理由是：世界已經被一小撮“大”帝国主义强国瓜分完了，因此任何战争，即使起初是民族战争，以后也会由于触犯帝国主义列强或联盟之一的利益而轉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尤尼烏斯的小册子第 81 頁）。

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大家知道，馬克思主义辯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沒有任何一种現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轉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轉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轉化为民族战争。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偉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侖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許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产生了反对拿破侖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只有詭辯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轉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間的差別。辯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詭辯法的桥梁。但是，我們始終是辯证論者，我們同詭辯論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轉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

至于說这次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会轉化为民族战争，这在极大程度上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因为代表向前发

展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它在客观上力图把这次帝国主义战争轉化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其次还因为两个联盟的力量相差并不很大，国际财政资本到处造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但是，这种轉化也不能說是不可能的，假如欧洲无产阶级还要軟弱二十年之久，假如这次战争结果是拿破仑之流获得胜利并且奴役許多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国家，假如欧洲以外的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和美国的）也能維持二十年之久（例如，由于日美战争），而没有轉入社会主义，那就可能在欧洲发生偉大的民族战争。这就会使欧洲后退几十年。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把世界历史設想成一帆風順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辯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論上也是不正确的。

其次，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有将近 10 亿人口，也就是說，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在这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已經很强大，就是正在发展和成熟。任何战争都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繼續。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們的民族解放政策的繼續。这种战争可能導致目前“大”帝国主义强国之間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也可能不导致，这要取决于許多情况。

举一个例子：英法两国为了爭夺殖民地打了七年仗，也就是說，进行了七年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無論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或原始資本主义的基础上，以及在現代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的基础上都可能发生）。結果法国被打敗，并且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殖民地。几年以后，又发生了北美合众国反对英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法国和西班牙（当时这两个国家仍占有今天美国的一部分），由于

仇視英国，也就是說，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便同起义反对英国的合众国締結了友好条約。当时法軍同美軍一起打英国人。我們看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竞争是一个沒有多大意义的偶然因素，同我們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战争中（在奥塞战争中，民族因素同决定一切的帝国主义竞争相比，沒有多大的意义）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由此可見，死板地应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并且由此得出“不可能”发生民族战争的結論，那是何等的荒謬。比如波斯、印度和中国联合起来反对某些帝国主义强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完全可能的和可以設想的，因为它是从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至于这种战争是否轉化为目前帝国主义列强之間的帝国主义战争，这要取决于很多具体情况，但担保这些情况一定会产生，那是令人可笑的。

第三、即使在欧洲也不能认为民族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时代”使目前的战争成了帝国主义战争，它必然要引起（在社会主义还未到来以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使目前各大强国的政策成了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是，这个“时代”絲毫也不排斥民族战争，——例如，小国（姑且假定是被兼并的或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强国的民族战争，——正如它不排斥东欧大規模的民族运动一样。尤尼烏斯对奥地利的判断是很正确的，他不仅估計到“經濟”方面，而且估計到特殊的政治方面，指出“奥地利沒有內在的生存能力”，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并不是資产階級国家的政治組織，而只是由若干社会寄生集团組成的联系薄弱的辛迪加”，“奥匈帝国的灭亡在历史上不过是土耳其的崩潰的繼續，同时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要求”。至于某些巴尔干国家和俄国，情况也并不妙。在“大”国在这次战争中弄得筋疲力尽

的条件下,或者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民族战争完全可能发生,甚至会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实际上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能实现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信口开河地”說,小国反对大国的战争是没有希望的,那我们就必須指出:没有希望的战争也是战争;其次,“大国”内部的某些现象——如革命的爆发——可以使“没有希望的”战争成为大“有希望的”战争。

我們所以詳細地論述似乎“再也不会有民族战争”这个不正确的論点,不仅是因为它在理論上显然是錯誤的。如果“左派”在只有在非庸俗的馬克思主义基础上才能成立第三国际的时候,对馬克思主义理論表示漠不关心,那当然是极其可悲的。而且这个錯誤在政治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人們会从这得出“解除武装”的荒謬宣傳,因为除了反动战争以外,仿佛再也不会有任何战争;人們从这还可以得出对民族运动更荒謬的和簡直是反动的漠視态度。当欧洲的“大”民族,即压迫許多弱小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的成員,以所謂学者的姿态声称“再也不会有民族战争”的时候,这种漠視态度就是沙文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設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虽然为了取得胜利,或者需要被压迫国家的大多数居民(我們所举的例子印度和中国就有几亿人口)的共同努力,或者需要国际形势中的某些情况(例如,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力量的削弱、它們的战争、它們的对抗性矛盾等等,无力进行干涉)特別有利的配合,或者需要某一大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我們列举的这后一种情况,从对无产阶级胜利所期望的和有利的观点来看,是最主要的)。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二十二卷第301—306頁)

## 斯大林

### 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摘录)

——摘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和十九日  
《真理报》第二四一号和第二五〇号

民族問題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變的問題。民族問題只是改造現存制度總問題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这在俄国革命时期表现得特別明显，当时民族問題和俄国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随着革命的进程和結局而迅速和明显地改变自己的内容。

#### 一 (略)

####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

二月革命包含着不可調和的内部矛盾。革命是由工人和农民(士兵)的努力完成的，但是革命的結果，政权不是归工人和农民，而是归資產階級所有了。工人和农民进行革命，是想要結束战争，取得和平。但是掌握了政权的資產階級，却力图利用群众的革命

热情来繼續战争，反对和平。国内的經濟破坏和粮食恐慌要求为了工人的利益剝夺資本和工业企业，为了农民的利益沒收地主的土地，但是米留可夫—克倫斯基的資產階級政府却保卫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坚决保护他們，使他們不受工人和农民的侵害。这是靠工人和农民的手进行的有利于剝削者的資產階級革命。

当时国家仍然呻吟在帝国主义战争、經濟崩潰和粮食恐慌的重压之下。前綫土崩瓦解。工厂时常停工。国内饥荒日益严重。含有内部矛盾的二月革命显然不足以“救国”了。米留可夫—克倫斯基政府显然沒有能力来解决革命的根本問題了。

为了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經濟崩潰的絕境，必須实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革命随着十月变革而到来了。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权，而代之以工人和农民政府，一举而解决了二月革命的矛盾。廢除地主富农的无限权力，把土地交給农村的劳动群众使用；沒收工厂，把它們交給工人管理；同帝国主义决裂，結束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約，揭穿侵占別国領土的政策；最后，宣布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实行自决，承认芬兰独立，——这些就是苏維埃政权在苏維埃革命初期所实施的主要措施。

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部开始的革命，是不能长久地停留在中部狭窄地域范围内的。革命在中部胜利后，就必然要扩展到各边疆地区去。果然，革命浪潮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从北部氾濫到全俄国，席卷了一个又一个边疆地区。但是它在边疆地区碰到了堤壩，这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經成立的“民族委员会”和区域“政府”（頓河、庫

班、西伯利亞）。原來這些“民族政府”連聽都不願意聽社會主義革命。它們在本性上是資產階級政府，根本不願意破壞舊的資產階級秩序，相反地，它們認為有義務來全力保存並鞏固這一秩序。它們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政府，根本不願意同帝國主義決裂，相反地，只要有機會，它們從不放鬆去侵占並統轄“異”民族的幾塊或幾小塊領土。所以，各邊疆地區的“民族政府”向中部的社會主義政府宣戰是並不奇怪的。它們一經宣戰，自然就成了糾集俄國一切反革命勢力的反動基地。誰都知道，所有被驅逐出俄國的反革命分子都奔向這些基地，他們在這些基地上編成了白衛“民族”部隊。

但是，除了“民族政府”，在各邊疆地區還有各民族的工人和農民。他們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經仿照俄國中部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組織了自己的革命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從來沒有同自己的北部弟兄斷絕過聯繫。他們同樣力求戰勝資產階級，他們同樣為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所以，他們和“自己的”民族政府的衝突與日俱增是並不奇怪的。十月革命只是鞏固了邊疆地區的工人和農民同俄國的工人和農民的聯盟，鼓舞了他們對社會主義勝利的信心。而“民族政府”對蘇維埃政權的戰爭則使各民族的群眾同這些“政府”的衝突達到完全決裂的地步，達到以公開起義反對它們的地步。

這樣就形成了反對俄國各邊疆地區民族資產階級“政府”的反革命聯盟的全俄國工人和農民的社會主義聯盟。

有些人把各邊疆地區“政府”的鬥爭描繪成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无情的中央集權制”、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這是完全不對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權像俄國的蘇維埃政權這樣允許如此廣泛的地方分權制，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像俄國的蘇維埃政權這樣給予各



民族如此充分的民族自由。各边疆地区“政府”的斗争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打出民族旗帜只是为了欺骗群众，因为它是一面便于掩盖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阴谋的受人欢迎的旗帜。

但是，各“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所进行的斗争是力量悬殊的斗争，“民族政府”两面受敌：外受俄国苏维埃政权攻击，内受“自己的”工人和农民攻击。因此，它们经过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就不得不退却了。芬兰工人、托尔帕利<sup>①</sup>的起义和资产阶级“上议院”的逃亡，乌克兰工农的起义和资产阶级“拉达”的逃亡，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工农的起义和卡列金、科尔尼洛夫、西伯利亚“政府”的崩溃，土尔克斯坦贫农的起义和“自治政府”的逃亡，高加索的土地革命和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捷尔拜疆的“民族委员会”的完全孤立无援，——这些就是表明各边疆地区“政府”完全脱离了“自己的”劳动群众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被彻底击溃的“民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者，求助于全世界各民族数百年来压迫者和剥削者来对付“自己的”工人和农民。

这样就开始了外国干涉和边疆地区淪陷的时期，这个时期再一次揭穿了“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的反革命性。

只是现在大家才明白：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的并不是使“自己的人民”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是从人民身上榨取利润的自由，是保存自己的特权和资本的自由。

只是现在才知道：不和帝国主义决裂，不推翻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政权不转到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手里，被压迫民族就不

<sup>①</sup> 托尔帕利，意即芬兰的无地农民，他们在极苛刻的条件下向地主租地。——《斯大林全集》编者注

能解放。

对自决原则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就这样被革命进程本身所揭穿了，拋棄了。对自决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的口号则获得了被采用的全部权利和机会。

这样，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纪元，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一切压迫（也包括民族压迫），反对“自己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整个帝国主义。

###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十月革命在俄国中部胜利并蔓延到许多边疆地区后，就不能局限于俄国领土范围之内了。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下层民众普遍不满的气氛中，它不能不波及邻近国家。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并摆脱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庄严地廢除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宣布民族自由，承认芬兰独立；宣告俄国为“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苏维埃政权向世界发出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呼声，——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被奴役的东方和流血殆尽的西方发生重大影响。

果然，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在波斯、中国和印度效法俄国的苏维埃成立工农苏维埃的事实，充分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西方工人和士兵解救自己的活

榜样并推动他們走上真正摆脱战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的革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奥匈帝国沒有充分权利的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都十分雄辯地說明这一点。

問題完全不在于东方的斗争乃至西方的斗争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杂质；問題在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正在繼續进行并且一定会达到它的邏輯的結局。

外国干涉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占領政策，只是使革命危机尖銳化，把更多的民族卷入斗争，扩大同帝国主义作革命搏斗的地区。

这样，十月革命就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間建立了联系，把他們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陣营。

这样，民族問題就从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問題发展成为各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問題。

第二国际及其首領考茨基的該死的罪过之一，就是他們对民族自决問題的看法始終和资产阶级的看法相同，不了解民族自决的革命意义，不会或是不願意把民族問題放在和帝国主义进行公开斗争的革命基础上，不会或是不願意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解放問題联系起来。

鲍威尔和倫納一类奥国社会民主党人愚蠢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他們不了解民族問題和政权問題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力图把民族問題和政治分开并把它限制在文化教育問題范围之内，忘記了帝国主义和被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的存在这样的“小事”。

有人說，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高漲的情势下，自决和“保卫祖国”的原則已經被事变进程本身廢棄了。事实上，被廢棄的不是自

決和“保衛祖國”的原則，而是對這些原則的資產階級的解釋。只要看一看呻吟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和渴求解放的淪陷區，只要看一看為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不受帝國主義強盜侵害而進行着革命戰爭的俄國，只要想一想奧匈帝國目前爆發的事變，只要看一看那些已經自行組織蘇維埃的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印度、波斯、中國），就足以理解按照社會主義解釋的自決原則的全部革命意義了。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主要在於：

（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范围，使民族問題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

（二）它給這一解放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这就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匯總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巨流中去；

（三）它從而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建成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綫。

這其實也就說明了為什麼東方和西方的勞動人民和被剝削群眾現在以難於描述的热情對待俄國的無產階級。

這主要也就說明了為什麼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強盜目前這樣瘋狂地攻擊蘇維埃俄國。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四卷第 140、142—149 頁）

## 斯大林

# 不要忘記東方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民族生活報》第三號社論

在歐洲革命運動日益高漲之際，在舊寶座紛紛倒塌和舊皇冠紛紛落地而讓位於革命的工兵蘇維埃的時候，在淪陷區正把帝國主義的走狗從自己的土地上趕出去的時候，大家的視線自然都轉向西方。在西方，應當首先打斷在歐洲鑄煉而用來扼殺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鎖煉。在西方，應當首先沸騰起新的社會主義生活。在這樣的時候，遙遠的東方及其數億被帝國主義奴役的人民就“自然而然”從視野中消失了，被忘記了。

但是，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東方，至少因為它是世界帝國主義“取之不尽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

帝國主義者一向把東方看做自己幸福的基础。東方各國的不可計量的自然富源（棉花、石油、黃金、煤炭、礦石），難道不是世界各國帝國主義者的“糾紛的蘋果”<sup>①</sup>嗎？這其實也就說明為什麼帝國主義者在歐洲作戰和談論西方的時候從來沒有不想到中國、印

① “糾紛的蘋果”是希臘神話中的故事：海娜、亞美羅德、雅西娜三個女神拿了一個金蘋果請牧童巴里斯評判一下，看誰最美麗，就把蘋果給誰。結果牧童把蘋果給了亞美羅德，從此蘋果就成了這三個女神之間不和的根源。——譯者注

度、波斯、埃及和摩洛哥。因為問題其實始終是在東方。他們那樣熱心地維持東方各國的“秩序和法制”，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因為不這樣做，帝國主義的大後方就會沒有保障。

但是，帝國主義者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東方的富源。他們還需要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特多的“聽話的”“人力”。他們需要東方各民族“順從的”廉價的“勞動力”。此外，他們需要東方各國的“聽話的”“年輕小伙子”，從其中征募所謂“有色”軍隊，立即運用它們去對付“自己的”革命工人。正因為如此，他們把東方各國稱為自己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

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要打破東方被壓迫民族數百年來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的工人和農民，喚起他們去反對帝國主義，從而使世界帝國主義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後方，失去它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

不這樣做，就休想社會主義取得最後勝利，休想完全戰勝帝國主義。

俄國革命第一個喚起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去反對帝國主義。波斯、印度、中國的代表蘇維埃的成立是東方工人和農民從數百年來的沉睡中醒過來的鮮明標志。

西方革命無疑地會進一步推動東方革命運動，給它灌注奮發精神和勝利信心。

帝國主義者本身及其新的吞併行為會給東方的革命化以不小的援助，因為這種吞併行為會把更多的國家卷入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擴大世界革命的基地。

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參與東方日益增長的自發運動，向前發展這種運動，使它成為自覺的反帝國主義鬥爭。

在这个意义上，不久以前举行的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员代表会议<sup>①</sup>关于加强在东方各国即在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宣传工作的决议，无疑地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

我们希望我们伊斯兰教民族的同志们能执行自己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

因为必须彻底领会这个真理，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四卷第 152—154 頁）

---

<sup>①</sup> 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出了俄共(布)伊斯兰教民族组织的中央常务局。——《斯大林全集》编者注

## 列宁論东方各族人民的觉醒

——摘自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應該指出，如果說俄国布尔什維克能够在旧帝国主义中打开一个缺口，担負起異常艰难但又異常崇高的开辟革命新道路的任务，那末，你們这些东部劳动群众的代表今后要担負的就将是更新更偉大的任务。十分明显，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只是每一国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事情。如果革命进行得很順利，很迅速，这也許是可能的。我們知道，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讓我們这样做的，世界各国都已武装起来对付本国的布尔什維主义，一心在想怎样战胜自己家里的布尔什維主义。因此，每一个国家都发生了国内战争，而采取妥协主义立場的老社会主义者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参加这个战争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国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屬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我們党去年三月通过的綱領里面，我們在說明世界社会革命日益接近的时候說，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剝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結合起来。这一点正由革命进程



所证实,并且今后会得到更多的证实。东方的情形也会是如此。

我們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創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沒有平等权利的民族,至今都是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掠夺对象,是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的养料。我們非常了解,人們所謂分配殖民地委任統治权,就是分配被委托去盜窃和搶劫的权利,分配地球上一小撮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剝削的权利。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过去完全和历史的进步沒有关系,因为当时他們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紀初期,他們已不再扮演这种消极的角色了。我們知道,一九〇五年以后,土耳其、波斯、中国相继发生了革命,印度也展开了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战争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很多殖民地人民的部队卷入了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英国和法国武装了殖民地人民,帮助他們熟悉了軍事技术和新式机器。他們将利用这种学識去反对帝国主义老爷們。东方觉醒之后,現代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东方各族人民开始干預世界命运而不再仅仅充当別人发财的对象了。东方各族人民紛紛觉醒了,他們要求实际行动起来,要求每一族人民都能干預全人类的命运問題。

所以我认为,今后在世界革命发展史中(从这个革命开始时的情况看来,它还要繼續很多年,还要我們做很多工作),在革命斗争中,在革命运动中,你們将要發揮重大的作用,将要把你們的斗争和我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汇合起来。你們参加国际革命后,就将担負起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解决了这个任务就会为总的胜利打下基础,因为在这里,人类的多数是第一次进行独立的运动,他們将成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

东部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俄国还坏。我們已經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了，我們的斗争所以进行得很順利，正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联合起来反对資本和封建主义的。在这方面，同东部各族人民的联系特別重要，因为东部人民大多数是典型的劳动群众，他們不是受过資本主义工厂鍛炼的工人，而是典型的被剝削劳动农民，即遭受中世紀压迫的劳动农民。俄国革命已經表明，战胜了資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把千百万涣散的劳动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后，就胜利地推翻了中世紀压迫。今后，我們苏維埃共和国将把觉醒的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圍，共同去进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你們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沒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須根据欧洲各国所沒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須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資本而是中世紀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別崇高的任务，因为卷入斗争的是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但另一方面由于东部組織了共产党支部，你們就能够同第三国际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你們必須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部那些經常处在中世紀生活条件下的被剝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我們在小範圍內、即在我們国家內实现了的任务，你們将在大範圍內、即在巨大的国家內予以实现。这第二个任务，我希望你們能够胜利完成。由于东部已經有了共产党組織——你們就是这些組織的代表，——你們就与先进的革命无产阶级有了联系。你們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繼續关心怎样在每一个国家內用群众明白的話进行共产主义宣傳。

不言而喻，能够获得最終胜利的，只有全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階級。我們俄国人創始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階級来巩固；但是我們看到，沒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他們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我們应当懂得，单靠一支先鋒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須激发劳动群众从事独立活动和把自己組織起来的革命积极性（不管他們的水平如何）；把指导先进国家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說譯成各民族的文字；实现那些必須立刻实现的实际任务，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这些就是你們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們無論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争中能够找到。你們应当提出这个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經驗来解决这个任务。你們要更順利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各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鋒队結成紧密的联盟，同时还要善于正确地对待你們在这里所代表的东部各民族。你們应当借助于正在这些民族中間产生出来并且必然要产生出来的資产階級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但同时你們应当去联系本国的被剝削劳动群众，用他們明白的話告訴他們，获得解放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的胜利，国际无产階級是东部各民族亿万被剝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

这就是摆在你們面前的极其巨大的任务。由于革命时代的来临和革命运动的增长（这是不容置疑的），东部各共产党組織只要能共同努力，就一定会順利解决这个任务，彻底战胜国际帝国主义。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三十卷第 136—140 頁）

## 列 宁

###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sup>①</sup>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

我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以下的关于殖民地和民族問題的提綱草案，請同志們討論，并請全体同志，特別是具体了解这些复杂問題中的这个或那个問題的同志，以最簡短（至多兩三頁）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評論、修正、补充或具体說明，尤其是关于以下各点：

奧地利經驗。

波兰犹太和烏克蘭的經驗。

亚尔薩斯-洛林和比利时。

爱尔兰。

丹麦和德国的关系。意大利和法国的关系以及意大利和斯拉夫的关系。

巴尔干的經驗。

东方各民族。

同大伊斯兰主义的斗争。

<sup>①</sup>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是列宁寄給当时在西南战綫的斯大林的。斯大林在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二日給列宁的信中提出自己对提綱的意見。提綱于一九二〇年六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開幕前发表。——《列宁全集》編者注

高加索的关系。

巴什基里亚共和国和韃靼共和国。

吉尔吉斯坦。

土尔克斯坦及其經驗。

美国的黑人。

各殖民地。

中国——朝鮮——日本。

尼·列宁

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

1. 按资产階級民主制的本性說来,关于一般平等問題(其中包括民族平等問題)的抽象的或形式的提法,是资产階級民主制所特有的。资产階級民主制在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間、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从而极度欺騙被压迫階級。资产階級借口个人絕對平等,把本身就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階級的斗争武器。要求平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階級。

2. 共产党是无产階級为推翻资产階級的压迫而斗争的自觉的代表者,它根据自己反对资产階級民主制和揭露其荒誕伪善的基本任务,在民族問題上也不应当提出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則,而应当做到:第一、正确地估計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經濟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階級和被剝削劳动者的利益,同一般人民利益的普通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因为这种概念意味着統治階級的利益;第三、把被压迫的、非独立的、沒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剝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区分开来,与资产階級民主制的虛伪性对立起来,这种虛伪性蒙蔽着財政資本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

所特有的現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强的先进資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絕大多数人民实行殖民地奴役和財政奴役。

3.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階級面前，特別清楚地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詞句的虛伪性，在事实上表明，标榜为“西方民主”的凡尔賽条約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压在弱小民族头上的暴力。国际联盟和协約国战后的全部政策更清楚更尖銳地揭露了这个真理，并且到处加强先进国无产階級和殖民地附屬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从而使所謂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处和一律平等的市儈民族幻想更快地破产。

4. 从上述的基本原理中就得出以下的結論：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主要應該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去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胜資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現象。

5.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階級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圍繞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資產階級反对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維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經驗，深信除了苏維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他們別无生路。

6. 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須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

同苏維埃俄国建立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

7. 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无论在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其他苏維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芬兰苏維埃共和国、拉脱維亚苏維埃共和国，现在的阿捷尔拜疆苏維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維埃共和国）的关系中，或在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同从前既沒有国家生存权又沒有自治权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一九一九年建立的巴什基里亚自治共和国，一九二〇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中，联邦制在实践上已經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

8. 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用經驗来檢查在苏維埃制度和苏維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須追求更加紧密的联邦制同盟，因为第一、沒有各苏維埃共和国最紧密的联盟，便不能捍卫被軍事方面无比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維埃共和国的生存；第二、各苏維埃共和国之間必須有一个紧密的經濟联盟，否則便不能恢复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了的生产力，便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第三、要估計到按各国无产阶级所調整的总計劃，建立統一而完整的世界經濟体系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已經十分明显地表現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繼續发展而臻于完善。

9. 在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决不能像资产

階級民主派那樣，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純粹宣言式地、实际上是毫不負責地承認民族平等，這些資產階級民主派，不管是坦白地自命為民主派，或者是借社會主義者稱號來掩飾自己的第二國際社會黨人，都是一樣的。

不僅在共產黨的全部宣傳鼓動工作（議會讲坛上和議會讲坛外的宣傳鼓動工作）中，應當不斷地揭發各資本主義國家違背自己的“民主”憲法，經常破壞民族平等，破壞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種種事實，而且還必須做到：第一、經常解釋，蘇維埃制度只有在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首先把無產者、然后把全體勞動群眾聯合起來才能實際上給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國共產黨必須直接幫助附屬國或不平等民族（例如愛爾蘭，美國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運動。

沒有後面這個特別重要的條件，反對壓迫附屬國和殖民地的鬥爭以及承認他們有國家分立權就仍然是一塊假招牌，正像我們在第二國際政黨那里看到的一樣。

10. 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事實上在全部宣傳、鼓動和實際工作中却用市儈民族主義與和平主義代替國際主義，這不僅是第二國際各政黨中最常見的現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經退出了這個國際的各政黨中，甚至往往是現在自稱為共產主義政黨的各個政黨中最常見的現象。把無產階級專政由一國性的（即存在於一個國家內的，不能決定全世界政治的）專政轉變為國際性的專政（即至少是幾個先進國家的，對全世界政治能夠起決定影響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愈迫切，同最頑固的小資產階級民族偏見這種禍害的鬥爭就愈加重要。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宣稱，只要承認民族平等就是國際主義，同時又保留（更不用說這種承認純粹是口頭上



的)民族利己主义的不可侵犯性,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则要求: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因此,在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拥有工人政党这支真正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国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及其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僧和平主义作斗争。

11.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首先是落后民族在殖民地关系或财政关系上所依赖的那个国家的工人,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中世纪式的反动分子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其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大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派别作斗争;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并且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必须特别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

塗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組織起来，并且認識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別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結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們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第六、必須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說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貫实行的欺騙政策，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經濟、財政和軍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們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建立各苏維埃共和国联盟以外，附屬国和弱小民族別无生路。

12. 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不仅引起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对一般压迫民族（其中也包括該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而且也引起不信任的心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这一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正式領袖曾經按照社会沙文主义的精神，借口“保卫祖国”来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迫殖民地和掠夺財政上依存的国家的“权利”，他們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卑鄙行为不能不加重这种絕非无因的不信任心理。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閉塞性就愈加厉害，而且这种情况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見，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狹隘性特別頑固有力。既然这些偏見只有在各先进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全部經濟生活基础急剧改变以后才能消逝，那这些偏見的消逝，就不能不是很緩慢的，因此，各国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

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残余要特別慎重，特別注意，同时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指出的不信任心理和偏見，必須作某种让步。沒有世界各国无产階級和全体劳动群众自願追求联盟和統一的願望，战胜資本主义的这一事业是不能順利完成的。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三十一卷第 124—130 頁)

### 附录：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 和殖民地問題的补充提綱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共产  
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面临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就是精确定义共产国际与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資本主义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內的革命运动之間的相互关系。世界革命历史正經歷着这样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正确理解这个相互关系乃是必要的。欧洲大战及其后果明显地表明了：非欧洲被压迫各国的人民群众与欧洲无产階級运动，由于世界資本主义的集中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例如，殖民地軍隊与大批工人队伍在大战期間之派至前綫，即其表現。

(二) 欧洲資本主义主要不是从工业的欧洲各国，而是从自己的殖民地汲取自己的力量。为着它的存在，必須控制广大的殖民地市場和必須有广闊的剝削場所。英国——帝国主义的堡垒——一百年来遭受着生产过剩的痛苦。倘若沒有在銷售商品与同时供給原料上所十分必需的广大殖民地，英国的資本主义也許

早已垮台了。英国帝国主义使亚洲和非洲几万万居民处于奴隶地位，同时又使本国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从殖民地所取得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源泉。欧洲工人阶级只有在这种源泉完全枯竭时，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应该说不是毫无结果地)恢复自己业已动摇的地位，其办法就是对殖民地的人的劳动与天然财富加以广泛和紧张的剥削。由于对殖民地居民的剥削，欧洲帝国主义才能够给与欧洲工人贵族以好些赏礼。欧洲帝国主义一方面企图将殖民地各国工人低廉劳动所生产的商品输入到大陆以减低无产阶级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同时资产阶级甘愿牺牲本国内所得的额外利润，只要是能保存从剥削殖民地所得的额外利润。

(四)殖民地的分离和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共产国际应当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共产国际应当与目前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保持密切的接触。为了世界革命的完全成功，这两种力量的共同行动是必要的。

(五)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中化了的意志。它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传播共产主义。共产国际是一个战斗的单位，它应当把全世界各国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彻头彻尾为资产阶级文化所渗透而由一撮政客所领导的第二国际，不曾估计到殖民地问题的全部重要性。对于第二国际，欧洲以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欧洲革命运动与其他各洲各国革命运动相互呼应的必要，对于第二国际是不明了的。不给殖民地革命运

动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第二国际的成员們自己已成了帝国主义者。

(六)强制地向东方各民族移植的外国帝国主义，无条件地阻止了他們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剝夺了他們达到欧美已經达到的水平的可能性，因为帝国主义的政策力求阻止殖民地工业的发展；本来意义下的土著无产階級，只是不久以前才存在的。

地方的、零散的家庭手工业，已让位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集中化的工业，因此极大多数的人口不得不从事农业并把原料輸出到国外去。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土地很快地日益集中于少数大地主——資本家和公家手中，这大大促进了无土地的农民数目的增加。这些殖民地的极大多数居民都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中。由于这种政策的結果，人民群众中的处于潜伏状态的反抗精神，只是通过为数不多的知識分子中等階級表現出来。外国的压迫始終妨碍着社会生活的自由发展；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这样，帮助推翻外国統治的斗争，并不是贊成土著資產階級的民族主义的趋向，而只是給殖民地无产階級开辟一条达到其解放的道路。

(七)我們可以指出相距日远的两种运动的存在。其中之一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綱領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之下实现政治的独立；另一个是貧穷和无知的农民和工人群众爭取自己从一切剝削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第一种运动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并且往往得到成功；但是共产国际应当反对这一类的控制，促进殖民地工人群众階級意識的发展。因此，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資本主义。但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則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組織，以便能够领导他們走向革命和創立苏維

埃共和国。这样，在落后的国家内，人民群众之加入共产主义，将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由于先进国家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下阶级的自我意识之发展。

(八)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实在力量、基础，并未封锁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者狭小范围以内。在大部分殖民地中已经存在着有组织的革命政党，这些政党在与工人群众的密切接触中工作着。共产党应当通过这些政党或团体与殖民地里的革命运动发生接触，因为它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目前它们人数不多，但它们是群众意志的表现，领导群众走向革命。

帝国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应当与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作中有密切的接触，通过它们给予一般革命运动以物质的和精神的帮助。

(九)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要是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那末革命群众，由于渐次地获得革命经验，将走上达到所抱目的的正确道路。倘若力图用纯粹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解决土地问题，那会是完全错误的。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殖民地革命应当按照带有纯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点的纲领去进行，如分配土地等等。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最初的可能之下创立工农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与进步的资本主义各国的苏维埃共和国平等地工作，以便完全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 列宁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压迫的 加强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

——摘自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八月七日《共产  
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部分《关于国际形势  
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七月十九日)》

目前国际形势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已经完全确定了。你们当然都知道，帝国主义最突出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资本的数额十分巨大。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有时，极少数资本家就能把一些工业部门整个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些工业部门就落到了往往是国际性的各种联合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手里。因此，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从财政上、产权上，有的甚至从生产上，控制了整批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少数大银行、财政大王、财政寡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他们实际上甚至已经把最自由的共和国变成了财政帝国。这一点，像法国的里季斯这样一些根本不是革命的著作家，在战前就公开承认了。

一小撮资本家的统治达到了顶点；世界已经分割完了，不仅各种原料产地和生产资料已被最大的资本家瓜分了，就是殖民地也已经初步分割完毕。四十年前，6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属殖民地的人

口不过稍稍超出 2 亿 5 千万。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前夕，殖民地人口已經达到 6 亿左右，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就有整整 10 亿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从屬地位，受它們的压迫。你們知道，要使一个国家居于殖民地从屬地位，除了直接在国家法权上，还要在财政、經濟等方面使它居于从屬地位；要进行一系列的战争来达到这个目的，而这种战争根本不能算作战争，因为常常不过是欧美帝国主义军队，用最精良的杀人武器，摧殘手无寸铁的殖民地居民，演成一場大屠杀而已。

由于世界已經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壟断組織統治的建立以及极少数大銀行(每个国家只有两三家，最多不过四、五家)的左右一切，就决定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必然爆发。这次战争是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这次战争是为了决定：在极少数大国集团中(英国集团或德国集团)，誰可以、誰有权利来掠夺、絞杀和剝削全世界。你們知道，英国集团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由于这次战争，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空前尖銳化了。……

这就是帝国主义大战后世界状况的輪廓。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 12 亿 5 千万，其中包括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以及那些战败国和淪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的人口，不超过 2 亿 5 千万，但是这些国家在經濟上已經陷于依賴美国的地位，战时在軍事上也处于从屬地位，因为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后，不到 2 亿 5 千万的居民，属于战胜国，其中自然只有上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享受瓜分世界的利益。全世界的人口总数是 17 亿 5 千万。我提醒你們注意全世界的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一切导致革



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基本矛盾，这一切引起了第二国际作激烈斗争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矛盾（主席同志讲到了这一点），都是同世界人口的这种划分联系着的。

当然，这些数目字只是粗略地描绘出一幅世界经济的图画。同时，同志们，随着世界人口划分为上述三类，财政资本的剥削，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剥削，自然也增加了许多倍。

不但殖民地、战败国陷于从属地位，就是在战胜国里，矛盾也尖锐化了，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都尖锐化了。

.....

这就是国际联盟所造成的局势。国际联盟盟约存在一天，就替布尔什维主义很好地作一天宣传，因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强有力的保卫者表明，他们在每个问题上都是互相拆台的。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正为着瓜分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而进行激烈的争吵。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在猛烈地抨击自己的“伙伴”，斥责对方不该把快到手的東西搶去。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已经完全决裂了。12亿5千万人决不会让“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任意奴役下去，要知道，他们占世界人口70%！英、美、日（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极少数富强的国家，这两三个国家已经无法调整它们的经济关系，它们正在推行一种政策，一种破坏国际联盟盟友、国际联盟伙伴的政策。因此产生了世界危机。这个危机的经济根源就是共产国际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

同志们，最后，我还要讲一个问题。主席同志说，这次代表大会

可以称为一次世界性的代表大会。我认为，他說得很对，特别是因为有不少殖民地、落后国家革命运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重要的是已經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已經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沒有或者几乎沒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了。但是进一步加强这种联合，完全要靠我們今后的努力，我相信，我們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被剝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进攻击败了市儈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貴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外面、只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进攻联合起来，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

.....

苏維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們所了解了。

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維埃运动都已經打下了基础。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三十一卷第188—189、190—  
191、198、203—204、205頁）

## 列宁論民族解放运动与 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

——摘自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八月七日《共产  
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部分《民族和殖民地  
問題委员会<sup>①</sup>的报告(七月二十六日)》

同志們，我只預備作一个簡短的序言，然后，由我們委员会过去的秘书馬林同志向你們詳細地报告我們对提綱的修改意見。补充提綱的起草人罗易同志以后也要发言。我們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綱初稿和补充提綱。这样，我們在一切重要問題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現在，我就来作几点簡短的說明。

第一、我們的提綱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間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相反，我們強調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階級和共产国际來說，特別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經濟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問題时，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

我們看到，目前帝国主义阶段的特点就是全世界已經划分为

---

①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员会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由以下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組成：俄国、保加利亚、法国、荷兰、德国、匈牙利、美国、英屬印度、波斯、中国、朝鮮、英国等等。該委员会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經代表大会第四和第五两次會議討論后，于七月二十八日通过。——《列宁全集》編者注

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拥有巨量财富和雄厚的军事实力的少数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有10亿以上，都是被压迫民族，他們的总数大約是12亿5千万。我們把世界总人口算作17亿5千万，他們就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他們中間有些是直接的殖民地，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則是被某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的国家，它們由于签订了和約而深深地陷于附屬地位。把各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思想貫穿着整个提綱，不仅由我署名的、以前发表过的第一个提綱是这样，罗易同志的提綱也是这样的。后一个提綱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因此，对我們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二、我們提綱中的另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关系和全世界国家体系內的特点，就是少数帝国主义民族集团反对苏維埃运动，反对以苏維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維埃国家。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們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哪怕这个問題只关系到世界上某个最偏僻的角落。無論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問題。

第三、我想特別強調一下落后国家的資产階級民主运动問題。正是这个問題引起了某些意見分歧。我們发生爭論的地方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應該支持落后国家的資产階級民主运动，这在原則上和理論上是否正确。討論的結果我們一致决定，把“資产階級民主”运动改为民族革命运动。毫無疑問，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資产階級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

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话）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在委员会里有人反对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个名词，他们说，要是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說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字样几乎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的意思是說，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与第二国际的英雄同类的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国家里已经出现了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上面指出那种区别现在已经贯穿在整个提纲里面了，我认为，这就更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其次，我还想对农民苏维埃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俄国共产党人在以前属于沙皇的殖民地里，在像土尔克斯坦这类落后国家里

进行实际工作的时候，曾經提出过在資本主义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資本主义前的关系占优势，因此，还談不到純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如此，我們在那里还是起了领导作用，并且也应该起领导作用。我們的工作表明，在这些国家里一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而我們工作的实际結果也表明，在这些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尽管有这些困难，仍旧可以在群众中激发起独立思考政治問題、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願望。这个工作对我們比对西欧各国的同志們更困难些，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正忙于国家工作。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地位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領会苏維埃組織的思想，并且在实际中很好地运用它。同样明显，那些不仅受商业資本剝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剝削的被压迫群众，是能够在本国的条件下运用这种武器和这种組織形式的。苏維埃組織的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們在这方面的經驗虽然还不很丰富，但是在委员会里和几个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共同討論后，我們都十分明确地認識到，在共产国际的提綱中必須指出，农民苏維埃、被剝削者苏維埃这种形式不仅适用于資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有資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而且必須指出，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完全有責任普遍宣傳关于农民苏維埃、劳动者苏維埃的思想，只要条件允許，就应该立即設法建立劳动者苏維埃。

現在，我們的实际工作中又出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十分重要的領域。在这方面我們的一般經驗还不很丰富，但是我們會逐步地积累起更多的材料。毫無疑問，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

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目前的阶段。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不但对我署名的提纲进行了热烈讨论，而且更多地对罗易同志起草的提纲进行了讨论（罗易同志还要在这里作些说明），并且一致通过了对后一个提纲的一些修正。

问题是这样的：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表现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說法究竟对不对。我们的答复是否定的。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宣传，各国苏维埃政府尽自己的能力给它们帮助，那末，說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組成能够独立作战的基于队伍，即党的組織，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組織农民苏维埃，設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論上說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很难预先指出。实际經驗会给我们启示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离我们最远的民族中，苏维埃思想对于全体劳动群众也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組織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除了强调共产党在本国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之外，我还想强调一下它们在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特别是在剝削民族用来維持殖民統治的軍隊中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

英国社会党的奎尔奇同志在我們委员会里談到了这个问题。他說，普通的英国工人认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統治是叛变的行为。的确，有軍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緒的英、美工人贵族是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是第二国际最有力的支柱，这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国际的領袖和工人的最大叛变。第二国际也討論过殖民地問題。在巴塞尔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也說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的党也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們看不到第二国际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沒有看到它們援助被剝削和被压迫民族举行起义反对压迫民族，我认为，大多数已經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我們应当公开地說出这一点，这是无法駁倒的。我們要看看，有沒有人想来反駁。

这些看法就是我們決議的基础。无疑，这些決議是太长了些，但是我相信它們毕竟是有用处的，它們将有助于开展和組織真正革命的民族和殖民地工作，这也就是我們的主要任务。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三十一卷第 209—214 頁)



## 列宁論东方的一九〇五年

——摘自一九二二年五月《真理报》

創刊十周年紀念》

世界所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基本原因是有成亿成亿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总把自己看成世界中心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旧欧洲，已经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屠杀中像发臭的脓疮一样溃烂和裂开了。不管施本格勒<sup>①</sup>之流和一切狂热地崇拜他（或者是研究他）的有教养的小市民为此怎样痛哭流涕，然而旧欧洲的这种衰落不过是靠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而养肥了的世界资产阶级没落史上的一段插话而已。

现在，大多数居民已经觉醒，已经行动起来，连最“有威力的”列强也阻挡不住他们了。它们能怎么办！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屠杀的“胜利者”，现在连小得可怜的爱尔兰都不能战胜，连它们彼此之间在财政问题和外汇问题上的混乱都不能克服。而印度和中国在咆哮着。这就有七亿多人。如果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在那里，一九〇五年日益迫近，不可遏止地愈来愈快地迫近着。而这个一九〇五年有一个很

---

<sup>①</sup> 施本格勒（一八八〇——一九三六年）是德国的反动政论家和哲学家。他把资产阶级文化的衰落当作全人类文化的毁灭，而认为唯一挽救人类文化的方法是让普鲁士贵族取得胜利。——译者注

重要的极大的不同之处：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的革命还能够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也就是說，沒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国卷入革命，但是現在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增长的革命却正在卷入或已經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三十三卷第 311—312 頁）

## 列宁論东方的民族革命与 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摘自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同时东方許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軌。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一般欧洲式资本主义的标准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了一般欧洲式的波动。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清楚，这些国家已經卷入了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漩渦。

……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經最終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終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渦。

.....

斗争的結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爭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对世界斗争最后将怎样解决的問題不能有絲毫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保证的。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三十三卷第 452—454 頁）

## 斯大林論十月革命与 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

——摘自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十月革命和中間阶层問題》

但是，問題不限于此。十月革命还更进一步，它力求把各被压迫民族团結在无产阶级周圍。上面已經說过，各被压迫民族中十分之九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但是，这还不能完全說明“被压迫民族”这一概念。被压迫民族通常不仅作为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受压迫，而且作为民族，即作为属于一定的民族、具有一定的語言、文化、生活方式、風俗习惯的劳动者受压迫。双重压迫的压力不能不使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革命化，不能不推动他們去同压迫的基本力量作斗争，去同資本作斗争。这种情况就成了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战争”結合，而且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同“民族战争”結合的基础。这一切不能不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范围大大地超出俄国国境以外，不能不使資本的最深远的后备力量受到打击。如果說爭取統治民族內部的中間阶层的斗争是爭取資本的最接近的后备力量的斗争，那末爭取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斗争就不能不成为爭取資本的某些最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就不能不成为殖民地各族人民和沒有充分权利的各族人民摆脱資本压迫的斗争。后面这一种斗争还远沒有結束，它甚至还

沒有取得第一批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是,由于十月革命,这个爭取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已經开始了,并且它一定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随着我們共和国联盟的实力的增长、随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而一步步扩展开来。

简单地說:十月革命真正使无产阶级从被压迫的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的人民群众中爭取資本的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开始了,十月革命第一次举起了爭取这些后备力量的斗争旗帜,——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二个功績。

我們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把农民爭取过来的。农民从无产阶级手中得到了土地,在无产阶级帮助下战胜了地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了政权,因此,他們不能不感觉到,不能不了解到他們的解放过程过去是而且将来还会是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在无产阶级的紅旗下进行。这种情况就不能不使从前农民所害怕的社会主义旗帜变成了吸引他們注意并促使他們摆脱愚昧、貧困和压迫的旗帜。

关于被压迫民族也应该这样說,而且更应该这样說。爭取民族解放的呼声,这个由解放芬兰、撤回驻波斯和中国的军队、成立共和国联盟以及給土耳其、中国、印度斯坦和埃及人民公开的道义上的援助等等事实证实了的呼声,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者口中第一次发出的。在被压迫民族的眼里,俄国从前是一面压迫的旗帜,而現在,在它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就变成了一面解放的旗帜,这一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十月革命的領袖列宁同志的名字,現在成了殖民地国家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里受压抑受摧殘的农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口中最爱戴的名字,这也不是偶然的。如果說从前,在极辽闊的羅馬帝国内,基督教被认为是受压迫受摧殘

的奴隶的救星，那末现在的情形是：在帝国主义的极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而且已经开始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毋庸置疑，这种情况大大地促进了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偏见作斗争的事业，并给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一条通向被压迫国家最遥远的角落的道路。从前社会主义者很难在被压迫国家或压迫国家的非无产阶级中间阶层中公开露面，现在他们却可以公开地在这些阶层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希望人们倾听他们的話，希望人们也许会听从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像十月革命这样一个有力的論据。这也是十月革命的成果。

简单地說：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思想扫清了通向各民族和各部落内的中間的、非无产阶级的农民阶层的道路，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旗帜变成了这些阶层所欢迎的旗帜。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三个功績。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五卷第 281—283 頁）

斯 大 林  
俄共(布)中央致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真理报》第六〇号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你们一起哀悼国民党的领袖的逝世，哀悼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自主，争取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的逝世。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毫不怀疑，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国民党一定会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伟大斗争中高举起孙中山的旗帜，国民党一定会光荣地举着这面旗帜，直到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代理人。

孙中山逝世了，——孙中山的事业万岁！孙中山的遗训永垂不朽！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见《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七卷第45页)

## 斯大林論民族問題的新階段

——摘自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會議上的演  
說《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同志們！我认为謝米奇沒有完全理解布尔什維克对民族問題的提法的实质。無論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在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維克从来沒有把民族問題和革命总問題分开。布尔什維克对民族問題的看法的实质，就是始終把民族問題和革命前途密切联系起来。

.....

这并不是斯大林个人的观点，而是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观点，俄国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現在都把民族問題和革命总問題密切联系起来看。

可以毫不勉强地說，民族問題的提法在俄国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十月革命以前的阶段，第二是十月革命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民族問題被看成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总問題的一部分，即无产階級和农民专政問題的一部分。在第二个阶段，民族問題已經扩大和轉变为殖民地問題，民族問題已經从国内問題变成世界問題，因而民族問題已經被看成是无产階級革命总問題的一部分，无产階級专政問題的一部分。可見，不論第一个阶段或第二个阶段的看法都是极共革命的。



我认为謝米奇还没有把这一切完全弄清楚。因此，他企图把民族問題貶低为立宪問題，即把民族問題看成改良問題。

这个錯誤使他产生了另一个錯誤，就是他不願意把民族問題看成实质上是农民問題。不是土地問題，而是农民問題，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問題。不能把民族問題和农民問題混为一談，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民族問題除了包含农民問題以外，还包含民族文化問題、民族国家問題等等。但是民族問題的基础，它的內在实质仍然是农民問題，这也是毫无疑义的。这也就說明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軍，沒有农民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謂民族問題实质上是农民問題，正是指这一点說的。我认为謝米奇不願意接受这种說法，是由于他过低估計了民族运动的內部威力，不了解民族运动的深刻的人民性和深刻的革命性。这是很危險的，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过低估計蘊藏在运动中，比如蘊藏在克罗地亚人爭取民族自由的运动中的潜在力量，会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全党发生严重糾紛。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七卷第 59、60—61 頁）

## 斯大林論国际形势

——摘自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向俄共(布)  
莫斯科組織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俄共  
(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总结》

### 一 国际形势

.....

第二、資本主义的稳定表现在英、美、日三国的资产阶级暂时在确定他们在中国这个能大量容纳国际資本的市場上的势力范围方面,在对中國进行掠夺的方法方面,达成了协议。能不能认为这个协议是比较牢靠的呢?还是不能。第一、因为在协议者中间由于分赃而发生过并且还会发生殊死的搏斗;第二、因为这个协议是背着中国人民达成的,中国人民是不愿意而且也不会服从外国强盜的法律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增长难道不是说明外国帝国主义的詭計注定要破产嗎?

.....

### 二 (略)

### 三 殖民地和附屬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

现在来談第三类問題。

这方面的新情况如下：

(甲) 由于各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輸出的資本增多 (这是資本主义的稳定所促成的), 資本主义在殖民地国家中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还会迅速地发展, 它正在摧毁旧的社会政治条件, 培植新的社会政治条件;

(乙) 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階級正在迅速地成长并且还会迅速地成长;

(丙) 殖民地内的工人革命运动和革命危机正在增长并且还会繼續增长;

(丁) 同时民族資产階級的某些最富裕和最有力量的阶层也在成长并且还会繼續成长, 他們害怕本国的革命比害怕帝国主义还要厉害, 因此宁願和帝国主义勾結而不願为本国摆脱帝国主义的解放事业奋斗, 从而也就出卖他們的祖国 (印度、埃及等国);

(戊) 由于这一切, 只有和妥协的民族資产階級进行斗争, 这些国家才能摆脱帝国主义而得到解放;

(己)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 在工业发达的和工业正在发展的殖民地内, 工农联盟和无产階級的領導权問題应当成为迫切的問題, 就像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 这个問題成为迫切的問題一样。

过去的情形是这样的: 人們通常总是說东方是一个同一式样的整体。現在大家都明白, 单一的、同一式样的东方已經不再存在

了，現在有資本主义发达的和資本主义正在发展的殖民地，也有落后的和正在后退的殖民地，对于这些殖民地已經不能用任何同样的尺度去衡量了。

过去，人們总是把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殖民地和附屬国内一切民族力量即从最反动的资产者起到最革命的无产者止的一条全面性的战綫。現在，在民族资产阶级分裂为革命的一翼和反革命的一翼以后，民族运动的面貌就有了一些改变。除了民族运动的革命分子以外，从资产阶级当中还产生出妥协分子和反动分子，这些人宁願和帝国主义勾結而不願为本国的解放事业奋斗。

因此，殖民地国家内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和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而首先是和农民結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中的妥协分子結成的联盟，以便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

結論只有一个：許多殖民地国家目前日益接近自己的一九〇五年。

任务就是：把殖民地国家内的先进工人团結到能够领导日益增长的革命的統一的共产党里来。

下面就是列宁早在一九二二年关于殖民地国家内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所說的話：

“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屠杀的‘胜利者’，現在連小得可怜的爱尔兰都不能战胜，連它們彼此之間在財政問題和外汇問題上的混乱都不能克服。而印度和中国在咆哮着。这就有七亿多人。如果加上周圍和它們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在那里，一九〇五年日益迫近，不可遏止地愈来愈快地迫近着。而这个一九〇五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极

大的不同之处：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的革命还能够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也就是說，沒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国卷入革命，但是現在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增长的革命却正在卷入或已經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 312 頁）

殖民地国家正面临着自己的一九〇五年，——結論就是如此。共产国际扩大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殖民地問題的決議的意义也就是如此。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七卷第 82、88—90 頁）

斯 大 林

##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东方 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担负的任务

——摘自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东方劳动者  
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论东方  
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现在来谈第二个问题，即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担负的任务问题。

这些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不同于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这些国家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生存着和发展着。

第二、双重压迫即内部压迫（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外部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迫）的存在使这些国家的革命危机尖锐化和深刻化。

第三、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国家，如印度，资本主义在迅速地发展着，因而产生和形成了人数相当多的本国无产阶级。

第四、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分裂成两部分即革命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妥协部分（大资产阶级），前者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后者则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

第五、除帝国主义联盟外，在这些国家中还形成了另一种联

盟，即工人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以摆脱帝国主义而谋求彻底解放为目的的反帝国主义的联盟。

第六、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以及使人民群众摆脱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问题，愈来愈带有迫切的性质。

第七、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同西方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

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一)不取得革命的胜利，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而获得解放，因为独立是不会无代价地得到的。

(二)不孤立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使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摆脱这个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政策，不把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织成独立的共产党，革命就不可能向前推进，资本主义发达的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就不可能争得完全的独立。

(三)没有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和西方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结合，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就不可能取得巩固的胜利。

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根据这些结论来进行革命工作。

在这些情况下，各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运动的当前任务是什么呢？

目前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特点就是：天地间不再有统一的和无所不包的殖民地东方了。从前人们把殖民地东方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和同一式样的整体。现在这种看法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现在至少有三类殖民地和附属国。第一类是像摩洛哥这样的国

家，沒有或者几乎沒有自己的无产階級，工业完全不发达。第二类是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大发达，有人数較少的无产階級。第三类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資本主义比較发达，国内有人数較多的无产階級。

很明显，决不能把所有这些国家混为一談。

在摩洛哥这类国家中，民族資产階級还不具备分裂为革命派和妥协派的基础。对于这类国家，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采取一切办法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統一战綫。在这类国家中，共产主义者只有在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对帝国主义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以后，才能結成統一的政党。

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資产階級已經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資产階級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經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統一战綫为目的。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資产階級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統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資产階級政党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任务是：揭穿民族資产階級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如果这种两重成分的政党不束縛共产党的手脚，不限制共产党进行宣傳鼓动工作的自由，不妨碍把无产者团結在共产党周圍，并且能使共产党便于对革命运动进行实际领导，那它就是需要的和适当的。如果这种两重成分的政党不符合这一切条件，那它就是不需要的和不适当的，因为它只会使共产主义者融化在資产階級中間，使共产党失去无产階級大軍。



像印度这类国家的情况就有些不同。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基本的和新的情况不但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而且首先在于这个阶级的妥协部分基本上已经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这部分资产阶级最富裕，最有势力，他们害怕革命比害怕帝国主义更厉害，关心自己的钱袋比关心自己祖国的利益更多，因此他们的两只脚都站在革命的死敌的阵营中，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不摧毁这个联盟，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要摧毁这个联盟，就必须集中火力反对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揭穿他们的背叛行为，使劳动群众摆脱他们的影响，并且要不断地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准备必要的条件。换句话说，问题是要在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培养无产阶级去担当解放运动的领袖，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和它的代言人从这个光荣的岗位上挤下去。任务就是建立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并且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这个联盟可以采取表面上由统一的纲领联系起来的统一的工农政党的形式，但不是永远必须采取这种形式。在这类国家中，维护共产党的独立性应当是先进的共产主义者的基本口号，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为无产阶级领导权准备条件并实现这一领导权。但是共产党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翼建立公开的联盟，以便孤立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城乡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群众去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因此，资本主义发达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的当前任务是：

(一)把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并且建立独立的共产党。

(二)建立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联盟以反对

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联盟。

(三)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

(四)为使城乡小资产阶级摆脱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斗争。

(五)保证解放运动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

这就是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积极工作者的三类当前任务。

如果就目前国际形势来考察这些任务，那末它们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和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国际形势的特征是：革命运动已经进入了暂时的平静时期。什么是平静呢？目前它能说明什么呢？它只能说明对西方工人、对东方殖民地、而首先是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旗手苏联的压力的加强。几乎用不着怀疑，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开始了。因爱沙尼亚的起义<sup>①</sup>而进行诬蔑性的宣传，因索非亚爆炸事件而无耻地攻击苏联，资产阶级报刊的一致攻击我国，——这一切都是进攻的准备阶段。这是舆论上的炮火准备，其目的是训练庸人来攻击苏联并且替武装干涉创造道义上的前提。这种造谣诬蔑性的宣传的效果如何，帝国主义者会不会冒险实行大规模的进攻，——这我们还要看一看。但是这些攻击注定对于殖民地不会有什么好处，这一点恐怕是没有理由怀疑的。因此，准备革命的联合力量去反击可能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打击，这是当前必然产生的问题。

<sup>①</sup> 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列维里(塔林)的工人武装起义。起义是由爱沙尼亚法庭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对一百四十九个被控告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政治犯案件的判决激起的。按照这一判决，大多数被告被判处多年苦役徒刑，其中三十九人被判处终身苦役徒刑，而爱沙尼亚工人的领袖汤普则被枪决。这次起义被爱沙尼亚反动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斯大林全集》编者注

正因为如此，坚决完成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当前任务，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这种种情况下，东方民族大学对殖民地和附属国所負的使命是什么呢？这个使命就是：考虑这些国家革命发展的一切特点，培养来自这些国家的干部，以便保证上述各项当前任务的完成。

东方民族大学的学生大約分为十个不同的班，他們来自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大家知道，这些同志渴望光明和知識。东方民族大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同志造就成真正的革命者，造就成由列宁主义的理論武装起来的、具有列宁主义的实际經驗的、能够真心誠意地完成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当前任务的革命者。

在这里，必須注意到在殖民地东方的积极工作者的实践中所存在的两种倾向。为了培养真正的革命干部，必須同这两种倾向作斗争。

第一种倾向就是过低估計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过高估計在这些国家建立无所不包的民族統一战綫的思想，而不考虑这些国家的状况和发展程度。这是一种右的倾向，它包藏着降低革命运动的作用，使共产主义者的歌声融和在资产阶級民族主义者的大合唱里的危險。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是东方民族大学的直接义务。

第二种倾向就是过高估計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和过低估計工人阶級和革命资产阶級的反帝国主义联盟的工作。爪哇的共产党人似乎有这种倾向，他們在不久以前錯誤地提出了在本国建立苏維埃政权的口号。这是一种左的倾向，它包藏着脱离群众，使共产党变成宗派的危險。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是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培养真正的革命干部的必要条件。

---

东方民族大学对苏維埃东方和殖民地东方的各族人民所担負的政治任务大体上就是这样。

我們希望东方民族大学能够光荣地完成这些任务。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七卷第 121—127 頁)

## 斯大林論民族問題的 實質為農民問題

——摘自一九二五年六月《再論民族問題》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在我的演說（見《布尔什維克》雜誌第七期）中曾經肯定地說，謝米奇“不願意把民族問題看成實質上是農民問題”<sup>①</sup>。

這樣說對不對呢？

請你們讀一讀謝米奇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說中的一段話，請你們自己判斷吧：

謝米奇問道：“南斯拉夫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是什麼呢？”

他接着就答道：“這個社會內容就是塞爾維亞資本同克羅地亞資本和斯洛文尼亞資本之間的競爭。”（見謝米奇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斯洛文尼亞資產階級和克羅地亞資產階級同塞爾維亞資產階級之間的競爭在這裡不能不起一定的作用，這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把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說成是各個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競爭的人，不會把民族問題看成實質上是農民問題，這同樣是毫無疑義的。現在，當民族問題已經從地方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

<sup>①</sup>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卷第 61 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世界的問題，变成殖民地和从屬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問題的时候，民族問題的实质是什么呢？現在民族問題的实质是：殖民地和从屬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統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資產階級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的財政剝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在民族問題的这种提法下，各个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竞争能有什么意义呢？无疑是沒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在某种場合連重大的意义都沒有。十分明显，这里的問題主要不在于某一个民族的資產階級在竞争中打敗或者可能打敗另一个民族的資產階級，而在于統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集团剝削和压迫殖民地和从屬民族的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帝国主义集团压迫和剝削他們，就促使他們加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他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如果把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归结为各个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竞争，就不能把民族問題看成实质上是农民問題。反过来说，如果把民族問題看成实质上是农民問題，就不能把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說成是各个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竞争。在这两个公式之間是无论如何不能划等号的。

謝米奇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末所写的《馬克思主义和民族問題》这本小册子中的一句話。那里說道：“在資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資產階級之間的斗争。”显然，他想用这句話来暗示他給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的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写的，当时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の問題，当时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被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被看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从那时候起，国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

問題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階級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太可笑了。早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列宁在他的《关于自决問題的爭論总结》<sup>①</sup>一文中就說过:民族問題中自决权这个要点已不再是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經成为整个无产階級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更不用說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后来論述民族問題的著作了。既然如此,那末在現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了新的时代即无产階級革命的時代的时候,謝米奇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小册子中的一些話能有什么意义呢?只能有这样的意义:謝米奇离开空間和时间,离开当前的历史环境来引证別人的話,因而違反了辯证法最基本的要求,他沒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可能是不正确的。我在南斯拉夫委员会會議上所做的演說中說过,俄国布尔什維克对民族問題的提法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十月革命以前的阶段和十月革命阶段。前一阶段进行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族問題被看做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后一阶段进行的已經是无产階級革命,民族問題已經成为无产階級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区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恐怕謝米奇还没有理解民族問題提法的两个阶段之間的这种区别的用意和意义。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謝米奇企图不把民族运动看成实质上是农民問題,而把它看成各个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竞争問

---

<sup>①</sup>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二卷第 314—354 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題，“是由于他过低估計了民族运动的內部威力，不了解民族运动的深刻的人民性和深刻的革命性”（見《布尔什維克》杂志第七期）<sup>①</sup>。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七卷第 183—186 頁）

---

<sup>①</sup>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卷第 61 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斯 大 林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摘录)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 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摘自第一部分《国际形势》第二节

现在来谈第二类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方面的主要事实是：各殖民地的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增长，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和战争以后；这些国家的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其中包括本国知识分子的增多；各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增长以及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的总危机；印度和埃及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叙利亚和摩洛哥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中国反对英日美帝国主义等等的解放斗争；印度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增长以及这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的增长。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列强当前有丧失它们的主要后方即殖民地的危险。资本主义的稳定在这方面是不巩固的，因为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逐步增长，有些地方(摩洛哥、叙利亚、中国)已经

开始采取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显然是担负不了制服“自己的”殖民地的任务的。

有些人——特别是资产阶级作家——说殖民地危机的增长应归咎于布尔什维克。我应当说，人家把这一点归咎于我们，未免太看得起我们了。遗憾得很，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直接帮助各殖民地国家争取解放。必须深入一层地去寻找原因。除了其他一切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欧洲各国必须向美国缴付利息，因此它们不得不加紧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这样就不能不使这些国家的危机和革命运动增长起来。

这一切都说明世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情况是坏透了。如果说在那方面，在第一类矛盾方面，欧洲资本主义已经局部稳定，无产阶级在最近期间夺取政权的问题暂时还没有列入日程，那末殖民地危机却已经达到顶点，从许多殖民地中逐走帝国主义者的问题已经列入日程了。

## 二 关于苏联宣传的问题

——摘自第一部分《国际形势》第六节

《苏联的外部状况》

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不论在欧洲或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都进行着特种宣传来反对帝国主义。英国保守党人硬说，俄国共产党人是一些负有摧毁不列颠帝国威力的使命的人。我想在这里声明，这一切完全是胡说。我们不需要在西方或东方进行任何特种宣传，因为各国工人代表团亲自到我们这里来认识我国制度并且把关于我国制度的消息传到西方各国去。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宣

傳。这是拥护苏維埃制度反对資本主义制度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和最有效的宣傳。（鼓掌）

有人說我們在东方进行宣傳。我肯定說，这也完全是胡說。我們不需要在东方进行任何特种宣傳，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整个国家制度是建立在我国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和兄弟般合作的基础上的。到我国来住过半年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埃及人，每一个印度人，都有可能深信，我国是唯一了解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心意的国家，是唯一能使从前統治民族中的无产者和从前被压迫民族中的无产者彼此合作的国家。我們不需要在东方进行任何其他宣傳，也不需要在此进行任何其他鼓动，只要那些来自中国、印度和埃及的代表团在我們这里进行研究和考察以后把关于我国制度的消息傳到全世界去就行了。这是最好的一种宣傳，是各种各样宣傳中最有效的一种宣傳。

然而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而且一定会摧毁不列顛帝国。这就是英国保守党人。这是一种必定会把不列顛帝国引向灭亡的力量。只要回忆一下保守党人上台执政<sup>①</sup>时所实行的政策就够了。他們是从哪方面开始的呢？是从制服埃及、加紧压迫印度、干涉中国等等开始的。这就是保守党人的政策。既然英国貴族沒有本領施行別的政策，那末又能怪誰呢？又能責备誰呢？既然保守党人走上这条道路，那末他們必定会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把不列顛帝国引向灭亡，这难道还难懂嗎？

<sup>①</sup> 指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代替麦克唐納工党政府上台执政的鲍尔温—奧斯汀·張伯倫保守党政府。——《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 三 中国革命的力量

——摘自第一部分《国际形势》第六节

《苏联的外部状况》

关于日本，现在我来讲几句话。在西方，我们的某些敌人洋洋得意地说：看呀，中国境内已经开始了革命运动，这当然是布尔什维克收买了中国人民，不是他们又有谁会收买四万万中国人民呢？而这就一定会使“俄国人”和日本人打起来。同志们，这一切都是胡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这种力量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它在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执政者看不见这种力量，不充分估计这种力量，他们一定要吃亏。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不能不估计到这一力量。我们认为目前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从前美国在统一为一个国家时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就是从前德国在形成为一个国家和实现统一时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也就是从前意大利在实现统一和逐走外敌时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这里真理和正义完全在中国革命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情并且将来还会同情中国革命，同情它为使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并把中国统一为一个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谁在现在和将来不估计到这一力量，谁就一定要失败。我想日本一定会了解，中国民族运动这一日益壮大的力量，这一不断前进并在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力量，是日本也应该估计到的。张作霖之所以必定灭亡，正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一点。但是他的必定灭亡，还由于他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建筑在使苏日两国发生纠纷和关系恶化这个基础上。满洲的任何一个将军，任何一个执政者，要是他把自己的政策建筑在使我国和日本发生纠纷，使我国和日本的关系恶化

这个基础上，他就一定会遭到灭亡。他們中間只有把自己的政策建筑在使我国和日本的关系好轉，使我国和日本接近这个基础上的人，才能站住脚跟，只有这样的將軍和执政者才能在滿洲坐穩，因为使我国同日本关系尖銳化对我們是沒有好处的。我国只有同日本接近才有好处。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卷  
第 223—224、241—242、242—243 頁）

## 斯大林

# 論中国革命的前途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們！在談到本題以前，我认为必須声明，关于中国問題，我手头缺乏展示中国革命全貌所必需的詳尽材料。因此，我不得不只談儿点帶原則性的和中国革命基本方向問題有直接关系的一般意見。

关于中国問題，我有彼得罗夫的提綱、米夫的提綱、譚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費斯的意見书。我认为所有这些文件虽然各有长处，可是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們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問題。我认为首先必須注意这些缺点。因此，我的意見将同时帶有批判性质。

###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

列宁說过，中国人在最近期間将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某些同志把这句話了解为在中国人那里一定会一模一样地重演我們俄国一九〇五年所发生过的事情。同志們，这是不对的。列宁根本不是說中国革命将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翻版。列宁只是說中

国人将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这就是說，除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一般特点外，中国革命将还有它自己独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一定会給中国革命印上自己的特別标记。

这些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的民族解放革命。这就是它首先和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不同的地方。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不仅表现在它的軍事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中国工业的命脉即铁路、工厂、矿山、銀行等都处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配或控制之下。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作斗争的問題不能不在中国革命中发生重大作用。这就使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无产者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直接连接起来。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軟弱，它比一九〇五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軟弱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工业的命脉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手里，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会不軟弱和落后。在这一方面，米夫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軟弱是中国革命特有的事实之一，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应该得出結論，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領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

同时不应该忘記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在中国旁边有苏联存在着并且发展着，它的革命經驗和它的帮助必然使中国无产阶级易于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紀封建残余的斗争。

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就是如此。

## 二 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

上述提綱的第一个缺点是它們都忽略了或低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問題。要是細讀这些提綱，就可能认为目前中国其实并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只有北軍对南軍的战争，或一派軍閥对另一派軍閥的战争。并且有些人惯于把干涉了解为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外国軍隊开入中国境内的事实；如果没有这种事实，那就不是干涉。

同志們，这是极严重的錯誤。干涉决不限于軍隊入境，而軍隊入境也决不是干涉的主要特点。在資本主义国家現今革命运动的条件下，在外国軍隊直接入境可能引起許多抗議和冲突的时候，干涉已帶有比較圓滑的性质和比較隱蔽的形式。帝国主义在現今的条件下进行干涉，偏重于采取在附屬国内組織內战的办法，采取資助反革命势力反对革命的办法，采取在精神上和財政上支持其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办法。帝国主义者喜欢把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弗兰格里反对俄国革命的斗争描繪为純粹的国内斗争。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不仅我們，連全世界都知道，站在这些反革命的俄国將軍背后的是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假使沒有他們的支持，俄国根本不会有严重的內战。关于中国也必須这样說。假使各国帝国主义者不鼓励吳佩孚和孙傳芳、張作霖和張宗昌，假使各国帝国主义者不供給他們款項、軍械、教官、“顧問”等等，这些反革命軍閥反对中国革命的斗争簡直是不可能的。

广东軍隊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他們有思想，有热情，这鼓舞着他們为解除帝国主义的羈絆而斗争，在于他們給中国带来解放。



中国反革命軍閥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他們背后站着各国帝国主义者，站着中国所有一切铁路、租界、工厂、銀行和洋行的老板。

因此，問題不仅仅在于或者甚至并不在于外国军队的入境，而在于各国帝国主义者給予中国反革命的援助。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这是現在帝国主义干涉的主要特点。

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是毫无疑問的事实，中国革命也正是把自己的鋒芒指向这一事实。

因此，誰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事实，誰就是忽略或低估中国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

据說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广东派和整个中国革命有表示“好感”的某些迹象。据說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这方面也不落后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同志們，这是自己騙自己。必須善于区别帝国主义者（包括日、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的本质和它的伪装。列宁常說，革命者很难被棍棒和拳头制服，可是，他們有时却很容易被亲善制服。同志們，永远不要忘记列宁說的这个真理。不管怎样，显然日、美帝国主义者倒很好地領会了这个真理的意义。因此，必須把帝国主义者对广东派的亲善和恭維跟下述事实严格地区分开来：殷殷地表示亲善的帝国主义者紧紧地抓住“自己”在中国的租界和铁路，无论如何不肯放棄。

### 三 中国的革命军队

对于上述提綱的第二个意見是关于中国革命军队的問題。因为军队問題在这些提綱中都被忽略或低估了。（有人喊道：“对！”）提綱的第二个缺点就在这里。通常不是把广东军队的北进看做中

國革命的展開，而是看做廣東軍閥對吳佩孚和孫傳芳的戰爭，看做一些軍閥和另一些軍閥爭雄稱霸的戰爭。同志們，這是極嚴重的錯誤。中國的革命軍隊是中國工农爭取自身解放的極重要的因素。在今年五月或六月以前，有人估計馮玉祥軍隊失敗後中國的局勢是反動勢力得勢，可是後來，在今年夏天，當廣東派常勝軍向北推進而占領湖北時，局面就根本改觀而有利於革命了，難道這是偶然的嗎？不，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廣東軍隊的推進就是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對其中國走狗的打擊，就是一般地給中國一切革命分子，特別是給工人以集會自由、罷工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中國革命軍隊的特點和極重要的意義就在這裡。

從前，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革命是這樣開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沒有武裝或武裝很差的人民舉行起義，他們和舊政權的軍隊發生衝突，他們竭力瓦解這種軍隊，或者至少把一部分軍隊拉到自己方面來。這是過去革命爆發的典型形式。一九〇五年我們俄國的情形也是這樣。中國的情況卻不同。在中國，和舊政府的軍隊對抗的，不是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為代表的武裝的人民。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裡。

這就是為什麼對革命軍隊的過低估計是上述提綱的不可容許的缺點。

由此應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特別注意軍隊工作。

第一、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盡力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軍隊成為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範的體現者。這一點所以特別必要，因為和國民黨沒有絲毫共同點的各種各樣的軍閥現在都依附廣東派，依附這個正在摧毀中國人民公敵的力量，而他們在依

附广东派时，也把腐化作風帶进了軍队。要使这种“同盟者”不发生坏影响，或者使他們成为真正的国民党人，只有加强政治工作并建立对他們的革命监督才能办到。不这样做，軍队就会陷于极困难的境地。

第二、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內，应当着手深入研究軍事。他們不应当把軍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因为軍事在中国現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中国革命者，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应当学好軍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軍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要使中国革命軍队循着正确道路徑向目的前进，其保证就在这里。不这样做，軍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

#### 四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第三个意見是提綱中对于中国未来革命政权性质的問題沒有估計到或者估計不足。米夫在他的提綱中接触到这个問題，这也就是他的貢獻。但是他在接触到这个問題的时候，不知道怕什么，不敢把問題彻底闡明。米夫认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期也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革命的政党。这是不是說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社会革命党人一孟什維克的政权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社会革命党人一孟什維克的政权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政权，而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里有根本的差别。

麦克唐納政府甚至是“工人的”政权，但它同时又是帝国主义

的政府，因為它是以保存英國的帝國主義政權例如在印度和埃及的政權為基礎的。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優於麥克唐納政府的地方就是它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

問題不僅在於廣東政權（未來全中國革命政權的萌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而首先在於這個政權是並且不會不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這個政權的每一進展都是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打擊，因而也是有利於世界革命運動的打擊。

列寧說得對，既然從前，在世界革命時代到來以前，民族解放運動是整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那末現在，在俄國蘇維埃革命勝利和世界革命時代到來以後，民族解放運動就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了。

這個特點米夫沒有估計到。

我以為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就其性質來說，大體上將類似我們在一九〇五年所說的那種政權，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然而有一個差別，這主要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

這將是中國走向非資本主義發展，或者更確切些說，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

這就是中國革命應當走的方向。

下面三種情況有利於這條革命的發展道路：

第一、中國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它將把自己的鋒芒指向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

第二、中國的大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的，比一九〇五年時期俄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更軟弱，這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使無產階級政黨對中國農民的領導易於實現；

第三、中國革命將在可能利用蘇聯勝利了的革命的經驗和幫

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

这条道路是否一定胜利并且绝对胜利，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正是为中国革命的这条发展道路而斗争。

由此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怎样对待国民党和中国未来革命政权这个问题上的任务。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

但是，中国共产党可不可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呢？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参加。中国革命的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

真正实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保证之一就在这里。

## 五 中国的农民问题

第四个意见是关于中国的农民问题。米夫认为必须立即提出成立苏维埃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口号。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米夫往前跑得太远了。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而且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的问题现在还不是迫切的问题。此外，必须注意，不能脱离环境来看苏维埃。苏维埃，这里说的是农民苏维埃，只有在中国已处于摧毁旧事物并创造新政权之农民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并且估计到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才组织得成。可以不可

以說中国农民和整个中国革命已經进入这个阶段了呢？不，不可以。因此，現在談苏維埃就是往前跑得太远了。因此，現在應該提出的不是苏維埃的問題，而是成立农民委员会的問題。我是指由农民中选举出来的农民委员会，这种农民委员会能够規定农民的基本要求，并将采取一切办法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些要求。这种农民委员会应当成为一种樞軸，使农村中的革命在其周圍展开。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間，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間，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們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同志們，这是极端荒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綫就愈有力愈强大。提綱起草人，特别是譚平山和拉費斯說得完全正确，他們断言立即滿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我认为現在應該打破某些国民党分子行动中所表現的对农民的冷淡和“中立”了。我认为不論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也就是广东政权）都应当立即从言論轉到行动，提出立刻就滿足农民最切身要求的問題。

在这方面前途会怎样，可以而且應該达到什么程度——这要看革命的进程而定。我以为归根到底應該引导到土地国有化。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誓死拒絕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

为了喚起中国千百万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者应当走哪些道路呢？

我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可以談到的只有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成立农民委员会以及中国革命者加入这种委员会来影响农民的道路。（有人喊道：“可是农民协会呢？”）我认为农民协会将聚集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圍，或者把农民协会变成农民

委员会，使它具有为实现农民的要求所必需的某种权力。关于这条道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只有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如果以为中国有足够的革命者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可笑了。中国约有四亿人口。其中约三亿五千万是汉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如果以为几万个中国革命者就能汲干这个农民的汪洋大海，那就弄错了。这就是说，还需要其他道路。

第二条道路就是通过新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机关来影响农民的道路。无疑地，在新解放的省份里将成立广东政权这种类型的新政权。无疑地，这种政权和这种政权的机关，如果要真正推进革命，就应当设法满足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和一般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加入新政权机关，使这个机关接近农民群众，并通过这个机关来帮助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

第三条道路就是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我已经讲过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极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军队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它第一个打进新的省份，它第一个深入农民群众，农民首先凭它来判断新政权，判断新政权质量的好坏。农民对新政权、对国民党和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态度，首先是看革命军队的行为，看它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看它帮助农民的决心而定的。如果注意到有不少可疑分子混进了中国革命军队，这些分子可能使军队的面貌变坏，那就可以明白军队的政治面貌以及它的农民政策在农民心目中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一般中国革命者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使军队中反农民的分子不发生坏影响，保持军队的革命精神，并做到使军队帮助农民，唤起农民参加革命。

据说在中国，人们都热烈欢迎革命军队，但是后来，在军队驻

扎下来以后，就有些失望了。我們苏联在国内战争时期也有过同样的情形。这是由于军队解放了新的省份而在那里驻扎下来的时候，不得不这样或那样地靠周围的居民来养活。我們苏联革命者通常用如下的方法能够弥补这些缺点：我們竭力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必須使中国革命者也学会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来弥补这些缺点。

## 六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第五个意見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问题。我认为在提綱中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强调得不够。拉费斯問道：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面向誰——面向国民党的左派还是中間派？奇怪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当面向无产阶级，并使中国解放运动的活动者都面向革命。只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正确。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間，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改善他們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而举行罢工是不应该的，劝告工人不要罢工。（喊声：“广州和上海都有过这样的事情。”）同志们，这是很大的錯誤。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无阶级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綱中应当指出这一极端不好的现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势，帮助工人（即使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們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錯誤。如果这样，中国还要革命做什么呢？在罢工时期，无阶级的子女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无论如何必須消灭这种中世紀的禍害，使中国无产者感到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使他們能够领导革命运动。沒有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休想获得胜利。



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为了认真改善他们的地位而提出的经济和法律的要求，应当在提纲中占有适当地位。（米夫說：“在提纲中已經說到这一点。”）是的，在提纲中已經說到这一点，但是可惜这些要求提得不够突出。

## 七 中国的青年問題

第六个意見是关于中国的青年問題。真奇怪，提纲中竟沒有考虑到这个問題。然而青年問題現在在中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譚平山的报告中讲到了这个問題，但是可惜讲得不够突出。青年問題現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如果使他們受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話，都是一种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力量<sup>①</sup>。必須注意，誰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銳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誰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尖銳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須和这种压迫作斗争。就尽力加强青年工作这一点來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应当尽量估計到这种情况。在中国問題的提纲中，青年应当占有自己的地位。

## 八 几个結論

我想就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农民問題方面指出几个結論。

<sup>①</sup> 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人和或多或少左傾的国民党人的联盟，执行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政策。后来这种政策由于不再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而被取消了，因为国民党已經离开了革命并且后来变为反对革命的中心，而共产党人則与国民党决裂，退出了国民党。——斯大林

無疑地，中國共產黨現在不能只限于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了。現在甚至連張學良這樣的反革命者也贊成這個要求了。顯然，中國共產黨應當更進一步。

其次，必須在自己面前提出鐵路國有的問題作為遠景。這是必要的，而且應該向這一方面做去。

再其次，必須注意到把最重要的工廠收歸國有的遠景。在這方面首先擺着的問題是把那些對中國人民特別仇視和特別富于侵略性的業主的企業收歸國有。接着必須把農民問題向前推進，使它与中國革命前途聯繫起來。我認為最後還應該做到為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國有。

其餘的問題是不言而喻的。

同志們，我想提出的意見就是這些。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八卷第321—334頁）

## 斯大林論帝國主義者炮轟南京事件

——摘自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  
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  
國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現在讓我談談第二個問題，關於南京事件的問題。我想，南京事件對我們來說不應該是件意外的事情。沒有暴力和掠奪，沒有流血和槍殺，帝國主義就活不下去。這就是帝國主義之所以為帝國主義。因此，南京事件對我們來說不能是件意外的事情。

南京事件說明了什麼呢？

它的政治意義在哪裡呢？

南京事件說明在帝國主義的政策中發生了轉折，就是從武裝的和平轉變為反對中國人民的武裝的戰爭。

在南京事件發生以前，帝國主義竭力用和平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花言巧語，用“文明”和“博愛”的假面具，用國際聯盟等等來掩蓋它的意圖。而在南京事件發生以後，帝國主義卻把這些花言巧語、不干涉、國際聯盟以及其他一切假面具統統拋棄了。現在帝國主義在全世界面前完全現出它那公開的掠奪者和壓迫者的原形了。

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又受到一次致命的打擊。老實說，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的歌頌者，如彭庫爾之流和布萊夏德之流，除了他

們的騙人的和平主義言詞以外，還能拿什麼來對抗槍殺南京居民的事實呢？

國際聯盟又挨了一個耳光。國際聯盟的一個會員國槍殺另一個會員國的居民，而國際聯盟本身卻裝聾作啞，推說此事與己無關，這一事實，除了帝國主義的走狗以外，還有誰會認為是“正常的”呢？

這就證明我們黨是正確的，它估計到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開往上海就是武裝進攻中國人民的前奏曲。因為現在，除了瞎子以外，誰都看得清帝國主義所以需要在上海駐紮軍隊，就是為了從“言論”轉到“行動”。

南京事件的意義就是如此。

帝國主義者敢於在南京進行冒險，他們的意圖是什麼呢？

帝國主義者摘下自己的假面具，把炮轟南京提到日程上來，也許是想扭轉歷史的車輪，撲滅各國蓬勃發展的革命運動，並為恢復帝國主義大戰前曾有過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而鬥爭。

大家知道，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大戰中受到了無法醫治的創傷。

大家知道，約在十年前，蘇聯的工人和農民突破了資本的陣綫，帶給它無法醫治的創傷。

大家知道，帝國主義戰爭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中的統治基礎。

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爆發後十年，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也開始向帝國主義陣綫進攻，並且沒有任何根據來推斷說，他們不能完全突破這條陣綫。

帝國主義者也許想一舉而把這一切消滅干淨，揭開歷史的“新

的一頁”。如果他們真妄这样做，那就必須承认他們是犯了很大的錯誤。因为只有老糊塗才会以为大炮的規律胜过历史的規律，才会以为炮轰南京可以扭轉历史的車輪。

帝国主义者也許想用炮轰南京的行动来恐吓其他各国奋力爭取自由的被压迫的人民，似乎對他們說：南京的故事就是給你們的教訓。同志們，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恐吓政策在帝国主义的历史上是有其“根据”的。但这种政策是沒有用的，是达不到目的的，这一点几乎用不着怀疑。当年俄国沙皇政府也曾“有效地”采用过这种政策。但其結果如何呢？你們知道，它是以沙皇制度的完全复灭而告終的。

最后，帝国主义者也許想用炮轰南京的行动来打击中国革命的心臟，一則使中国南方的軍隊不能繼續前进，使中国不能統一，二則使汉口的租界談判所議定的那些条件不能实现。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許完全是这样的。为了“更便于机动”，帝国主义者不願有一个統一的中国而宁願有两个中国，关于这一点，资本主义报刊已經透露好几次了。至于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租界，那几乎用不着怀疑，很多帝国主义者是“不同情”在汉口拟定和批准的那些条件的。因此，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看来是想以此說明：他們宁願将来在压力下和在炮火伴奏下与国民政府进行談判。帝国主义者的音乐趣味就是如此。这种奇怪的音乐很像吃人者的音乐，看来这並沒有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难以为情……

他們能否达到他們的目的，最近将来的事实就会表明。然而必須指出，他們目前所达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加深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困結了国民党的力量，使中国革命运动又往左移动了一步。

几乎用不着怀疑，他們目前所得到的正是相反的結果。

由此可見，帝國主義者炮轟南京想得到的是一種結果，而事實上所得到的是一種結果，並且是和他們的初衷完全相反的結果。

這就是南京事件的結果和前途。

這就是保守陣營中的聰明人的政策。

俗語說得好，上帝注定誰死亡，他就奪去誰的理智。（熱烈鼓掌，經久不息。）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九卷第 178—182 頁）

## 斯 大 林 給 邱 貢 諾 夫 的 信

回信太迟，請原諒。

(一)一九一二年列宁对孙中山的批判<sup>①</sup>当然沒有过时，仍旧有效。但这个批判所涉及的是旧的孙中山。要知道孙中山并非始終站在一点上。他是向前发展的，正像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一样。十月革命以后，特別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列宁对孙中山很尊敬，这主要是孙中山开始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近和合作的緣故。談到列宁和孙中山主义的时候，必須注意到这种情况。这是不是說孙中山已經是共产主义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孙中山主义和共产主义(馬克思主义)之間的差別仍旧存在。中国共产党人所以和国民党人在一个党内即国民党内合作，則是由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权、民族、民生，对中国革命发展現阶段上的共产党人和孙中山主义者在国民党内共同工作來說，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基础。

有人說，俄国有一个时期也曾面临資产階級民主革命，可是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並沒有加入一个共同的党。这种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据的。問題在于俄国当时在民族方面并不是一个被

<sup>①</sup> 見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八卷第151—157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压迫的国家(它不反对自己压迫其他民族),因此,在俄国就沒有把全国各种革命力量联合成一个統一陣营的强大的民族因素,而在現时的中国,民族因素不仅存在,并且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这个因素决定着国民党内部中国各种革命力量相互关系的性质。

(二)我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sup>①</sup>中沒有一句話說到“对日让步”,更沒有說到“牺牲中国”来“对日让步”。这样說是不严肃的,邱貢諾夫同志。我在那个报告中仅仅說到对日本的友好关系。从外交观点看来,友好关系是什么呢?这就是說,我們不願和日本打仗,我們坚持和平政策。

(三)至于說到美国的两面政策,那末这种两面性是如此清楚明白,簡直用不着解釋了。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約·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九卷第 183—184 頁)

---

<sup>①</sup>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卷第 242—243 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 斯 大 林

# 中国革命問題

——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給宣傳員的提綱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真理报》第九〇号)

### 一 中国革命的前途

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

(甲)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財政經濟的統治；

(乙)因軍閥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

(丙)千百万工农群众日益发展的反封建官僚压迫、反軍閥、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軟弱性，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賴性，它对革命运动規模的畏惧；

(戊)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

(己)中国邻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

由此就产生了中国事件发展的两条道路：

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結起来，共同进攻革命，以便建立資本主义的統治而結束革命；

或者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

权，率領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轉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軌道上，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結果。

二者必居其一。

世界資本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这一专政的經驗可为中国无产阶级有成效地加以利用）大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走第二条道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基本上是以統一战綫来进攻中国革命的，現时在帝国主义者中間已沒有像十月革命以前存在于帝国主义陣营内部并削弱了帝国主义的那种分裂和战争，——这一事实說明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要比俄国革命多得多，在这一革命进程中，投敌和叛变的事件也将比苏联內战时期多得多。

因此，这两条革命道路之間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中国革命的第二条道路的胜利而奋斗。

## 二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在第一次北伐时期，当国民革命軍迫近长江，节节胜利，而工人和农民的强大运动还来不及展开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买办）是和革命一道前进的。这是全民族联合战綫的革命。

这并不是說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間沒有矛盾。这只是說，民族资产阶级在支持革命时，竭力利用革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限

制革命的規模，使革命主要沿着爭夺地盘的路綫进行。这个时期国民党内右派和左派間的斗争就是这些矛盾的反映。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要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的企图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重大的企图。大家知道，当时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須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綫”，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們开除出去”（一九二六年四月）。

这条路綫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統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紀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紀律，就利用他們，利用他們的联系和他們的經驗，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紀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們逐出国民党。

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綫的正确性。农村中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以及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城市里汹涌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会委员会的成立，国民革命軍向帝国主义海陆軍包围着的上海的胜利推进，——諸如此类的事实都說明当时所采取的路綫是唯一正确的路綫。

只有这一情况能够說明下列事实：一九二七年二月国民党右派企图分裂国民党并在南昌成立新中央，这一企图在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一致反对之下遭到了破产。

但这个企图是一种征兆，表示国内正进行着阶级力量的重新結合，右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安心，他們将加紧反革命的工作。

因此，联共（布）中央在一九二七年三月說得很对：

（甲）“現在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結合和帝国主义軍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它进一步的胜利只有在发展群众运动这一坚定的方針之下才有可能”；

(乙)“必須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变为拥有武装自卫力量的实际政权机关的方针”；

(丙)“共产党不应当隐瞒国民党右派的背叛的和反动的政策，应当用揭穿右派的办法把群众动员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因此不难了解，后来革命的巨大规模和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袭击，不能不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抛入反革命的阵营，正像国民革命军的占领上海和上海工人的罢工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样。

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南京的炮声在这方面就成了中国斗争力量重新划清界限的信号。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并提出最后通牒，是想表明他们在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共同反对中国革命。

蒋介石屠杀工人群众并实行政变，就像是响应帝国主义者的号召，表明他决心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

### 三 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

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紳和封建地主、反軍閥和蔣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这就是說，革命的两条道路之間的斗争，拥护进一步展开革命的人們和主張消灭革命的人們之間的斗争，将日益加剧，充滿当前整个革命时期。

这就是說，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軍閥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而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集团既然脱离工农并勾結帝国主义，終究要遭受和軍閥同样的命运。

由此可見，保持国民党的統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这个政策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們消灭干淨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沒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

其次，由此可見，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現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合作反映出国民党外漸漸形成的工农联盟，沒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再其次，由此可見，革命的国民党的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展开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組織——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以及其他作为将来苏維埃的准备因素的群众革命組織，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是千百万劳动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增长，而对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則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

最后，由此可見，共产党在与革命的国民党人在同一队伍中战

斗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保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必要条件。

#### 四 反对派的錯誤

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錯誤是他們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現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

反对派要求中国革命以类似十月革命的速度发展起来。反对派不滿上海工人沒有去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决战。

但是他們不懂得中国革命不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其中原因之一是目前国际环境不像一九一七年那样有利(帝国主义者之間沒有战争)。

他們不懂得在后备軍还没有跟上的不利条件下是不能进行决战的，例如布尔什維克不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或七月都沒有进行决战。

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不避免决战(在可以避免的时候)就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反对派要求立即在中国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維埃。然而現在成立苏維埃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苏維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苏維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別高漲的时期才能成立。

第二、苏維埃不是为了空談而成立的，苏維埃首先是作为和現存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而成立的。一九〇五年的情况是这样，一九一七年的情况也是这样。

但在目前，例如在武漢政府活動地區內成立蘇維埃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提出反對這個地區內的現存政權的口號，這就是說，提出成立新的政權機關的口號，提出反對革命的國民黨（和左派國民黨人結成聯盟的共產黨人也加入其中）的政權的口號，因為現時在這個地區內，除了革命的國民黨的政權而外，並沒有其他的政權。

其次，這就是說，把兩種任務混淆起來了。一種任務是成立和鞏固現在革命的國民黨所依靠的工农群眾組織，例如罷工委員會、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工會委員會、工廠委員會等等；另一種任務是成立作為新型國家政權的蘇維埃制度以代替革命的國民黨的政權。

最後，這就是說，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目前處於什麼階段。這就是說，給中國人民的敵人以新的武器來和革命作鬥爭，來製造新的傳奇，說中國現在不是在進行民族革命，而是在人為地移植“莫斯科的蘇維埃化”。

可見反對派提出在目前成立蘇維埃的口號是有利於中國革命的敵人的。

反對派認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不適當的。因此，反對派認為共產黨最好退出國民黨。但是現在，當整個帝國主義匪幫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產黨人趕出國民黨的時候，共產黨退出國民黨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退出戰場，拋棄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敵人稱快。這就是說，削弱共產黨，破壞革命的國民黨，幫助上海的卡維涅克<sup>①</sup>們，把中國一切旗幟中最受歡迎的國

<sup>①</sup> 卡維涅克（一八〇二——一八五七）是法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的陸軍部長，他殘酷地鎮壓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譯者注

民党旗帜交給国民党右派。

現在帝国主义者、軍閥和国民党右派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

由此可見，反对派主張共产党在目前退出国民党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

因此，不久以前我党中央全会坚决地擯棄了反对派的政綱是完全正确的<sup>①</sup>。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九卷第 199—207 頁）

---

①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这次全会討論了一系列与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維埃代表大会有关的問題，决定了召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日期。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就全会議程問題和在討論加里宁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維埃代表大会問題》报告时发了言。全会在討論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国际事件(中国事件及其他)的决定的通告以后，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問題的政策，坚决地駁斥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对派的反党政綱。——《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 斯大林論中国革命的几个問題

——答馬尔秋林同志

你写給《农村共产党人》杂志<sup>①</sup>編輯部的关于中国苏維埃問題的信，已由編輯部轉来由我答复。我对你的信作一个簡短的答复，想你不会有異議吧。

馬尔秋林同志，我以为你的信是由誤会引起的。理由如下：

(一)在斯大林的給宣傳員的提綱中反对在目前的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維埃。你在反駁斯大林时，却援引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綱和演說<sup>②</sup>，其实这些提綱和演說只說到农民苏維埃，劳动者苏維埃，劳动人民苏維埃，沒有一句話說到成立工人代表苏維埃。

为什么列宁在自己的提綱或演說中都沒有說到成立工人代表苏維埃呢？因为列宁在演說或提綱中指的都是“还談不到純粹无产階級运动”、“几乎沒有工业无产階級”的国家（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卷第212頁）。列宁在演說中直截了当地說，他指的是中亚細亞、波斯那样“几乎沒有工业无产階級”的国家（同上）。

① 《农村共产党人》（双周刊）是供农村党的积极分子閱讀的杂志，是联共（布）中央的机关刊物，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創刊，一九三〇年八月停刊。一九二七年二月以前，該杂志的主笔是莫洛托夫。——《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卷第124—130頁和第209—214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中国有上海、汉口、南京、长沙等等工业中心，有将近三百万組織在工会里的工人，能不能把中国列入那样的国家呢？显然是不能的。

显然，說到有一定数量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現代中国的时候，必須注意到不仅要成立农民苏維埃或劳动者苏維埃，而且要成立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維埃。

如果說的是波斯、阿富汗等等国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大家知道，斯大林的提綱中所指的是中国，而不是波斯、阿富汗等等国家。

因此，你反駁斯大林，你援引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和提綱，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无的放矢。

(二)你的来信里摘引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补充提綱》，这个提綱說东方“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加紧宣傳共产主义思想，一有可能就建立工人和农民苏維埃”。同时你把这个《补充提綱》和从其中摘出的引文說成似乎是列宁写的。这是不对的，馬尔秋林同志。在这里你簡直弄錯了。《补充提綱》是罗易<sup>①</sup>写的。它是作为罗易的提綱經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来“补充”列宁的提綱的（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記记录第122—126頁）。

为什么需要《补充提綱》呢？为的是从那些沒有工业无产阶级的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特別划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为了不能断言这两个国家“几乎沒有工业无产阶级”。你看一下这个《补

---

<sup>①</sup> 罗易曾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之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員，后来成为叛徒，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譯者注

充提綱》就会了解那里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記記錄第 122 頁)。

为什么要以罗易的特別提綱来“补充”列宁的提綱呢？这是因为列宁的提綱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在殖民地国家代表到达以前，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討論以前早就写成和发表的。可是大会专门委员会在討論时发现有必要把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从东方落后殖民地中划分出来，所以要有一个《补充提綱》。

因此，不能把列宁的演說和提綱与罗易的《补充提綱》混淆起来，同样不可忘記：談到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时，必須注意到要成立的是工人和农民苏維埃，而不仅是农民苏維埃。

(三)在中国要不要成立工人和农民苏維埃呢？要，一定要。斯大林的給宣傳員的提綱就直截了当地說到了这一点。这个提綱說：

“革命的国民党的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展开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組織——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以及其他作为将来苏維埃的准备因素的群众革命組織……”<sup>①</sup>

全部問題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环境中成立苏維埃。

工人代表苏維埃是工人階級的包括一切的因而是最好的革命組織。但这并不是說，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成立工人代表苏維埃。一九〇六年夏天，在革命退潮以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維埃第一任主席赫魯斯塔廖夫提出了成立工人代表苏維埃的

<sup>①</sup>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卷第 204 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問題，列宁当时反駁他說：目前后卫队（农民）还没有赶上先锋队（无产阶级），成立工人代表苏維埃是不适当的。列宁是完全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人代表苏維埃不是工人的普通組織。工人代表苏維埃是工人阶级和現存政权作斗争的机关，是起义机关，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而且只有作为这样的机关，它們才能发展和巩固。如果没有反对現存政权的群众性的直接斗争的条件，没有反对現存政权的群众起义的条件，没有組織新的革命政权的条件，那末成立工人苏維埃就是不适当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它們就会有腐朽的危險，有变成空談場所的危險。

列宁关于工人代表苏維埃說道：

“工人代表苏維埃是群众直接斗争的机关”……“不是什么理論，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号召，不是某个人臆想出来的策略，不是党的学說，而是客观事物的力量使这些非党的群众机关必須起义，并使这些机关成为起义机关。現在建立这样的机关就等于成立起义<sup>①</sup>机关，号召建立这样的机关就等于号召起义<sup>②</sup>。忘記这一点或对广大人民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最不可饒恕的近視和最坏的政策。”（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十一卷第107頁）

他又說：

“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的全部經驗，以及布尔什維克党多年来的一切决定和一切政治声明，归結起来就是：工兵代表苏維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sup>③</sup>，只有作为革命政权机关<sup>④</sup>，才是现实的。沒有这个任务，苏維埃就是无用的玩

① ② ③ ④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物，势必引起群众冷淡、漠不关心和失望，因为群众对決議和抗議的无限重复表示厌恶是完全應該的。”（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六卷第 125 頁）

这样說来，在今天中国的南部，例如在革命的国民党正掌握政权、运动正在“全部政权归革命的国民党”这个口号下向前发展的武汉政府地区，号召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維埃是什么意思呢？現在号召在这个地区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就是号召起义以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这是否适当呢？显然是不适当的。显然，誰号召在这个地区立即成立工人代表苏維埃，誰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誰就是冒險把中国革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馬尔秋林同志，关于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維埃的問題就是如此。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通过一項标题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維埃》的特別決議。这项決議是列宁在場时通过的。我劝你看一看这项決議。它还是有意义的（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記記錄第 580—583 頁）。

（四）什么时候需要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呢？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一定要在这样的时机，就是胜利的土地革命全面展开的时候，作为中国革命民粹派（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联盟的国民党开始衰落的时候，还未胜利而且不是很快就会胜利的资产阶級民主革命开始显露其坏的一面的时候，从現今国民党型的国家組織逐步地进到新的无产阶級型的国家組織成为必要的时候。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罗易的《补充提綱》对工农苏維埃所談到的那一段人所共知的話，正是应当这样去理解的。

这个时机是否来到了呢？

无須证明，这样的时机还没有来到。

那末现在做什么呢？现在要使中国的土地革命扩大和深入。要成立并巩固种种工农群众組織，从工会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到农民协会和农民革命委员会，以便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把这些組織变为将来工农兵代表苏維埃的組織上和政治上的基础。

现在的任务就在于此。

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九卷第 211—216 頁）

# 斯大林

## 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

### 大学的学生們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真理报》第一二一号

亲爱的同志們！

两年以前，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四周年的时候，我在你們那里讲过話，談到这个大学对于各苏維埃共和国和东方各被压迫国家的任务<sup>①</sup>。

这个大学执行着自己的任务，現在正把新的战斗干部，代表七十四种民族的第四期毕业生，用列宁主义这种强大武器武装起来的同志們，送到斗争的烈火中去。

同志們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关头走上战斗的工作崗位，在这时，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帝国主义，正企图扼住中国革命的咽喉，同时向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挑战，希望摧毁世界各国无产者的这个坚固而强大的堡垒。

我祝賀毕业的同志們，同时坚信你們会光荣地对无产阶级尽

---

<sup>①</sup> 見斯大林《論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卷第113—127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

自己的義務，會把自己的所有力量和知識貢獻給東方勞動者為擺脫帝國主義壓迫而鬥爭的解放事業。

約·斯大林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九卷第 283 頁）



## 斯大林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談話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同志們！可惜我今天只能談兩三個鐘頭的話。也許下一回我們可以舉行一次時間較長的座談。我想今天我們只能分析一下你們書面提出的問題。我一共收到了十個問題。我就在今天的談話中來答復。如果還有補充的問題（據說是有的），我設法在下一次座談中答復。好吧，我們就來談本題吧。

### 第一個問題

“拉狄克斷言：中國農村中的農民鬥爭與其說是反對封建殘余，不如說是反對資產階級。這種論斷為什麼不對呢？

“能不能斷言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是商業資本主義或封建殘余呢？

“為什麼中國軍閥既是大工業企業的所有者同時又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呢？”

拉狄克確實下過類似這個問題中所指出的論斷。我記得拉狄克在莫斯科黨組織的積極分子會議上的發言中，不是完全否認中國農村中有封建殘余存在，就是不承認封建殘余在中國農村中有

重大的意义。

这当然是拉狄克的一个大的錯誤。

假如中国沒有封建残余，假如这些封建残余对中国农村沒有极重大的意义，那就不会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了，那就談不上土地革命是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現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了。

中国农村里是不是存在着商业資本呢？是的，是存在着，不仅存在着，而且从农民身上榨取脂膏并不亚于任何封建主。但是这种原始积累型的商业資本在中国农村中是和封建主的統治、和地主的統治独特地結合着的，它从地主那里襲用了中世紀的剝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同志們，这就是問題之所在。

拉狄克的錯誤在于他不了解这种独特性，不了解在保存封建的中世紀的剝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的条件下，中国农村中封建残余的統治和商人資本的存在的这种結合。

所有的軍閥、督軍、省长以及現在一切殘酷的進行掠奪的軍事和非軍事的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独特性的上层建筑。

帝国主义支持着并巩固着这整个的封建官僚机器。

某些軍閥拥有地产，同时是工矿企业的所有者，这种情况基本上沒有改变問題的实质。俄国許多地主也曾有过工厂和其他工矿企业，可是这並沒有妨碍他們依旧是封建残余的代表者。

既然在一些区域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地主豪紳所有，既然地主在經濟方面和在行政、司法方面都握有实权，既然迄今在一些省份里还有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應該承认，这个中世紀环境中的統治势力是和商业資本的势力独特地結合着的封建残余的势力，地主的势力，軍事与非軍事的**地主官僚的势力**。

这些独特的条件就給中国正在发展和还要发展的农民的土地

运动造成基础。

沒有这些条件，沒有封建残余和封建压迫，在中国就不会有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等等問題了。

沒有这些条件，中国的土地革命就会是不可理解的。

## 第二个問題

“拉狄克断言：既然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几个阶级的政党，那末国民党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了。他錯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問題必須提出几点意見。

第一、問題在这里是提得不正确的。我們过去和現在都沒有說过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这是不对的。我們过去和現在都說：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同志們，这并不是一回事。假如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那末問題就会归结成这样：在加入国民党的各阶级中不論哪一个阶级都不会在国民党以外有自己的政党，而国民党本身就会是所有这些阶级的一个共同的和唯一的政党。难道实际上真是这样的嗎？难道中国无产阶级参加了国民党就沒有自己单独的政党，就沒有和国民党不同而且具有自己单独的綱領、自己单独的組織的共产党嗎？显然，国民党不是几个被压迫阶级的政党，而是各有其党组织的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因此，問題在这里是提得不正确的。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只能說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

第二、說馬克思主义在原則上不承认几个被压迫的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說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种政党在原則上是不容許的，这是不正确的。同志們，这是絕對不正确的。事实上馬克思主义

不仅承认过（而且繼續承认）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种政党在原則上是容許的，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也加入过这样的政党。我可以举个例子，即馬克思本人在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时期的例子，当时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德国有名的資產階級民主联盟<sup>①</sup>，并且在这个联盟中与革命資產階級的代表合作。大家知道，加入这个資產階級民主联盟的，加入这个資產階級革命政党的，除了馬克思主义者以外，还有革命資產階級的代表。当时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报》<sup>②</sup>就是这个資產階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只是在一八四九年春天，当德国革命开始走向低潮的时候，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退出这个資產階級民主联盟，决定建立一个具有独立階級政策的完全独立的工人階級組織。

可見，馬克思甚至比我們今天作为独立的、具有自己单独組織的无產階級政党而參加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得更远。

一八四八年，当問題是要和革命資產階級共同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时候，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德国資產階級民主联盟，这样做是否适当，是可爭論可不爭論的。这是策略問題。但馬克思在原則上承认这种加入是容許的，——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第三、說武汉国民党是小資產階級政党，而且就此为止，那是

---

① 指科倫民主协会，于一八四八年德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成立。參加协会的除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外还有工人。馬克思曾被选入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省民主协会外委员会，并且是它的領導者之一。——《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② 《新萊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于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至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在科倫出版。該报領導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主編是馬克思。关于《新萊茵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七年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一部第165—173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根本錯誤的。只有既不懂得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又不懂得中国革命性质的人，才会这样說明国民党的特征。国民党不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有各种各样的。俄国的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也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但它們又是帝国主义的政党，因为它们們同法英帝国主义者結成战斗同盟，同他們一起征服和压迫其他的国家——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加里西亚。

能不能說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政党呢？显然是不能的。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正像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一样。这里是有根本差别的。看不出这种差别，把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維克的帝国主义的政党混为一談，就是一点也不懂得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

当然，假如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那末中国共产党人就不会和它結成联盟，而会叫它滾蛋。但問題正在于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它正和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进行着革命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說，国民党要比克倫斯基和策烈铁里类型的一切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高得多。

甚至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在发动政变以前就用种种阴谋詭計来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当时也要比克倫斯基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高出一些，因为克倫斯基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进行战争是为了奴役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加里西亚，从而巩固帝国主义，而蒋介石进行战争——無論进行得好坏——則是反对奴役中国，从而削弱帝国主义的。

拉狄克和一般反对派的錯誤就在于他們撇开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看不见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看不出武汉的国民党即沒有国民党右派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

中心。

### 第三个問題

“你估計国民党是两种力量(共产党和小資产階級)的聯盟(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全体学生大会上的演說),而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決議則估計国民党是連大資产階級也在內的四个階級的聯盟。这两种估計有沒有矛盾呢?”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时,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否可能呢?”

第一、必須指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对国民党实际状况所下的定义,在你們的“問題”中是轉述得不对和不完全确切的。在“問題”中說“連大資产階級也在內”。然而买办也是大資产階級。这是不是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认为买办資产階級是国民党党内聯盟的一員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买办資产階級曾經是而且現在还是国民党的死敌。共产国际決議中所說的不是一般大資产階級,而是“一部分資本主义資产階級”。因此,这里所說的并不是任何大資产階級,而是非买办类型的民族資产階級。

第二、应当声明,我看不出国民党的这两个定义有矛盾。我所以看不出,是由于我們在这里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給国民党下定义,这两个观点,不論哪一个,都不能說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們两个都是正确的。

我在一九二五年說国民党是工农聯盟的政党的时候,我并不是想說明国民党的实际状况,也不是想說明一九二五年有哪些階

級事实上加入了国民党。我說到国民党的时候，我只是把国民党当做东方被压迫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的独特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当做应当依靠工人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来談的。我当时直截了当地說：“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見斯大林《論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列宁主义問題》第 264 頁<sup>①</sup>）

因此，我当时所指的不是一般人民革命政党（包括国民党在內）的現在，而是它們的将来。在这里我是完全对的。因为国民党之类的組織，只有力求依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联盟才能有前途，而且說到小资产阶级时主要是指农民而言，因为农民是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基本力量。

共产国际所注意的却是問題的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其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不是从国民党的将来，不是从它应当成为什么，而是从現在，从国民党內部的实际状况和正是哪些阶级在一九二六年事实上加入了国民党这种观点去考察国民党的。共产国际說得完全正确：在这个时候，在国民党还没有分裂的时候，国民党事实上是工人、小资产阶级（城市和乡村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里还可以添上一句：不仅在一九二六年，而且在一九二五年，国民党所依靠的也正是这些阶级的联盟。在我曾經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国际決議中直截了当地說：“无产阶级同积极为自己利益而斗争的农民，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組成联盟”；“各种力量的結合在政治方面表现在国民党內和广州政府內相应

<sup>①</sup>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卷第 124 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的联合上”(見決議①)。

但是共产国际并不限于論到一九二六年的实际状况，而且論到国民党的将来，所以它不能不說这种联盟只是暫时的联盟，不能不說在最近期間这种联盟应代之以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決議接着又說：“目前运动正处在第三阶段的門口，正处在阶级力量重新結合的前夜”；“在这个发展阶段上，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更富有革命性的联盟——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把大部分资本主义大资产阶级排除出去②”(同上)。

这也就是国民党所应当依靠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农民)的联盟，这个联盟从国民党分裂和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以后已在武汉开始形成，一九二五年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报告中所談到的就是这个联盟(見前)。

由此可見，我們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來說明国民党的，

(甲)从国民党的现在方面，从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的实际状况的方面；

(乙)从国民党的将来方面，从国民党作为东方国家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应当成为什么的方面。

这两种說明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因为它们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把握国民党，終于提供了一幅詳尽的图画。

試問这里有什么矛盾呢？

---

①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的关于中国状况的決議。該決議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提綱和決議》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为了更清楚起见，我们拿英国“工党”来做例子。大家知道，英国存在着一个依靠工人和职员的工会组织的特别的工人政党。称这个党为工人政党是谁也不怀疑的。不仅在英国的而且在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也都是这样称它的。

但是能不能说这个政党是真正的工人政党，是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的工人的阶级政党呢？能不能说它事实上是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不是两个阶级的政党呢？不，不能说。事实上英国工党是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事实上这个政党是两个阶级联盟的政党，如果说到这个党内谁的影响大，是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的工人的影响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大，那末应该说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这个党内是占优势的。

其实，这一点也就说明英国工党事实上是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却把它叫做工人政党。怎样来解释这个“矛盾”呢？可以这样来解释：在确定这个政党为工人政党的时候，通常指的不是这个政党现在的实际状况，而是工人政党的结构形式，由于这种形式，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政党将来一定会变成和资产阶级世界相对立的工人的真正的阶级政党。这并不排斥事实上这个党暂时是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这一事实，相反地，而是以这一事实为前提的。

这里也没有矛盾，正像我刚才谈到国民党时所说的一切没有矛盾一样。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时，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否可能呢？

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时，而且在工农代表苏维埃成立时，加入国民党都是不适当的。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建立两

重政权。这就是国民党和苏維埃夺取政权的斗争。成立工农苏維埃，就是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在共同参加一个革命民主政党的两个政党的领导下，能不能进行这种准备呢？不，不能。革命的历史说明，准备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当然，如果所說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历史说明，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争取到手，才能发展起来。沒有这一点，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沒有而且不能有真正的和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

因此，不仅在无产阶级专政时，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在工农代表苏維埃成立时，共产党就必须退出国民党，以便在自己单独领导之下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

我以为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和准备中国十月革命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国民党党外的联盟代替目前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就像在过渡到十月革命的时期我們和社会革命党左派的那种联盟一样。

#### 第四个問題

“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如果不是，那末今后争取民主专政的斗争的道路将是怎样的呢？

馬尔丁諾夫断言不经过‘第二次’革命也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末中国的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

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它可能成为这

樣的專政。如果以全力展開土地革命，武漢政府就一定會成為民主專政，可是它現在還不是這種專政的機關。

為了使武漢政府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機關，需要些什麼呢？這至少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必須使武漢政府成為中國農民土地革命的政府，成為竭力支持這個革命的政府。

第二、必須使國民黨以工農出身的土地運動的新領袖補充其上層領導集團，並且擴大其下層組織，把農民協會、工會委員會和城鄉其他革命組織都包括進去。

國民黨現在約有五十萬黨員。這太少了，對於中國實在太少了。必須使國民黨把數百萬的革命農民和工人包括進去，從而變成千百萬人的革命民主組織。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國民黨才有可能產生出一個革命政府，這個政府將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

馬爾丁諾夫同志是否確實說過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點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過馬爾丁諾夫同志的文章，我所以沒有看過，是因為我沒有可能瀏覽我們日常的一切著述。但如果他確實說過在中國可能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那末這就是一個錯誤。

邱貢諾夫有一次問我：“怎麼樣，斯大林同志，是不是可以這樣做，不兜什麼圈子，通過國民黨用和平方法一下子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呢？”我反問他：“邱貢諾夫同志，你們中國的情形怎樣，——你們那裏有沒有國民黨右派、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呢？”他回答說有。我就對他說：“那就非打架不可了。”

這还是在蔣介石政變以前。當然，在原則上可以提出中國革

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的问题。例如列宁有一个时期就曾认为俄国革命可能经过苏维埃而和平发展。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七月的时期。但是在七月失败以后，列宁就承认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以为在中国更应当认为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无论是国内的（张作霖、蒋介石、大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等等）或国外的（帝国主义者），都太多太强了，不能设想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可以避免严重的阶级搏斗和严重的分裂与投敌行为。

第二、因为没有根据认为国民党的国家组织形式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适当形式。

最后因为：既然在俄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典范形式的苏维埃而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成功，那末有什么根据可以推想这样的过渡通过国民党就可以成功呢？

因此，我以为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 第五个问题

“为什么武汉政府不进攻蒋介石，而进攻张作霖呢？”

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同时向北方进攻，这不是抹杀了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战线吗？”

同志们，你们向武汉政府要求得太多了。既打张作霖，又打蒋介石，又打李济深，又打杨森，那当然是很好的。但目前武汉政府

的形势不允許它在所有这四条战綫上同时举行进攻。武汉政府对奉軍进攻,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奉軍向武汉进发,要肃清武汉,所以进攻奉軍是刻不容緩的防御措施。

第二、因为武汉派想和馮玉祥軍隊会师并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这在目前对于武汉来說又是极其重要的軍事政治事件。

在反对蔣介石和張作霖这两条重要战綫上同时进攻,目前对于武汉政府是不能胜任的事情。关于西攻楊森和南伐李济深,就更不用說了。

在內战时期,我們布尔什維克是較为强大的,可是我們也沒有能够在所有战綫上展开順利的进攻。在目前有什么根据要求武汉政府做更多的事情呢?

其次,現在,当奉軍和吳佩孚系軍隊从北方向武汉推进的时候,进攻上海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便利奉軍南下,无限期地推迟和馮軍的会师,而在东部又一无所获。倒不如暂时让蔣介石在上海地区掙扎,跟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糾纏吧。

夺取上海还要經過战斗,这场战斗不会像現在夺取郑州等地的战斗一样。不,在上海要进行更激烈的战斗。上海是世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重要利益的交叉点,帝国主义是不会輕易让出的。

首先和馮軍会师,在軍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加紧瓦解蔣介石的后方和前綫,然后将上海問題全部提出,这是不是比較适当呢?我想这样做是比較适当的。

因此,这里問題并不在于“抹杀”对中国資产階級斗争的战綫,因为只要土地革命发展起来,它反正是抹杀不了的;而土地革命正在发展,将来还要发展,——这一点現在几乎是无可怀疑的。我再

說一遍，問題不在於“抹殺”，而在於制定適當的鬥爭策略。

某些同志以為現時在所有的戰線上進攻是革命性的基本標誌。不，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目前在所有的戰線上進攻，乃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不能把愚蠢和革命性混為一談。

## 第六個問題

“基馬爾式的革命在中國是否可能呢？”

我認為基馬爾式的革命在中國是不可思議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

基馬爾式的革命，只有在像土耳其、波斯、阿富汗這些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也沒有強大的農民土地革命的国家內，才有可能。基馬爾式的革命是民族商業資產階級的上層革命，它是在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中產生的，在其繼續發展中實質上是反對農民和工人、阻礙土地革命發生的。

在中國不可能有基馬爾式的革命，因為：

(甲)在中國有一定數量的戰鬥的和積極的工業無產階級，它在農民中間享有很高的威信；

(乙)在中國有展開了的土地革命，它正在掃除自己道路上的封建殘余。

千百萬的農民在許多省份里已經奪取了土地，並在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下進行鬥爭，——這就是防止所謂基馬爾式革命的可能性的解毒劑。

不能把基馬爾黨和武漢左派國民黨相提並論，正像不能把土耳其和中國相提並論一樣。土耳其並沒有像上海、武漢、南京、天

津那樣的中心。安哥拉遠不如武漢，正像基馬爾黨遠不如左派國民黨一樣。

從國際地位來看，也應該注意到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差別。在土耳其方面，帝國主義已經達到了自己一系列的基本要求，奪取了土耳其的敘利亞、巴勒斯坦、美索不達米亞和其他對帝國主義者說來是重要的據點。土耳其現在已經降為一個只有一千萬到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地域不大的國家。它對於帝國主義既不是重要的市場，也不是有決定意義的投資場所。這種情形所以會發生，就中是由於舊土耳其是各種民族的混合體，只在安那托里亞才有稠密的土耳其族居民。

中國就不是這樣。中國是有幾億人口的民族密集的國家，是全世界極重要的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市場。在那裡，在土耳其，帝國主義利用舊土耳其內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民族對抗，能以割取東部一些極重要的地區而滿足；而在這裡，在中國，帝國主義必須在民族中國的活的軀體上開刀，把它割成碎片，奪取它整個的省份，以保持自己的舊有障地，或者至少維持住這些障地的一部分。

因此，在那裡，在土耳其，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能以基馬爾派的天折了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而告終；而在這裡，在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一定會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鮮明的民族性，一定會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國主義作殊死的決鬥，震撼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基础。

反對派（季諾維也夫、拉狄克、托洛茨基）的最大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沒有看到土耳其和中國之間的這一切差別，把基馬爾式的革命和土地革命混為一談，不加區別地把一切東西攪成一團。

我知道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中间有些人抱着基马尔主义的思想。现在妄想扮演基马尔角色的人在中国是不少的。其中第一个就是蒋介石。我知道某些日本新闻记者有意把蒋介石算做中国的基马尔。但这一切都是张皇失措的资产者的梦想和幻觉。在中国，要就是张作霖和张宗昌之流的中国的墨索里尼们胜利，然后又被土地革命的浪潮推翻，要就是武汉胜利。

力图使自己保持在这两个营垒之间的蒋介石及其帮手们一定要垮台，遭到和张作霖、张宗昌同样的命运。

## 第七个问题

“在中国现在是不是需要提出农民立即夺取土地的口号，对于湖南农民夺取土地的事实应当怎样估计呢？”

我认为是需要的。事实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在若干地区内已在实行。在好些地区，如湖南、湖北等地，农民已经从下面夺取土地，成立自己的法庭，惩治自己的敌人，组织自己的自卫力量。我想，中国全体农民在最近期间都要去实现没收土地的口号。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这里。

如果武汉政府想要胜利，如果它想要建立真正的力量去反对张作霖、反对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者，它就应当大力支持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土地革命。

如果以为在中国只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是愚蠢的。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对武汉军队的积极支援，要打倒这些势力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



誤的。把蔣介石的政变估計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蔣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蔣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看来他們以为，假如蔣介石沒有分裂出去，革命事业也許要好些。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蔣介石的政变事实上是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当然，蔣介石的政变不能不使一些地区的工人遭到局部的失敗。然而这只是局部的和暫时的失敗。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蔣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

中国革命的力量和威力就在这里。

不能把革命运动看做一直上升的运动。这是对于革命的一种书本上的非现实的想法。革命总是曲折地进行的，它在一些地区里实行进攻并破坏旧秩序，在另一些地区里却遭到局部失敗并实行退却。蔣介石的政变就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曲折之一，这一曲折是必要的，因为借此可以把一切骯髒东西从革命中清洗出去，并沿着强大的土地运动的道路把革命向前推进。

但是，要使这个土地运动能够形成，就必须使它有一个概括性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沒收地主土地。

## 第八个問題

“为什么組織苏維埃的口号在目前是不正确的呢？”

“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由于河南已經組織了工人苏維埃而有做革命运动尾巴的危險呢？”

你們說的是什么样的苏維埃呢，是无产階級苏維埃，还是非无产階級苏維埃、“农民”苏維埃、“劳动者”苏維埃、“人民”苏維埃？

列宁在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綱中曾經談到在东方落后国家里成立“农民苏維埃”、“劳动者苏維埃”。列宁指的是中亚細亚那些“沒有或几乎沒有工业无产階級”的国家。他指的是像波斯、阿富汗等等国家。其实这也就說明列宁的提綱中沒有一句話說到要在那样的国家里組織工人苏維埃。

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列宁的提綱指的不是中国，因为对于中国不能說“沒有或几乎沒有工业无产階級”，他指的是东方其他較落后的国家。

因此，这里說的是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因此，在解决这个問題时，應該注意的不是列宁的提綱，而是同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罗易的提綱，这个提綱說到要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成立工农苏維埃。但这个提綱中說的是：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階級革命时，在这些国家里應該成立工农苏維埃。

什么是工农代表苏維埃呢？工农代表苏維埃主要是反对現存政权的起义机关，是为新的革命政权而斗争的机关，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同时工农代表苏維埃又是組織革命的中心。

但是只有在工农代表苏維埃是推翻現存政权的机关时，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时，它才能成为組織革命的中心。如果它不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它也就不能成为組織革命运动的中心。反对派在反对列宁主义对工农代表苏維埃的看法时不願了解这一点。

現在，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內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建立两重政权，成立反对武汉政府的起义机关。中国共产党人現在是否应当推翻武汉政府呢？显然是不应当的。相反地，他們应当支持武汉政府，把它变为反对張作霖、反对

蒋介石、反对地主豪紳、反对帝国主义的机关。

既然共产党現在不应当推翻武汉政府，那末現在为什么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去推翻武汉政府，这在目前是不正确的和不可容許的；

或者是共产党人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但不实行推翻武汉政府的路綫，不把苏維埃变成新的革命政权机关，——那时苏維埃就会死亡，变成对苏維埃的諷刺。

列宁在說到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时，总是警告不要这样做的。

你們的“問題”中說到河南已經出現了工人苏維埃，說到共产党如果不把成立苏維埃的口号帶到群众中去，便有做运动的尾巴的危險。同志們，这是无稽之談。現在河南並沒有任何的工人代表苏維埃。这是英国报纸散布的謠言。那里有“紅枪会”，那里有农民协会，而工人代表苏維埃目前根本沒有。

当然，成立工人苏維埃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并不十分困难。但問題不在于成立工人苏維埃，而在于把它們变成新的革命政权机关。不这样做，苏維埃就是空架子，就是对苏維埃的諷刺。过早地成立工人苏維埃，以致后来又把它們断送，变成空架子，这正是把中国共产党从资产阶級民主革命的領袖变成以苏維埃玩各种各样“极左的”把戏这种行为的附屬品。

一九〇五年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維埃第一任主席赫魯斯塔廖夫，在一九〇六年夏天也曾要求恢复亦即成立工人代表苏維埃，认为不管环境如何苏維埃本身都能把阶級力量的对比倒轉过来。列宁当时反对赫魯斯塔廖夫說，在一九〇六年夏天不應該成立工人

代表苏維埃，因为后卫队（农民）还没有靠近先锋队（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成立苏維埃，提出起义的口号是冒险的，是不适当的。

由此可见，第一、不可夸大苏維埃本身的作用；第二、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时不能不估计到周围的情况。

一般说来，在中国需要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嗎？

是的，需要成立。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在土地革命展开以后，在从土地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必须成立苏維埃的。

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就是在中国奠定苏維埃政权的基础。而奠定苏維埃政权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两重政权的基础和采取以苏維埃政权代替现在武汉国民党政权的方针。

我以为这样做还不到时候。

你们的“问题”中说到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在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易于起领袖的作用，起领导者的作用，需要些什么呢？

这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組織，有自己的党綱，有自己的政綱，有自己的組織，有自己的路綫。

第二、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农民土地运动的前列，教导农民尤其是贫农去組織革命的协会和委员会，去沒收地主土地。

第三、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巩固起来，使军队革命化，改造军队，把军队从个别冒险分子的工具变成革命的工具。

最后，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参加武汉政府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参加武汉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在这些机关中实行进一步展开既反对地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决的革命的政策。

反对派想以中国共产党脱离革命民主力量和退出国民党及武

漢政府的辦法來保持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但這是我國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所說過的那種十分可疑的“獨立性”。大家知道，孟什維克當時反對列寧說：“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工人政黨的領導權，而是工人政黨的獨立性。”列寧當時答復得很對，這就是否認獨立性，因為把獨立性和領導權對立起來就是把無產階級變成自由資產階級的附屬品。

我以為反對派現在談到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同時要求或暗示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和武漢政府，正是滾到一九〇五年時期孟什維克的“獨立性”的道路上去了。共產黨只有既在國民黨黨內又在國民黨黨外即在廣大勞動群眾中成為領導力量時，才能保持真正的獨立性和真正的領導權。

不是退出國民黨，而是保證共產黨在國民黨黨內和國民黨黨外的領導作用，——如果中國共產黨想做一個真正獨立的政黨，這就是它現在要做的事情。

## 第九個問題

“目前能不能在中國提出成立正規紅軍的問題呢？”

我以為從前途來看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但是，如果問題實際存在，那末現在，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它。

現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現有軍隊，用一切可行的辦法使軍隊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過土地革命鍛煉的革命農民和革命工人所組成的新的革命的團和師的基礎，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擁有可靠的指揮人員的軍團，使它們成為武漢革命政府

的柱石。

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发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

这对于在前线尤其是在后方反对所有突然钻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都是必要的。

没有这一点，就没有防止后方和前线溃败、防止投敌和叛变的保障。

我以为这条道路是目前唯一可能而又适当的道路。

## 第十个问题

“现在，在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候，能不能提出夺取中国企业的口号呢？”

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夺取在中国的外国工厂，这会不会引起同时夺取中国企业呢？”

我以为，一般说来，夺取中国企业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中国企业主的顽强怠工、大批怠工企业的关闭和人为的失业现象，可以迫使武汉政府现在就开始把某些怠工企业收归国有，并用武汉政府的力量使这些企业开动起来，——这种事情不是不会发生的。

可能武汉政府现在就要被迫在个别场合下实行这种预防办法去对付特别坏的和反革命的中国企业主。

至于外国企业，要把它们收归国有则是将来的问题。把这些企业收归国有，就是对帝国主义者直接宣战。但是要直接宣战，就需要有稍微不同于现在的较为有利的环境。

我以为在革命的现阶段，当革命还没有巩固的时候，这种办法

是过早的,因而也是不适当的。

现在的任务不在于此,而在于以全力燃起土地革命的火焰,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领导权,巩固武汉,把武汉变成和中国革命的各种各样敌人作斗争的中心。

不能一下子把一切任务都堆在自己身上,而冒压伤自己的危险。况且国民党及其政府是不适于解决剥夺中外资产阶级这种极重要的任务的。

要解决这些任务,就需要有另一种环境、另一个革命阶段、另一种革命政权机关。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九卷第 217—241 頁)

## 斯 大 林

#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sup>①</sup>第  
十次会议上的演说

### 一 几个小问题

同志们！我应当道歉，今天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迟到了，未能完全听到托洛茨基在这里，在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说。

可是我想，最近几天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给执行委员会写了这么多的论著、提纲和书信，我们要批判反对派，材料不会是不够的。

---

<sup>①</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在莫斯科举行。全会讨论了共产国际在反对战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中的任务、英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国革命问题等等。斯大林同志五月二十四日在全会的第十次会议上做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全会对国际形势作了估计，拟定了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纲领，并由于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及商务关系，通过了宣言《告全世界工人和农民书。告一切被压迫人民书。告士兵和水兵书》。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首领们利用苏联国际形势的紧张，在全会上以诽谤性的抨击来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领导。全会通过特别决议尖锐地斥责了反对派首领们的分裂行动，并警告他们：如果再继续派别斗争，就要把他们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除出去。——《斯大林全集》编者注



因此，我将根据这些文件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錯誤，我不怀疑，这个批判同时将是对托洛茨基今天演說的基础的批判。

我将尽可能在論战中排除个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个别委員的个人攻击是不值一談的。

看来托洛茨基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會議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行委员会把討論战争危險、中国革命等等問題变成討論托洛茨基的問題。我想，托洛茨基是不值得予以这样大的注意的。(有人喊道：“对!”)况且，与其說他像个英雄，不如說像个演員，把演員和英雄混为一談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这样一些被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揭穿了他們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的人，痛罵布尔什維克，这对布哈林或斯大林并不是什么侮辱，这一点我就不讲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型的半孟什維克贊揚我而不罵我，那对我倒是莫大的侮辱。

反对派現在的这种派別言論是否違背了他們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所承担的义务，这一点我也不多讲了。托洛茨基认定，根据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他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托洛茨基要硬說声明的内容只限于这一点，这就只能叫做詭辯，不能叫做别的。

在反对派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中不仅說到反对派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說到这些观点只有在党所許可的範圍內才能坚持，派別活动应当拋棄和肃清，反对派必須“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意志和中央的决定，反对派不仅应当服从这些决定，而且应当誠心誠意地“实行”这些决定。

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证明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已经被他们自己极粗暴地破坏和撕得粉碎了呢？

在反对派的许多提纲、论文和演说中，下流地和极端诬蔑地歪曲了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这一点我也不多说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断地硬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似乎过去坚持而且现在还在坚持“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个论断是捏造，诽谤，故意歪曲事实，这几乎是用不着证明的。实际上，当中国革命还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不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来当中国革命已成为土地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离开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就用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代替了那一个政策。

只要看看这些文件，如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著名宣言<sup>①</sup>、斯大林的给宣传员的提纲<sup>②</sup>，以及布哈林日前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纲，就会确信这一点。

反对派的倒霉正在于他们不造谣不歪曲就活不下去。

现在我们来谈本题。

---

①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告全世界无产者和农民书。告一切被压迫人民书》。宣言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真理报》第八十五号上。——《斯大林全集》编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卷第199—207页。——《斯大林全集》编者注

## 二 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基础

托洛茨基的基本錯誤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封建残余是現時在中国推动土地革命的压迫的主要因素。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軍閥官僚上层建筑及其督軍、省长、將軍、張作霖之流等等，是現任的土地革命借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

既然很多省份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地主豪紳所有，既然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地主不仅握有經濟权力，而且握有行政和司法权力，既然直到現在一些省份里还有中世紀的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的压迫的主要形式。

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現在中国正經歷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規模來說是最偉大的土地革命。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呢？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說，中国目前正經歷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封建残余，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財政的和軍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层建筑的

力量。

因为不同时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就不能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因为谁要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谁就一定要和在中國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作斗争。

因为不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就不能打倒并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說，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这样，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共产国际（自然联共（布）中央也是这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整个路线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而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立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它是和刚才說过的共产国际的观点正相对立的。托洛茨基不是完全不承认中国封建残余的存在，就是认为这些封建残余沒有决定的意义。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对中国封建官僚压迫的力量和意义估計过低，以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

請让我引证托洛茨基几天以前送交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众所周知的提綱吧。托洛茨基这个提綱的标题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綱》。

托洛茨基在这个提綱中写道：

“布哈林借口‘封建残余’在中国經濟中似乎起主要作用

来为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綫辯护，他这种企图是毫无根据的。即使布哈林对中国經濟的估計是根据經濟的分析，而不是根据一些煩瑣哲学的定义，‘封建殘余’仍旧不能替如此明显地促进了四月政变的政策作辯护。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sup>①</sup>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見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綱》）

不仔細看这一段引文就会以为托洛茨基不是反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性质問題上的路綫，而是反对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这当然是不对的。事实上在这段引文中所說的是否认封建殘余在中国的“主要作用”。事实上这里所說的是把中国現在日益展开的土地革命宣布为上层的革命，所謂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在这里所以要把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說一頓，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背叛共产国际路綫的行为。直截了当地說，这是托洛茨基慣用的欺騙手法。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封建殘余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层建筑，不是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发条，而是次要的、不大的、只配放在引号里面的力量。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因此，中国革命主要是所謂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論調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所持的观点就是如此。

請让我指出：这种观点正是張作霖“陛下”的五等文官的观点。

如果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應該承认張作霖和蔣介

<sup>①</sup>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石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既不要土地革命，也不要工人革命，他们所要达到的只是廢除不平等条約和实现中国的关税自主。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張作霖和蔣介石的办事員的观点了。

如果封建殘余应该放在引号里面，如果共产国际宣称封建殘余在革命現阶段上有主要的意义是不对的，如果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关税不自主，而不是和封建殘余及支持这些殘余的帝国主义作斗争，那末，中国的土地革命还有什么內容呢？

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沒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从哪里来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根据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这难道不是事实嗎？难道土地革命能够从天上掉下来嗎？

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等省份里，千百万的农民被卷进极偉大的土地革命中，农民在这些省份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卫力量，赶走地主，“用平民手段”<sup>①</sup> 制裁他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嗎？

如果封建軍閥的压迫不是中国的压迫的主要形式，那末，这样强大的土地运动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不承认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封建主和軍閥的基本同盟者，那末，千百万农民的这种声势浩大的运动怎能同时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呢？

仅湖南一省的农民协会現在就有二百五十余万会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嗎？而这种会员在湖北和河南現在有多少呢？最近期間

---

<sup>①</sup> “用平民手段”系馬克思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写道：“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以打垮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垮专制制度、封建主义和市僧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譯者注

在中国其他省份又将有多少呢？

还有“紅枪会”、“硬肚”等等，——难道这一切都是捏造而不是现实嗎？

难道可以真正地断言以沒收地主的土地为口号的千百万农民的土地革命不是反对真正的不容怀疑的封建残余，而是反对想像出来的引号里的封建残余嗎？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經是張作霖“陛下”的办事員的观点了，这难道不明显嗎？

由此可見，我們有两条基本路綫：

(甲)共产国际的路綫——估計到中国存在着封建残余这一压迫的主要形式，估計到强大土地运动的决定意义，估計到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估計到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及其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突出性；

(乙)托洛茨基的路綫——否认封建軍閥压迫的主要意义，看不见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并且仅以要求中国关税自主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的基本錯誤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这种錯誤对托洛茨基來說并不是新的錯誤。它是托洛茨基在和布尔什維主义作斗争的整个时期中整个路綫的极显著的特点。

低估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錯誤，从一九〇五年起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它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表现得特別明显，并且直到現在也沒有离开托洛茨基。

請让我举出几件托洛茨基反对列宁主义的事实，例如举出一

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的事实，那时我們正走向俄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胜利。

当时托洛茨基硬說，既然农民中間的分化已經加剧，既然目前我們这里存在着帝国主义的統治，并且无产階級把自己和資產階級民族对立起来，那末农民的作用就会降低，而土地革命就不会有一九〇五年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了。

列宁对这一点是怎样回答的呢？請让我从一九一五年列宁关于农民在俄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問題的論文中引出一段話来：

“托洛茨基的独创的理論（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論”。——斯大林注）是从布尔什維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階級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維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据他說，农民已經分化了，他們已經变质了，他們可能起的革命作用愈来愈小了，在俄国不可能进行‘民族’革命，因为‘我們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把資產階級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階級同資產階級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可笑例子！如果說在俄国无产階級已經同‘資產階級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說，俄国現在正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說‘沒收地主的土地’（托洛茨基繼一九一二年一月代表會議之后在一九一五年所重复的）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那就是說不應該讲‘革命工人’政府，而應該讲‘工人社会主义’政府！！托洛茨基說：无产階級用自己的坚决精神也能把‘非无产階級的（！）人民群众’带动起来（第二一七号），从这句话中可以看



出，托洛茨基竟糊塗到了何等程度！！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如果无产階級能够带动农村非无产階級群众去沒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俄国‘民族資产階級革命’的完成，也就是无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sup>①</sup>

一九〇五——一九一五年这整整十年，这偉大的十年，证明了在俄国革命中有两条而且只有两条階級路綫。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階級斗争，喚醒了很多在政治上沉睡未醒的分子，促进了农村无产階級（布尔什維克从一九〇六年以来就主張农村无产階級要单独組織起来，并把这个要求列入孟什維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決議）同城市无产階級的接近。但是‘农民’同馬尔柯夫—罗曼諾夫—赫沃斯托夫之流的对抗加强了，增长了，尖銳化了。这个真理是如此明显，甚至連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洋洋万言的几十篇文章也‘推翻’不了。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們的忙，这班政治家們所以‘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因为不願意发动农民去革命！而这就是現在問題的症結。”（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一卷第398—399頁）

托洛茨基公式的特点在于他看見資产階級，看見无产階級，而看不见农民，不了解农民在資产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正是这个特点构成了反对派在中国問題上的基本錯誤。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在中国革命性質問題上的“半孟什維主义”也正是在这里。

从这个基本錯誤中产生了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錯誤，产生了反对派在中国問題提綱中的一切糊塗观念。

<sup>①</sup>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 三 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及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盟的武汉左派国民党

就拿武汉问题做例子吧。共产国际关于武汉的革命作用的问题的方针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是很清楚的。既然中国正经历着土地革命，既然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胜利，既然南京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而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末，在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

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

共产国际的方针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左派国民党现在代表什么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回答说：“暂时还不代表什么，或几乎不代表什么。”

就说武汉是空架子吧。既然武汉是空架子，那末，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要和这个空架子作坚决的斗争呢？从什么时候起，共产党人竟开始支持空架子，参加空架子，领导空架子呢？共产党人必须和空架子作斗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共产党人拒绝和空架子作斗争，便是欺骗无产阶级和农民，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提建议和空架子作斗争，即使采取共产党人立即退出武汉

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办法呢？为什么托洛茨基提議留在这个空架子里，不退出这个空架子呢？这里的邏輯何在？

这种“邏輯上的”不对头是不是由于托洛茨基对武汉指手划脚地讲了一頓，把它叫做空架子，然后又胆怯起来，不敢在自己的提綱里做出相当的結論呢？

或者拿季諾維也夫做例子來說。季諾維也夫在他今年四月提交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提綱中，把武汉国民党估計为一九二〇年时期的基馬尔派的政府。但基馬尔派的政府是反对工人和农民政府，是沒有而且不能有共产党人的位置的政府。看来从对武汉的这种評價中只能得出一个結論：和武汉作坚决的斗争，推翻武汉政府。

具有人类的普通邏輯的普通人是会这样想的。

季諾維也夫却不这样想。他把汉口的武汉政府估計为基馬尔派的政府，同时提議給这个政府以最有力的支持，提議共产党人不要退出这个政府，不要离开武汉国民党等等。他直截了当地說：

“必須給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从那里組織对卡維涅克們的反击。在最近时期必須集中力量帮助汉口組織起来和巩固起来。”（見季諾維也夫的提綱）

誰能懂得呵！

托洛茨基說武汉（汉口）是空架子。相反地，季諾維也夫却断言武汉是基馬尔派的政府。由此應該做出結論：和空架子作斗争，为推翻武汉政府而斗争。然而不管托洛茨基也罢，季諾維也夫也罢，都不敢做出从他們的前提中必然产生的結論，而季諾維也夫甚至更进一步，提議“給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

这一切說明什么呢？說明反对派糾纏在矛盾里了。他們失去

了邏輯思考的能力，喪失了一切前途。

观点糊塗，在武汉問題上失去任何前途，——如果一般說來可以把糊塗叫做方針的話，這就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方針。

#### 四 論中国工农代表苏維埃

或者再拿中国工农代表苏維埃問題做个例子吧。

关于組織苏維埃的問題，我們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三个決議：列宁論在落后国家中成立非无产阶级的农民苏維埃的提綱，罗易論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里成立工农苏維埃的提綱，以及論“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維埃”的特別提綱。

列宁的提綱是說明在沒有或几乎沒有工业无产阶级的中亚細亞諸国成立“农民的”、“人民的”、非无产阶级的苏維埃。列宁的提綱里沒有一句話說到在这样的国家成立工人代表苏維埃。并且列宁的提綱认为苏联无产阶级对落后国家的革命的直接援助是在这些国家里成立并发展“农民的”、“人民的”苏維埃的必要条件之一。显然，这个提綱指的不是中国或印度，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有一定数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并且在这些国家里建立工人苏維埃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农民苏維埃的先决条件；这个提綱指的是其他較落后的例如波斯等等国家。

罗易的提綱主要是指已有工业无产阶级的中国和印度。这个提綱建議在一定条件下，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显然，这个提綱对中国有直接的关系。

标题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維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特別提綱根据俄国和德国革命的經驗說明了工人代表苏維埃的作用。这个提綱断言：“沒有无产階級革命的苏維埃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对苏維埃的諷刺。”显然，在討論立即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問題时，我們也应当考虑到最后这个提綱。

如果同时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形势和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国民党的存在，以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后两个提綱的指示，那末，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的問題是怎样的呢？

現在，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內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这就是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提出推翻左派国民党和在中国成立新的苏維埃政权的斗争口号。

工农代表苏維埃是为推翻現存政权而斗争的机关，是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工农代表苏維埃的出現不能不造成两重政权，而两重政权又不能不使全部政权应当归誰的問題尖銳化起来。

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时存在着临时政府，它握有一半政权，而且也許是較为实在的政权，因为当时军队还是支持它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工兵代表苏維埃，它們也握有似乎一半政权，虽然不是像临时政府那样实在的政权。当时布尔什維克的口号是取消临时政府，把全部政权轉归工兵代表苏維埃。当时布尔什維克中間誰也沒有想到加入临时政府，因为既要推翻这个政府，就不能加入这个政府。

能不能說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六月俄国的形势类似現在中国的形势呢？不，不能这样說。所以不能这样說，不仅由于俄国当时面临着无产階級革命，中国現在則面临着資产階級民主革命，而且由

于俄国临时政府是反革命的和帝国主义的政府，现在的武汉政府则是反帝国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义下的革命的政府。

反对派在这方向我们建议些什么呢？

反对派建议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作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但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不只是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它们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现存政权的起义机关，是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机关。反对派不懂得：工农代表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只有作为新政权机关，才能变成革命运动的中心。不这样，工人代表苏维埃就会变成空架子，变成现存政权的附属品，就像一九一八年在德国和一九一七年七月在俄国发生过的情形一样。

反对派是否懂得现在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府这两重政权，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呢？

我很怀疑季诺维也夫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托洛茨基是完全明白这一点的，因为他在自己的提纲中直截了当地说：“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号召经过两重政权的过渡制度去建立实际的政权机关。”（见托洛茨基的提纲《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由此可见，我们在中国成立苏维埃，同时就是建立“两重政权的制度”，就是推翻武汉政府和建立新的革命的政权。大概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拿俄国革命历史中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一个时期的事变作样本的。当时在我国的确有过两重政权，当时我们的确推翻了临时政府。

但是我曾经说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加入临时政府。为什么托洛茨基不建议共产党人现在立即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呢？怎能成立苏维埃，建立两重政权的制度，同时又加入你要推翻的武汉

政府呢？托洛茨基的提綱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显然，托洛茨基在这里已无望地陷入他自己的矛盾的迷宫里了。他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无產階級革命混淆起来了。他“忘記了”中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沒有完結，不僅沒有勝利，而且只处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托洛茨基不懂得拒絕支持武汉政府，提出两重政权的口号，現在用立即成立苏維埃的办法来推翻武汉政府，就是給蔣介石和張作霖以直接的和明显的援助。

有人向我們說：既然如此，又怎样去了解一九〇五年在俄国成立工人代表苏維埃呢，难道当时我們不是經歷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嗎？

但是，第一、当时只有两个苏維埃，一个在彼得堡，一个在莫斯科，这两个苏維埃的存在並沒有造成俄国苏維埃政权系統。

第二、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苏維埃当时都是反对旧的沙皇政权的起义机关，这再度证实：不可把苏維埃看做仅仅是組織革命的中心，苏維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和新政权机关才能成为这样的中心。

第三、工人苏維埃的历史說明：只有具备了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无產階級革命的順利条件，也就是只有具备了从資產階級政权过渡到无產階級专政的順利条件，这样的苏維埃才能存在和进一步发展。

一九〇五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苏維埃，以及一九一八年德国的工人苏維埃所以灭亡，不都是由于当时沒有这样的順利条件嗎？

假如一九〇五年在俄国存在着类似現在中国左派国民党这样的广大革命組織，那末可能当时在俄国就不会有苏維埃了。但是，这样的組織当时在俄国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在俄罗斯工农中間沒

有民族压迫的因素，俄罗斯人自己就在压迫其他民族，而类似左派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只有在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因为这种压迫会把国内革命分子都集中到一个广大的组织里去。

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

但是，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得出这个结论：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一九〇五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

假如中国没有像左派国民党这样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的组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那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还没有胜利，而且不会很快胜利的现在，就把这个费了多年时间才成立起来的组织加以破坏，未免太愚蠢太无知了。

某些同志根据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将来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而且他们把这一点看做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一般说来，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不是没有的。在我们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初，也曾谈到革命有经过苏维埃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第一、国民党不是苏维埃，说国民党适合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事业，并不是说国民党就能适合于无产阶级革命



发展的事业，其实，工人代表苏維埃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合的形式；

第二、即使在一九一七年俄国苏維埃的条件下，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是那样地稀少，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那样地强大和众多，以致革命的每一推进和帝国主义者的每一进攻，都必然会使国民党发生新的分化，使共产党因国民党的威信降低而更为加强起来。

我想，中国革命的和平发展道路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想，在中国，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是不得不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的。因为在现今的条件下，没有工农代表苏維埃，这种过渡是不可能的。

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必须巩固武汉并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必须帮助武汉战胜反革命，必须在各地广泛地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作为将来成立苏維埃的基础，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在农民和军队中的势力，——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成立当做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要素的工农代表苏維埃。

在中国成立工人苏維埃，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篇空洞的“革命的”演说。不能像托洛茨基那样轻率地看这个问题。

首先，成立工农苏維埃就是说要退出国民党，因为不能既成立苏維埃，推进两重政权，号召工农建立新政权，同时又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里面。

其次，成立工人代表苏維埃就是说要以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要

以类似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的那种联盟，代替现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在那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下，问题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而在国民党党内结成联盟的政策是完全适合于这一点的，那末在这里，在成立苏维埃的条件下和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问题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要准备并建立这种政权，则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

其次，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使共产党人负有义务的。现在中国工人每月得八个卢布到十五个卢布，生活条件极恶劣，工作时间非常长。这种情形必须立即结束，而且可以结束，只要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等等。但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工人是不会满足于这一点的。他们会向共产党人说（而且他们是对的）：既然我们有苏维埃，而苏维埃又是政权机关，就不能压一压资产阶级，“稍微”剥夺资产阶级一下吗？如果共产党人在工农代表苏维埃存在的条件下不走上剥夺资产阶级的道路，那末他们就会成为空谈家了。

试问，现在，在革命现阶段上，是否可以而且需要走这条道路呢？

不，不需要。

将来，在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而且需要拒绝剥夺资产阶级呢？不，不可以。如果以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保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那就是流于妄想，不了解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中阶级力量斗争的诀窍。

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維埃的問題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这个問題并不像某些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之流的极輕率的人向我們描述的那樣簡單。

从原則上來看，一般地是不是容許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資產階級一起參加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党和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并在那里与之合作呢？

某些反对派以为这是不可容許的。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历史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內，这种參加是完全容許的。

我可以举出馬克思一八四八年在德国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时期的例子。当时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萊茵省的資產階級民主联盟，当时这个革命的民主政党的机关报《新萊茵报》就是由馬克思主編的。

馬克思和他的同志处在这个資產階級民主联盟內，把革命資產階級向前推进，同时用一切办法批判自己的右派同盟者的不彻底性，正像中国共产党处在国民党内应当用一切办法批判自己的同盟者左派国民党人的动摇和不彻底一样。

大家知道，直到一八四九年春天，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脱离了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联盟，并着手成立一个具有完全独立的階級政策的独立的工人階級組織。

由此可見，馬克思甚至比作为无產階級独立的階級政党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走得更远。

馬克思和他的同志在一八四八年加入这个資產階級民主联盟是否适当，是可爭論可不爭論的。例如罗莎·卢森堡认为馬克思不应当加入这个資產階級民主联盟。这是策略問題。但是，在原則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时期，在一定条件

下和一定时期內，加入資產階級革命政党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这是无可怀疑的。至于說到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环境中参加革命民主政府并在那里与革命資產階級合作，那末，关于这一点，我們已有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馬克思主义者的指示。大家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工作中的巴枯宁主义者》<sup>①</sup>中是贊成参加这种政府的。大家知道，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也是主張容許参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政府的。

## 五 两条路綫

总之，在我們面前有两条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問題的路綫：共产国际的路綫与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路綫。

共产国际的路綫。封建残余和依靠这种残余并为各国帝国主义者所竭力支持的官僚軍閥上层建筑是中国現状中的基本事实。

中国目前正經歷着既反对封建残余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中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南京和南京政府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

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結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革命政府，这一参加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用一切办法批評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而是以此为前提。

<sup>①</sup>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十五卷第105—124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应当利用共产党人的这种参加使无产阶级便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导者的作用，并促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更快地到来。

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新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机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应当之以在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而共产党则应成为中国新的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现在，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时候，当国民党是最适合于并且最能适应中国特点的民族民主革命组织形式的时候，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做的那样，提議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立即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瓦解革命运动，削弱武汉，促使武汉垮台，帮助張作霖和蔣介石。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綫。中国的封建残余乃是布哈林的捏造。在中国，封建残余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原来土地革命现在在中国是有的。但它从何而来，連鬼也不知道。（笑声）

既然这种土地革命是有的，那当然只好設法支持它了。

现在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中国关税自主的革命，即所謂反关税的革命。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不是“空架子”（托洛茨基）就是基馬尔主义（季诺维也夫）。

一方面，必須建立兩重政權以推翻武汉政府，其办法是立即成立苏維埃（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必須巩固武汉政府，必須給武汉政府以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其办法原来也是立即成立苏維埃（季諾維也夫）。

照例說來，共产党人應該立即退出这个“空架子”，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可是最好是讓他們留在这个“空架子”里，就是既留在武汉政府里又留在武汉国民党里。既然武汉是“空架子”，为什么他們还要留在武汉呢，——这实在只有上帝才知道。誰要是不同意这一点，誰就是奸賊和叛徒。

所謂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路綫就是如此。

几乎再想不出比这种所謂路綫更荒謬更糊塗的东西了。

得到的印象是：我們不是和馬克思主义者打交道，而是和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办事員，或者說得好一些，和“革命的”旅行家打交道。这些旅行家游历了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sup>①</sup>之类的地方，忽略了提出中国革命基本方針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后来从报纸上得知中国确实爆发了什么革命，既像土地革命，又像反关税革命，于是就决定写一堆提綱，四月写了一个提綱，五月初写了一个提綱，五月底又写了一个提綱，把这一堆提綱写好，就扔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他們以为这許多糊塗的和矛盾的提綱就是挽救中国革命的主要手段。

同志們，这就是中国革命問題上的两条路綫。

你們必須在这两条路綫中間加以选择。

同志們，我要結束我的講話了。

① 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是苏联著名的风景区和疗养地，均在高加索。——譯者注

我想在最後用幾句話談談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派別言論在當前的政治意義和作用。他們抱怨說，沒有給他們充分的自由來對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執委會進行聞所未聞的謾罵和不能容許的斥責。他們抱怨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制度”。實質上，他們要得到瓦解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自由。實質上，他們要把馬斯洛夫一伙人的作風移植到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里來。

同志們，我應當說，托洛茨基所選擇的攻擊黨和共產國際的時機太不恰當了。我剛剛得到英國保守黨政府決定和蘇聯絕交的消息。用不着證明，現在到處都會展開對共產黨人的進攻。這種進攻已經開始了。有些是以戰爭和干涉來威脅聯共（布）。另一些則是以分裂來威脅聯共（布）。正在建立一種從張伯倫到托洛茨基的統一戰綫之類的東西。

可能是想用這個來吓唬我們。但是，幾乎用不着證明，布爾什維克並不是膽小的孩子。在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上有過不少這樣的“戰綫”。布爾什維主義歷史表明，這些“戰綫”都被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的決心和無比的勇敢一一粉碎了。

不用懷疑，我們也能夠粉碎這種新的“戰綫”。（鼓掌）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九卷第257—282頁）

## 斯大林 時事問題簡評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 一 論战争的威胁

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一问题是現時的基本問題，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这里所說的不是什么不固定的无形的新战争“危险”，而是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

最近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和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已经“过时”了。某些新的国家（美国、日本）跑到前面去了。某些老的国家（英国）落在后面了。在凡尔赛几乎被埋葬了的资本主义德国正在复活、成长并日益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怀着嫉视法国的心理正往上爬。

争夺销售市场、争夺输出资本的市場、争夺通向这些市場的海陆道路、争取重新分割世界的疯狂斗争正在进行。美英之間、日美之間、英法之間、意法之間的矛盾正在增长。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正在增长，有时表现为无产阶级公开的革命发动（英、奥）。

帝国主义世界和附属国之間的矛盾也在增长，往往表现为公开的冲突和革命的爆发（中国、印尼、北非、南美）。

这一切矛盾的增长都表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增长，尽管稳



定是事实，这次危机却較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的危机无比地加深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存在和繁荣，只是使这个危机加深和尖锐罢了。

帝国主义正在准备新的战争，并把它看做解决这个危机的唯一途径，这是不足为奇的。军备的空前扩张，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法西斯“管理”方法的总方针，对共产党人的十字军讨伐，对苏联的疯狂攻击，在中国的直接干涉，这一切都是同一现象（准备重新分割世界的新战争）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假如没有共产党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假如没有苏联的和平政策成为新战争煽动者的绊脚石，假如帝国主义者不怕彼此削弱从而使帝国主义战线易于遭受新的突破，那末帝国主义者早已厮杀起来了。

我想，后一种情况，即惧怕彼此削弱从而使帝国主义战线易于遭受新的突破，乃是暂时阻止厮杀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帝国主义者的某些集团就有了一种“自然的”意图：把自己阵营里的矛盾推到后面去，暂时掩盖这些矛盾，成立帝国主义者的统一战线，向苏联进军，以便牺牲苏联来解决日益加深的资本主义危机，即使是局部地暂时地解决也好。

首先倡导这件事情的，首先倡导成立帝国主义者的反苏统一战线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的参谋部——保守党，这一事实对于我们不是什么意外。英国资本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民革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起到现在的中国革命止，英国资产阶级一直站在而且仍然站在人类解放运动的摧毁者的前列。苏联人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我国因英国资本家的恩赐而遭到的暴行、掠夺和军事侵犯。如果英国资本

及其保守党再来领导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策源地的战争，即反苏的战争，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是不喜欢用自己的手来作战的。它总是宁愿借别人的手来进行战争。它有时确实找到了甘愿为它火中取栗的傻瓜。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情形就是这样，那时英国资产阶级建成了欧洲各国的联盟来反对革命的法国。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那时英国资产阶级进攻苏联，企图建立“十四国联盟”，虽然如此，它还是被赶出了苏联国境。

现在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英国资产阶级企图在那里建立统一战线来反对中国革命。

十分明白，保守党在准备对苏战争，它已经进行好几年的准备工作来建立大小国家的反苏“神圣同盟”。

如果在从前，在最近时期以前，保守党人的这种准备工作多少是隐蔽地进行的，那末在现今，在最近时期，他们却转而采取了“直接的行动”，给予苏联几次公开的打击，企图在万目睽睽之下结成臭名远扬的“神圣同盟”。

第一次公开打击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这次袭击至少有两个目的。它要发现苏联“破坏”工作的“可怕”文件，凭借这些文件造成普遍愤怒的气氛和反苏统一战线的基礎。它要造成和北京政府的军事冲突，使苏联对中国作战。

大家知道，这一次打击是失败了。

第二次公开打击是袭击阿尔柯斯<sup>①</sup>并对苏绝交。这次打击的目的是要建立反苏统一战线，开始全欧洲对苏联的外交封锁，挑起

一系列对苏断絕条約关系的事件。

大家知道，这一次打击也失败了。

第三次公开打击是在华沙暗杀沃依柯夫<sup>②</sup>。保守党代理人所組織的对沃依柯夫的暗杀，照主謀者的毒計，是要起薩拉也沃暗杀事件<sup>③</sup>的作用，使苏联和波兰发生軍事冲突。

这一次打击看来也失败了。

这些打击暫時都还没有使保守党人得到他們所預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呢？

因为各个資产階級国家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这些国家有許多是願意和苏联保持經濟联系的。

因为苏联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

因为英国的附屬国，無論是張作霖的国家或皮尔苏茨基的国家都一样，不願意做保守党人的无声无臭的工具以損害其本身的利益。

看来可敬的公爵們不願了解：每个国家，即使它是最小的国家，都情願把自己当做一个单位，力求过自己的日子，不願为了保守党人的漂亮眼睛而把自己的生存作孤注一擲。英国保守党人忘

① 阿尔柯斯是苏联合作社代表团于一九二〇年在倫敦設立的股份公司的簡称。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該公司及苏联駐英国商务代表处同遭英国警察的搜查和襲击。——譯者注

② 沃依柯夫(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是苏联外交家，自一九二四年十月起，任苏联駐波兰全权大使，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在华沙被白卫分子杀害。——譯者注

③ 薩拉也沃暗杀事件系指奥国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薩拉也沃(波斯尼亚)被一个塞爾維亞民族主义者刺杀而言，这次刺杀案成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始爆发的表面原因。——譯自《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編者注

記了估計这一切情况。

这是不是說再不会有这样的打击呢？不，不是这样。相反地，这只是說打击将更加厉害地重复下去。

不能把这些打击看做偶然的事情。它們是从整个国际环境中、从英国資產階級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地位中、从作为执政党的保守党的地位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

現在的整个国际环境，英国政府反苏“业务”中的一切事实，它組織对苏的財政封鎖，它和列强进行关于反苏政策的秘密商談，它資助乌克兰、格魯吉亚、阿捷尔拜疆、阿尔明尼亚等等的流亡“政府”以期在苏联的这些国家內組織暴动，它資助間諜恐怖集团炸坏苏联桥梁、燒毀苏联工厂、恐吓和刺杀苏联駐外使节，这一切都无疑地向我們說明英国保守党政府坚决地走上了組織反苏战争的道路。同时决不可认为保守党人在某种条件下造成某种反苏的軍事同盟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任务是什么呢？

任务就是要在欧洲各国敲起新战争威胁的警钟，提高各資本主义国家工人和士兵的警惕性，不倦地使群众有准备地以革命斗争的全副武装对付各国資產階級政府組織新战争的种种企图。

任务就是要当众揭露一切“认为”新战争的威胁是“虚构”、以和平主义的謊言安慰工人并漠視資產階級在准备新战争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因为这些人想使战争出乎意外地襲击工人。

任务就是要使苏联政府今后仍然坚定不移地实行和平政策，实行保持和平关系的政策，不顾我們敌人的挑撥伎俩，不顾他們對我們威信的伤害。

敌人营壘中的挑撥者正在刺激我們，将来也要刺激我們，硬說

我們的和平政策是由于我們軟弱，由于我們軍隊軟弱。这有时激怒了我們的某些同志，他們易受挑撥并要求采取“断然的”手段。这是神經脆弱。这是缺乏耐性。我們不能够也不应当受敌人愚弄。我們应当走自己的道路，保卫和平事业，表明自己的和平意志，揭穿我們敌人的强盜意图，暴露他們是战争煽动者。

因为，假如敌人逼迫我們，确切些說，当敌人逼迫我們进行战争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我們有可能把苏联的劳动群众团結成一个統一的战斗营垒。

至于說我們“軟弱”或我們軍隊“軟弱”，那末我們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并不是第一次犯錯誤。約在八年以前，当英国資產階級对苏联实行干涉，而丘吉尔以“十四国”进军来威胁的时候，資產階級报刊也叫嚷我們軍隊“軟弱”，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英国干涉者及其同盟者是可耻地被我們胜利的軍隊赶出国境了。

新战争挑撥者先生們不妨記住这一点。

任务就是要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发展我們的国民經济，改进我們的軍事工业和非軍事工业，提高我国工人、农民和紅軍战士的警惕性，鍛炼他們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意志，消灭那种可惜还远沒有被消灭的松弛現象。

任务就是要巩固我們的后方并清除其骯髒东西，毫不躊躇地惩办“显貴的”恐怖分子和纵火焚燒我們工厂的人，因为沒有巩固的革命后方，就不可能有我国的国防。

不久以前，收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兰斯柏利、馬科斯頓和布罗克韦对于枪毙俄国王公貴族中二十个恐怖分子和纵火者的抗議书。我不能把这些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看做苏联的敌人，但是他們比敌人更坏。

他們比敵人更壞，因為他們自稱是蘇聯的朋友，可是又以自己的抗議幫助俄國地主和英國密探今後組織對蘇聯代表的暗殺。

他們比敵人更壞，因為他們要以自己的抗議使蘇聯工人在其死敵面前解除武裝。

他們比敵人更壞，因為他們不願了解槍斃二十個“顯貴的”分子是革命自衛的必要措施。

無怪乎人們說：“願上帝使我們擺脫這種朋友，而敵人，我們自己是能對付的。”

至於槍斃二十個“顯耀的”人物，那是讓蘇聯的敵人知道，讓國內外的敵人知道，蘇聯是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它的手腕是堅強的。

既然如此，對於我們那種在新戰爭威脅下向黨作新攻擊的倒臺的反對派能說些什麼呢？對於認為在戰爭威脅下對黨加強攻擊是適合時機的反對派能說些什麼呢？它不團結在黨的周圍去反對外來的威脅，卻認為利用蘇聯處境的困難來對黨作新的攻擊是適合時機的，這能有什麼好結果呢？難道反對派反對蘇聯在將來和帝國主義作戰時獲得勝利，反對加強蘇聯的國防力量，反對鞏固我們的後方嗎？或者，也許這是在新的困難面前畏縮，臨陣脫逃，以喋喋不休的左的詞句掩飾逃避責任的願望吧？……

## 二 關於中國

現在中國革命進入了新的发展階段，我們已能給走過的道路做出某種總結，並考察一下關於檢查共產國際在中國的路綫的問題。

有幾個列寧主義策略原則是必須顧到的，不顧到這些原則，既

不可能正确地领导革命，也不可能检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綫。我們的反对派早已忘記了这些原則。但是，正因为反对派有健忘的毛病，所以必須一再提到这些原則。

我指的是这样的列宁主义策略原則：

第一个原則。在共产国际給各国工人运动作出指导性的指示时，一定要估計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

第二个原則。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利用最小的可能以保证无产阶级有数量众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暫时的、动搖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也好；

第三个原則。一定要估計到这样一个真理：在政治上教育千百万群众，只有宣傳和鼓动是不够的，必須要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經驗。

我以为顧到这些列宁主义策略原則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沒有这个条件，便不可能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路綫作馬克思主义的檢查。

我們就从这几个策略原則来考察中国革命問題。

尽管我們党在思想上有了提高，可惜我們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领导者”，他們真誠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不用顧到中国經濟、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和傳統的民族特点，所謂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实在說来，这些“领导者”不同于真正领导者的地方，就在于他們衣袋里总藏着两三个現成的、对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需的”公式。顧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东西的問題，对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把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和每个国家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結合起来的問題，使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适应于各个国家

的民族—國家的特點的問題，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

他們不懂得，現在，當各國共產黨已經成長起來並成為群眾性的政黨的時候，領導的主要任務就在於發現和掌握每個國家的運動的民族特點，並善於把這些特點和共產國際的一般原理結合起來，使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目的易於實現並得以實現。

由此他們便企圖把對一切國家的領導千篇一律化。由此他們便企圖機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而不顧到個別國家的運動的具體條件。由此便產生了公式和個別國家革命運動之間的永遠的衝突，這種衝突是這些可憐的領導者領導的基本結果。

我們的反對派正是這類可憐的領導者。

反對派聽說中國正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同時他們知道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情況下進行的。由此便得出一個對中國的現成公式：打倒和資產階級的任何共同行動，共產黨人立即退出國民黨萬歲（一九二六年四月）。

但是反對派忘記中國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不同，它是一個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國家，因此，中國革命不單純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且是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帝國主義掌握中國工業、商業和交通命脈，帝國主義的壓迫不僅加於中國勞動群眾，而且加於中國資產階級某些階層，因此，中國資產階級能夠在一定條件下和在一定時期內支持中國革命。

大家知道，實際情形正是如此。如果拿中國革命的廣州時期、國民革命軍到達長江的時期、國民黨分裂以前的時期來說，那就不能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是支持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容許在一定時期內和在一定條件下與這個資產階級一起行動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結果是反对派背棄了自己的旧公式，宣布了一个“新”公式：和中国資产階級一起行动是必要的，共产党人不应当退出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四月）。

这是对反对派的第一个懲罰，他們所以遭受懲罰，是由于他們不願顧到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

反对派听說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各国的代表在中国关税自主的問題上发生了爭吵。反对派知道关税自主首先是中国資本家所需要的，由此便得出一个現成的公式：中国革命是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爭取中国关税自主。

但是反对派忘記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主要不在于限制中国的关税，而在于它在中国拥有从数万万中国工人和农民身上吸吮血液的工厂、矿山、铁路、輪船、銀行和商行。

反对派忘記了中国人民所以进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支持并鼓励直接剝削中国人民的封建主、軍閥、資本家、官僚等等力量，是由于中国工人和农民不同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便不能战胜自己的这些剝削者。

反对派忘記正是这种情况才是使中国資产階級革命有可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

反对派忘記誰宣傳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爭取关税自主的革命，誰就会否认中国資产階級革命有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因为他把中国革命交給中国資产階級去領導了。

的确，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关税自主实质上是中国資产階級的政綱，因为甚至連張作霖和蔣介石那样的反动头子現在都主張廢除不平等条約和建立中国的关税自主了。

由此便产生了反对派的两重性，他們企图摆脱自己的关税自主公式，企图悄悄地放棄这个公式，而轉向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可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場。

这是对反对派的第二个惩罚，他們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們不願认真地研究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

反对派听说商人资产阶级渗入了中国农村，把土地租給无产的农民。反对派知道商人不是封建主，由此便得出一个現成的公式：封建残余，也就是說，农民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在中国革命中没有重大的意义，現時在中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問題。

但是反对派看不见中国经济的特色不是商人資本渗入农村，而是在封建的中世紀的剝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依然保存的条件下，中国农村封建残余的統治是和商人資本的存在相結合的。

反对派不懂得，中国現在那种惨无人道地掠夺并压迫中国农民的整个軍事官僚机器，本质上就是农村封建残余和封建剝削方法的統治与商人資本的这种結合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

的确，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在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这个革命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中国的大小封建主。

事实表明这一革命已席卷几千万农民并有扩展到全中国的趋势。

事实表明，封建主，实在的活的封建主，在中国不仅存在着，而且在好多省份里掌握政权，使軍隊中的指揮人員服从他們的意志，使国民党的领导受他們的影響，接二連三地給中国革命以打击。

在此以后还否认封建残余和封建剝削制度是中国农村压迫的基本形式，在此以后还不承认土地革命是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基

本事实,这就是反对彰明較著的事实。

由此反对派便放棄了自己关于封建殘余和土地革命問題的旧公式,由此反对派便企图偷偷放棄自己的旧公式并默認共产国际的立場是正确的。

这就是对反对派的第三个懲罰,他們所以遭受懲罰,是由于他們不願顧及中国經濟的民族特点。

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公式和现实間的不协调,——这就是反对派可憐的領導者的命运。

而这种不协调是反对派違背一定要估計到每个国家革命运动中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东西这一列宁主义著名策略原則的直接結果。

請看列宁是怎样論述这个原則的:

“現在全部問題就是要使各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爱尔兰等)、所屬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別种种特征而具有而且必然具有的一些具体特点。現在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对于第二国际的不滿正在蔓延和滋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机会主义,一方面是由于它不会或者不能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起领导作用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維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掌握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須清楚的認識到,这样的中央领导机关無論如何不能建立在使斗争策略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划定、彼此雷同的基础上<sup>①</sup>。只要各个民族之間、各个国家之間的差別还存在

(这些差别就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取消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到各民族、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时,在细节上把这些原则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应用于这种情况。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性<sup>②</sup>,这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卷第73—74页)

共产国际的路线就是一定要顾到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路线。

相反地,反对派的路线就是违背这个策略原则的路线。

这种违背也就是反对派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上倒霉的根源。

现在来谈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

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中产生了无产阶级在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的同盟者的问题。

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中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国无产阶级面前站着强大的敌人：大小封建主，新旧軍閥的軍事官僚机器，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掌握中国经济生活命脉并用海陆軍来巩固自己剝削中国人民的权利的东方和西方的帝国主义者。

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其他一切而外，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灵活的和考虑周到的政策，必须善于利用敌人陣营里的每一裂痕，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的宣傳和鼓动，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組織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作。

这种政策是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則的基本要求。沒有这种政策，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认为这种政策是不正确的，非列宁主义的。但这只是說明他們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淨淨了，他們离开列宁主义是这样远，就像天地相隔一样。

中国无产阶级在不久以前有过这种同盟者嗎？

是的，有过。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上，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綫的革命（广州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貧民、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之一，在于这些阶级的代表是和共产党人一起在一个叫做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組織內共同进行工作的。

这些同盟者不是也不能是同样可靠的。他們中間有些是比較可靠的同盟者（农民、城市貧民），有些是不大可靠的和动摇的同盟

者(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則是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資產階級)。

國民黨當時不容爭辯地是人數比較眾多的組織。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政策是孤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右派),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他們,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左派)推向左邊,把農民和城市貧民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

當時廣州是不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呢?無疑地是的。現在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會否認這一點。

這一時期共產黨人的成就是什麼呢?擴大了革命地區,廣州軍隊到達了長江,有了公開組織無產階級的可能(工會、罷工委員會);共產主義小組結成了政黨;成立了第一批農民組織的基層組織(農民協會);共產黨人滲入了軍隊。

可見這一時期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

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蔣介石和民族資產階級轉到了反革命陣營,革命運動的中心由廣州移到了武漢,這時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民族資產階級退到反革命陣營的原因是什麼呢?第一是民族資產階級對工人革命運動規模的恐懼,第二是帝國主義者在上海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壓力。

這樣,革命便失去了民族資產階級。這對革命是局部的損失。但革命卻進入發展的更高階段,進入土地革命階段,使廣大農民群眾更靠近了自己。這對革命是有利的。

當時,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國民黨是不是人數眾多的組織呢?無疑地是的。它不容爭辯地是一個比廣州時期的國民黨人數更加眾多的組織。

当时武汉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呢？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否则武汉地区（湖北、湖南）当时就不会成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发展的根据地了。

当时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把它推向左边，把它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

当时有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呢？是的，是有的。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当时我们直截了当地说，要把武汉国民党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至少须有两个条件：国民党的彻底民主化和国民党对土地革命的直接赞助。假使共产党人放棄实行这种转变的企图，那就太愚蠢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人的成就是什么呢？

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从五六千人的小党成长为有五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大党。

工会成长为巨大的全国性的团体，约有会员三百万。

农民基层组织成长为拥有几千万人的巨大的团体。农民的土地运动发展到宏大的规模，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了中心地位。共产党争得了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共产党成了土地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

诚然，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诚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但是以为中国共产党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下子就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那就可笑了。只要把我们党经历过的一系列的分裂、脱离、变节、叛卖等等历史回忆一下，就能明白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产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也是完全正确的。

現在中國無產階級有沒有同盟者呢？

是的，是有的。

這些同盟者就是農民和城市貧民。

現時的特征是武漢國民黨領導集團轉入了反革命陣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離了革命。

這一脫離的原因，第一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日益發展的土地革命的恐懼和封建主對武漢領導集團的壓力，第二是帝國主義者在天津地區施壓力，要求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分裂，作為容許北進的代價。

反對派懷疑在中國有封建殘余存在。但是現在誰都明白，封建殘余在中國不僅存在着，而且它甚至比目前革命的進攻力量還要強大。正因為帝國主義者和封建主在中國暫時還較強大，所以革命遭到了暫時的失敗。

革命在這一次失去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這也正是革命暫時失敗的標志。

但是革命卻把廣大農民和城市貧民群眾更緊密地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從而奠定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基礎。

對於革命的好處就在這裡。

反對派說革命的暫時失敗是由於共產國際的政策。可是只有背棄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這樣說。只有背棄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要求正確的政策永遠而且一定導致對敵人的直接勝利。

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政策是否正確呢？是的，是正確的。既然有蘇維埃的存在，既然有布爾什維克的正確政策，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為什麼還遭到失敗呢？因為封建殘余和專制政體當時比工人的革命運動要強大些。



布尔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是正确的。既然有苏維埃的存在（苏維埃当时背叛了布尔什維克），既然有布尔什維克的正确政策，布尔什維克当时为什么还遭到失败呢？因为俄国帝国主义当时比工人的革命运动要强大些。

正确的政策并不永远而且一定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要直接战胜敌人，不仅决定于正确的政策，而且首先和主要决定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于革命力量的显著优势，决定于敌人阵营的瓦解，决定于有利的国际形势。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才能导致直接的胜利。

但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是正确的政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应当予以满足的。这个要求就是党的政策要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把无产阶级变为革命的领导者。

能否断言过去一个时期为中国革命的直接胜利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呢？显然是不能的。

能否断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没有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加强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没有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呢？显然是不能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使广大农民群众离开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周围了。

共产党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和广州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为了扩大革命地区，形成群众性的党，使自己有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并给自己开辟一条接近农民的道路。

共产党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联盟，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组织，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国民党的领导，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创造条件。

民族资产阶级跑进了反革命阵营，和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联系。

武汉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土地革命吓倒，在千百万农民群众心目中信誉扫地，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了。

但是千百万农民群众却因此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为无产阶级是自己唯一可靠的领袖和领导者了。

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这难道不明白吗？

只有这种政策才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这难道不明白吗？

除了我们的反对派中的可怜的领导者以外，谁能否认这种政策的正确性和革命性呢？

反对派断言：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之转到反革命方面，说明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联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

但是，只有忘记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并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净净的人才会有这样说。

在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直到一九一八年春，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联盟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想，还没有人敢于否认这个联盟的正确性。这个联盟的结局如何呢？结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能否根据这点就断言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呢？显然是不能的。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的革命联盟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想，还没有人敢于否认这种联盟在革命第二阶段时期的正确性。反对派自己当时（一九二七年四月）也断言这种联盟是

正确的。現在，在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脱离革命之后，怎能根据这种脱离就断言和武汉国民党的革命联盟是不正确的呢？

只有不坚定的人才会搬弄这样的“論据”，这难道不明白嗎？

难道有人断言过和武汉国民党的联盟是永无止期的联盟嗎？难道天地間有永无止期的联盟嗎？反对派簡直絲毫不懂得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則，即无产阶级要与非无产者的阶级和集团结成革命联盟的原則，这难道不明白嗎？

請看列宁是怎样論述这个策略原則的：

“要想战胜比較强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須极精細、极留心、极謹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間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別之間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暫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誰不懂得这一点，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得現代的科学社会主义<sup>①</sup>。誰要是沒有在实践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內，在相当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誰就沒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剝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以上所說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卷第 52 頁）

反对派的路綫是違背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則的路綫，这难道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不明白嗎？

相反地，共产国际的路綫是一定要顧到这个策略原則的路綫，这难道不明白嗎？

\*                     \*                     \*

現在來談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則。

这个策略原則所涉及的是更換口号、更換口号的程序和方法問題。它所涉及的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把党的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怎样和用什么方法把群众引导到革命的立場上來，使群众自己根据亲身的政治經驗深信党的口号的正确性。

要說服群众，单靠宣傳和鼓动是不行的。为此必須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經驗。为此必須使广大群众亲身体驗到推翻現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不可避免性。

先进集团、政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已經深信，譬如說，推翻米留可夫—克倫斯基临时政府的不可避免性，这是好的。然而单是这一点还不足以推翻这个政府，还不足以把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維埃政权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当前的口号。为了把“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公式从最近将来的前途变成当前的口号，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还必須有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使群众自己深信这个口号的正确性并給党以某种支持来实现这个口号。

必須把作为最近将来的前途的公式和作为当前口号的公式严格地区別开来。以巴格达齐也夫为首的彼得堡布尔什維克集团，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正是在这一点上碰了釘子，那时他們过早地提出了“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当时列宁把巴格达齐也夫集团的这种企图看成是危险的冒險主义，当众斥責了它<sup>①</sup>。

为什么呢？

因为后方和前方的广大劳动群众还没有决心接受这个口号。因为这个集团把作为前途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公式和作为当前口号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混淆起来了。因为这个集团冒进，使党有脱离当时还相信临时政府的革命性的广大群众和苏维埃而完全孤立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人应不应当，譬如说，在半年以前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呢？不，不应当提出。

不应当提出，因为这是危险的冒进，这会妨碍共产党人去接近那些还相信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广大劳动群众，这会使共产党脱离广大农民群众而孤立起来。

不应当提出，因为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没有把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作用发挥净尽，还没有因它反对土地革命、因它反对工人阶级、因它转到反革命方面而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心目中丢其脸，信誉扫地。

我们总是说：只要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把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作用发挥净尽，就不能采取使它信誉扫地和更换它的方针，必须让它先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净尽，然后才在实践上提出更换它的问题。

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应不应当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呢？是的，应当，完全应当。

现在国民党领导集团已因它反对革命而丢其脸，使自己和广大工农群众处于敌对地位，这个口号一定会在人民群众中间获

①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四卷第183—184页。——《斯大林全集》编者注

得有力的响应。

現在每个工人和每个农民都会懂得，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而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是做得正确的。

因为現在摆在农民和工人群众面前让他们选择的是这样一个問題：或者是国民党現在的領導集团，那末就要拒絕滿足农民和工人群众的迫切需要，就要放棄土地革命；或者是土地革命和根本改善工人階級状况，那末更換武汉国民党領導集团就成为群众的当前口号了。

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則的要求就是如此，这个原則是有关更換口号的問題，是把广大群众引导到新的革命立場上的方法和途徑的問題，是以自己的政策、自己的行动、适时地以另一些口号代替这一些口号来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根据亲身的經驗認識党的路綫的正确性的問題。

請看列宁是怎样論述这个策略原則的：

“单靠先鋒队是不能致胜的。当整个階級和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鋒队的立場，或者至少还没有对先鋒队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且表示完全不支持先鋒队的敌人时，单叫先鋒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階級，使被資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場上来，仅靠宣傳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經驗①。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規律，現在这个規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也得到了十分鮮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明而有力的證明。不僅文化落后、大都不識字的俄國群眾，就連文化程度很高、個個識字的德國群眾，也都亲身体驗到第二國際騎士們的政府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資產階級奴顏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驗到不实行无產階級專政，就必然会有極端反动分子（俄國的科爾尼洛夫、德國的卡普<sup>①</sup>之流）的專政，为了堅決轉到共产主义方面來，唯一的出路是实行无產階級專政。國際工人运动中覺悟的先鋒隊，即各國共产党，共产主义集團和派別的當前任務就是要善于把廣大的（而現在大半還是酣睡、消沉、因循守旧而沒有醒悟的）群眾引導到這種新立場上來，确切一點說，就是不僅要善于領導自己的黨，也要善于在這些群眾接近和轉到新立場上的過程中領導他們。”（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卷第74—75頁）

反对派的基本錯誤在于他們不了解这个列寧主义策略原則的意義和作用，他們不承認这个策略原則，他們一貫地破坏这个策略原則。

他們（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九一七年初就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則，企图“跳过”還沒有完成的土地运动（这是列寧的看法）。

他們（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則，企图“跳过”工会的反动性，不承認共产党人在反动工会中工作是适当的，否認和这种工会結成临时聯盟的必要性。

他們（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克）破坏了这个策略原

---

① 卡普（一八六八——一九二二）是德國一九二〇年反革命政變——“卡普盲動”的主要領導者，政變后成為政府首領，他的政府僅存在數日即被德國工人的總罷工推翻。——譯者注

則，企圖“跳過”中國革命運動的民族特點（國民黨），“跳過”中國人民群眾的落後性，於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產黨人立刻退出國民黨，而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國民黨發展階段還沒有完結沒有終了的情況下又提出立即組織蘇維埃的口號。

反對派以為既然他們了解了、認清了國民黨領導集團的不徹底、動搖、不可靠，既然他們認清了與國民黨的聯盟是暫時的和有條件的（而每個有經驗的政治工作人員都不難認清這一點），那末，這就完全足以展開反國民黨、反國民黨政權的“堅決行動”了，就完全足以使群眾、使廣大工農群眾“立即”支持“我們”和“我們的”“堅決行動”了。

反對派忘記了，在這裡，“我們的”了解還遠不足以使中國共產黨人能夠率領群眾。反對派忘記了，為了這一點，還必須使群眾自己根據他們親身的經驗去認清國民黨領導集團的不可靠性、反動性、反革命性。

反對派忘記了，“干”革命的不僅是先進集團，不僅是黨，不僅是個別的即使是“高級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萬人民群眾。

奇怪的是反對派忘記了千百萬人民群眾的狀況、認識和堅決行動的決心。

我們、黨和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是否知道必須推翻米留可夫—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是否知道臨時政府的存在和蘇維埃的活動不能相容，是否知道政權應當轉到蘇維埃手中呢？是的，是知道的。

以巴格達齊也夫為首的彼得堡的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集團於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了“打倒臨時政府，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



并企图推翻临时政府，那时候为什么列宁斥責这个集团是冒險主义者呢？

因为广大劳动群众、一部分工人、千百万农民、广大军队群众以及苏維埃本身都还没有决心把这个口号作为当前的口号来接受。

因为临时政府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等小资产阶级政党，还没有使自己的作用发挥净尽，还没有使自己在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心目中信誉扫地。

因为列宁知道，为了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維埃政权，只有无产阶级先进集团即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和觉悟是不够的；为了这一点，还必须使群众自己根据亲身的经验深信这种路线的正确性。

因为必须经过杂乱的联合政府，经过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月、八月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变节和背叛，必须经过一九一七年六月前线可耻的进攻，经过各小资产阶级政党跟科尔尼洛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誠实的”联合，经过科尔尼洛夫的暴动等等，才能使千百万劳动群众深信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維埃政权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把作为前途的苏維埃政权口号，变成作为当前口号的苏維埃政权口号。

反对派的倒霉在于他们屡犯巴格达齐也夫集团当时犯过的错误，他们离开了列宁的道路，宁愿顺着巴格达齐也夫的道路“行进”。

我们、党和列宁在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的时候和在彼得堡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是否知道立宪会议是和苏維埃政权制度不相容的呢？是的，是知道的。

我們究竟为了什么召开这个會議呢？資產階級国会制度的敌人布尔什維克在建立了苏維埃政权以后，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自己召开立宪會議，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这是不是“尾巴主义”，落后于事变，“抑制群众”，破坏“远程射击”策略呢？当然不是的。

布尔什維克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帮助落后的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并确信立宪會議的无用，确信它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千百万农民群众靠近自己，使自己易于解散立宪會議。

列宁关于这一点写道：

“1917年9—11月間，我們参加了俄国資產階級議會，即立宪會議的选举。我們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我們俄国布尔什維克在1917年9—11月間，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議會制度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經过时了嗎？当然是这样，因为問題不在于資產階級議會存在得久不久，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維埃制度、解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議會，有了怎样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的准备）。1917年9—11月間，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城市工人階級、兵士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議會已經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絲毫不容爭辯的、完全确定了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維克还是沒有抵制立宪會議，而是在无產階級夺得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选举……”

由于可以得出一个絲毫不容爭辯的結論：事实证明，甚至在苏維埃共和国胜利以前的几星期內，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不仅对革命无產階級沒有妨害，反而易于

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議會应该解散，易于取得解散这种議會的成功，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議會制度成为‘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东西。”（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卷第40—42頁）

布尔什維克实际上就是这样应用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則的。

在中国也必须这样应用布尔什維主义的策略，不論所指的是土地革命、国民党或苏維埃口号都一样。

看来反对派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完全失敗。这当然是不对的。中国革命遭到了暫时的失敗，这是沒有疑問的。但这是怎样的失敗，是多大的失敗，——現在的問題就在这里。

可能这是近乎长期的失敗，像俄国一九〇五年发生过的那样，革命中断了整整十二年，然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新的力量爆发起来，推翻专制政体，为新的苏維埃的革命扫清道路。

不能认为这个前途是沒有的。这还不是革命的完全的失敗，正像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失敗不能认为是彻底的失敗一样。这不是完全的失敗，因为当前发展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土地革命，中国的革命的統一，从帝国主义羈絆下得到解放）还待解决。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当然在中国也談不上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因为只有革命高漲的环境中苏維埃才能成立和兴盛起来。

但是，恐怕不能认为这个前途是可能的。无論如何暫时还没有根据认为这个前途是可能的。沒有根据，是因为反革命还没有联合起来，也不会很快联合起来，如果一般說来它有一天会联合起来的話。

因为新旧軍閥之間的战争正以新的力量爆发起来，这个战争不能不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同时不能不使农民破产和更加怨恨。

因为在中国还没有一个集团或政府能够实行类似斯托雷平的改革来作为統治集团的避雷針。

因为已經夺得地主土地的千百万农民是不容易抑制和压倒在地上的。

因为无产阶级在劳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无产阶级的力量还远沒有被击潰。

中国革命的失敗，就其程度說来，可能类似布尔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遭到的失敗，那时候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維埃背叛了布尔什維克，布尔什維克不得不轉入地下，經過了几个月，革命又重新走上街头，来扫除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了。

当然，这里的比拟是有条件的。我作这个比拟是附有一切保留条件的，如果注意到当前中国的形势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的差别，那就会看出这一切保留条件都是必要的。我采用这种比拟仅仅是为了大略地描繪出中国革命失敗的程度。

我想这个前途的可能性較大。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如果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經過两个月，也許經過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漲成为事实，那末，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的問題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漲条件下，成立苏維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問題。

昨天，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維埃的口号，因为这会是我們的反对派所特有的冒險主义，因为国民党領

导集团还没有作为革命的敌人而使自己信誉扫地。

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如果（如果！）在最近时期将有一个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的话。

因此，现在，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是“头一个”说这话的人，这就是他们叫做“远程射击”的策略。

不对，最亲爱的，完全不对！这不是“远程射击”的策略，而是徘徊歧路的策略，不是射远了就是射近了的策略。

当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时，这就是射远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

当反对派宣称中国革命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时，这就是射近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偷偷地抛棄了他們的公式。

当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四月宣称中国封建残余被夸大了，而忘记了群众性的土地运动的存在时，这就是射近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默认了自己的错误。

当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四月提出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时，这就是射远了的策略，因为当时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阵营内部的矛盾，其中一个（托洛茨基）要求采取推翻武汉政府的方针，而另一个（季诺维也夫）相反地要求“用一切办法帮助”这个武汉政府。

但是，从什么时候起在我們中間开始把这种徘徊歧路的策略，不是射远了的就是射近了的策略称为“远程射击”的策略呢？

关于苏維埃必須說，共产国际早就先于反对派而在自己的文件中談到了中国的苏維埃这一前途。至于反对派在今年春天为了对抗革命的国民党（国民党在当时是革命的，否則季諾維也夫就用不着喊叫“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了）而把苏維埃作为当前口号提出来，这就是冒險，就是乱叫乱嚷的冒进，就是巴格达齐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所犯的那种冒險和那种冒进。

虽然苏維埃口号在中国最近的将来可能成为当前口号，但是还远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反对派在今年春天提出苏維埃口号不是危險的和有害的冒險行为。

同样的，虽然“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曾于一九一七年九月被列宁认为是必要的和切合时宜的口号（見中央关于起义的有名的决定）<sup>①</sup>，但还远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巴格达齐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这个口号不是有害的和危險的冒險行为。

巴格达齐也夫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可以讲他是“头一个”說到，还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說到苏維埃政权的人。这是不是說，巴格达齐也夫是对的，而列宁把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言論斥責为冒

<sup>①</sup> 列宁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从地下寄給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維克組織的文章和信件中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把它作为組織武装起义的直接任务（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五卷第306—311頁和第二十六卷第1—10頁）。当九月十五日党中央委员会會議討論列宁的来信时，斯大林同志对要求消灭这些文件的投降主义者加米涅夫給予了坚决的反击，提議把列宁的来信散發給最大的黨組織討論。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在列宁、斯大林、斯維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烏里茨基参加之下，举行了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委员会有历史意义的會議，会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武装起义的决定（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六卷第171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險主义就是不对的呢？

看来我們的反对派对巴格达齐也夫的“桂冠”总是羡慕不已。

反对派不懂得，問題并不在于“头一个”說話，从而冒进和攪乱革命事业，而在于及时地說話，并且要使所說的話为群众所响应而变成行动。

事实就是如此。

反对派离开了列宁主义的策略，其政策是“过左的”冒險主义，——总结就是如此。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九卷第 291—325 頁）

斯 大 林

## 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摘录)

——摘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 一 反对派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攻击

.....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分子喊叫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它的领导）犯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孟什维主义的错误。这是对的。但他们拿这一点指摘共产国际的领导，那就完全不对了。相反地，共产国际经常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上的错误。这一点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从报刊上，从《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sup>①</sup>上可以知道这一点，你们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可以知道这一点。反对派无论什么时候也没有举出而且也举不出共产国际有哪一个指示、哪一个决议会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产生孟什维主义的倾向，因为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指示。如果以为什么地方共产党内或共产

---

<sup>①</sup> 《共产国际》杂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该杂志从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以俄文、法文、德文、英文及其他文字出版。因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该杂志随即停刊。——《斯大林全集》编者注



党中央委员会内产生了孟什維主义的傾向就一定要归咎于共产国际,那就太荒謬了。

加米涅夫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犯孟什維主义的錯誤,并回答說,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領導不正确才会犯这样的錯誤。可是我要問:德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革命时期为什么犯孟什維主义的錯誤呢?为什么出現布兰德勒派<sup>①</sup>呢?是誰支持布兰德勒派呢?反对派現在的首領托洛茨基曾經支持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的孟什維主义的錯誤,这难道不是事实嗎?为什么当时加米涅夫不說布兰德勒派的出現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領導不正确呢?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忘記了无产階級革命运动的教訓。他們忘記了:在革命高漲的时候共产党内一定会出現右傾和左傾,其中前者不願拋棄过去,后者不願考虑現在。他們忘記了沒有一个革命是不发生这些傾向的。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我們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难道当时我們党内沒有右傾和左傾嗎?难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忘記了这一点嗎?同志們,你們記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革命时犯了孟什維主义的錯誤的历史嗎?当时为什么出現这些錯誤呢?这应当归咎于誰呢?这难道可以归咎于列寧或列寧党的中央委员会嗎?反对派怎么能“忘記”諸如此类的事实呢?他們怎么能“忘記”在革命高漲时党内总会出現离开馬克思主义的右傾和左傾呢?而在这种情况下,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列寧主义者的任务是什么

<sup>①</sup> 布兰德勒派是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傾机会主义派別。这个派別是以布兰德勒得名的。布兰德勒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曾参与德国共产党的領導并且是右派集团的首領。布兰德勒派的投降政策以及他們同社会民主党上层的合作使德国工人階級在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中遭到失敗。一九二九年,布兰德勒因进行反党的派別活动而被开除出共产党。——《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呢？那就是既要打击左倾分子，又要打击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的高傲使我感到惊奇，你们看，他竟对西方或东方的共产党的极小的错误也不能容忍。在中国，党还很年轻，它成立还不过两年，在那里出现了孟什维主义的错误，你们看，这竟使托洛茨基吃惊了。可是，托洛茨基自己在孟什维克中间徘徊了多少年呢？这一点他忘记了么？要知道，他在孟什维克中间徘徊了整整十四年——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为什么他给自己十四年的时间来徘徊于各种反列宁的“派别”之间，然后才靠近布尔什维克，而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连四年的时间也不愿意给呢？为什么他对别人这样高傲，而对自己的徘徊却忘记了呢？为什么呢？所谓“公正”究竟在哪里呢？

## 二 关于中国

现在谈谈中国问题。

我不想多谈反对派在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上的错误了。我不想多谈，因为关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很多，而且很使人信服，这里用不着再重复了。所谓中国革命在现阶段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托洛茨基），这一点我不想多谈了。所谓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的话，也没有多大意义，因此，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这一点也不必多谈了。关于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诸如此类的错误，你们想必已经从我们党的报刊上知道了。

现在谈谈列宁主义解决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的問題。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处理殖民地以及附屬国革命运动問題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就是把帝国主义国家(即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屬国(即受別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加以严格的区别。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一回事,在那里,资产阶级是其他民族的压迫者;在那里,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各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在那里,作为解放斗争因素的民族因素是没有的。殖民地和附屬国的革命是另一回事,在那里,別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革命的因素之一;在那里,这种压迫不能不也触犯到民族资产阶级;在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那里,作为解放斗争因素的民族因素是革命的因素。

不这样加以区别,不了解这种差别,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就是离开馬克思主义的道路,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第二国际拥护者的道路。

請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报告中对这一点是怎样說的:

“我們的提綱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間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們強調这种区别。”<sup>①</sup>(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三十一卷第210頁)

反对派的基本錯誤就在于他們不了解也不承认一种类型的革命和另一种类型的革命之間的这种差别。

反对派的基本錯誤就在于他們把俄国这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帝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国主义国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和中国这个被压迫的、不得不反对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

在我们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自由资产阶级不能不是反革命的。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当时就没有提出也不能提出同自由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联盟和协议。根据这一点，反对派断言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各阶段上也应当如此，在中国，同民族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协议和联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反对派忘记了只有那些不了解并且不承认被压迫国家的革命和压迫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别的人才能这样说，只有背弃列宁主义而滚到第二国际拥护者方面去的人才能这样说。

请看列宁关于可以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成立暂时的协议和联盟是怎样说的：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sup>①</sup>，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卷第129页）……“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资产阶级解放<sup>②</sup>运动。”（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卷第211—212页）

---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曾經非常激烈地反对在俄国同资产阶级成立協議的列宁却认为在中国可以容許这种協議和联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也許列宁錯了吧？也許他从革命的策略轉到了机会主义的策略吧？当然不是！这种事情所以“发生”，是因为列宁了解被压迫国家的革命和压迫国家的革命之間的差別。这种事情所以“发生”，是因为列宁了解殖民地和附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能够支持本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反对派不願意了解这一点，而他們所以不願意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們背棄了列宁的革命策略，背棄了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

你們是否注意到反对派的首領們在自己的演說中如何竭力避开列宁的这些指示，害怕涉及这些指示呢？他們究竟为什么要避开列宁对于殖民地和附屬国所做的大家都知道的策略指示呢？他們为什么害怕这些指示呢？因為他們害怕真理，因為列宁的策略指示推翻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革命問題上的整个思想政治立場。

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反对派糊塗到这样的地步，現在竟否认中国革命发展有任何阶段。可是，难道会有一种沒有自己的一定发展阶段的革命嗎？难道我国革命沒有过自己的发展阶段嗎？拿列宁的“四月提綱”<sup>①</sup>来看就可以知道，列宁认为我国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土地运动为其主要中心；第二阶段是十月革命，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其主要中心。

中国革命有几个阶段呢？

依我看，应当有三个：

<sup>①</sup> 見列宁《論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四卷第1—8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

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军进抵长江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而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现在中国革命正处在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它是会到来的。

谁不懂得革命不会没有自己的一定发展阶段，谁不懂得中国革命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三个阶段，谁就一点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得中国问题。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第一、它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第二、它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如香港罢工等）。当时广州是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和根据地呢？当然是的。这一点现在恐怕只有瞎子才会否认。

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正应当具有这样的性质，这对不对呢？我想是对的。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论述中国和印度革命的“补充提纲”中直接指出，在这些国家里，“外国的强暴势力始终阻碍着社会生活的自由发展”，“因此，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sup>①</sup>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记录第605页）。

中国革命已经走过这个“第一步”即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走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过全民族联合战綫的革命时期，而进入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时期。这个事实就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相反地，例如土耳其（基馬尔主义者）的革命却停留在“第一步”，停留在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級解放运动的阶段，甚至不打算轉入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阶段。这个事实就是土耳其革命的特点。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在广州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是什么呢？当时它們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級知識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級的联盟。当时广州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和革命的根据地呢？当时把广州国民党当做对帝国主义进行解放斗争的政府而加以支持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当中国的广州和土耳其的安哥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时候，我們援助广州和安哥拉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我們是正确的。我們是正确的，我們当时是跟着列宁走的，因为广州的和安哥拉的斗争分散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削弱并挫折了帝国主义，从而便利了世界革命策源地的发展事业即苏联的发展事业。我們的反对派現在的首領們当时和我們一起支持广州和安哥拉，給了它們一定的援助，这是不是对的呢？是对的。誰来試試駁倒这一点吧。

但是，应当怎样理解在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和民族资产阶級結成的統一战綫呢？这是不是說共产党人不应当加强工农反对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級的斗争，无产阶級应当牺牲（即使是最小限度地、即使是片刻地）自己的独立性呢？不，不是这个意思。統一战綫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把无产阶級組織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公开組織工农革命，从

而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准备条件。我以为报告人已经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文件充分证明共产国际正是教导中国共产党这样理解统一战线。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引证了一九二六年十月发往上海的一封唯一的电报。电报中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我绝不承认这封电报是正确的。我从来没有认为并且现在也不认为共产国际是毫无过错的。个别的错误是会有有的，而这封电报无疑是错误的。但是，第一、这封电报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并没有反对派方面的任何声明或表示，就由共产国际自行取消了。第二、为什么反对派直到现在对这件事绝口不谈，为什么他们过了九个月以后才想起这封电报，为什么他们把这封电报在九个月以前就已经由共产国际取消了的事实瞒住了党呢？因此，如果认为这封电报规定了我们的路线，那就是恶意诽谤。事实上这是一封个别的偶然的电报，绝对不能代表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我们领导的路线。这一点（我重说一遍）只要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这封电报在几个星期以后就被一些规定了路线并且无疑地能代表我们领导的文件所取消了。

让我来引证这些文件吧。

例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即上述电报发出后一个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决议中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目前形势独有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过渡性，现时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以及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之间应当有所选择。如果无产阶级不提出激进的土地纲领，它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将失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sup>①</sup>



其次：

“如果不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同等看待<sup>②</sup>，广州国民政府就不能在革命中保持政权，就不能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決議）

請看，这就是真正規定共产国际领导路綫的文件。

非常奇怪，反对派首領們竟避开共产国际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文件。

如果我引证我自己的也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會議上发表的演說，或許不算是謙虛吧。这个委员会曾起草（当然，我也参加了）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問題的決議。这篇演說后来印成了单行本，題为《論中国革命的前途》。下面就是这篇演說中的几段：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間，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間，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們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同志們，这是极端荒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綫就愈有力愈强大。”

其次：

“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間，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改善他們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而举行罢工是不應該的，劝告工人不要罢工。（喊声：“广州和上海都有过这样的事情。”）同志們，这是很大的錯誤。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无产阶

---

① ② 蕭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級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綱中应当指出这一极端不好的現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勢，帮助工人（即使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們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錯誤。如果这样，中国还要革命做什么呢？”（見斯大林《論中国革命的前途》<sup>①</sup>）

再看第三个文件，这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发出的，当时中国各城市紛紛提意見圍攻共产国际，断言展开工人斗争会引起危机、失业和工厂倒閉。文件上說：

“在城市中退却并收縮工人爭取改善其地位的斗争的总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必須在农村中展开斗争，但同时必須利用有利的时机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用一切方法使工人的斗争具有組織性，以免发生过火行为和冒进現象。特別是必須竭力把城市中的斗争引向反对大資產階級，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使中国的中小資產階級尽可能地留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統一战綫范围内。我們认为調解室、仲裁法庭这种制度是适当的，只要在这些机关中可以保证执行正确的工人政策。同时我們认为必須提出警告：发布反对罢工自由、反对工人集会自由等法令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第四个文件是在蔣介石政变前一个半月发出的。文件上說：

“必須在軍隊中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部工作，在沒有这种支部而又可能成立支部的地方，必須把它們成立起来；在不可能成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須靠隱蔽的共产党员加紧进行工作。

<sup>①</sup>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八卷第 330、332 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必須堅持武裝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自卫武裝的实际权力机关等方針。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貌出現，不容許随意采取半合法的政策，共产党不能成为群众运动的障碍，共产党不应当掩飾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的和反动的政策，必須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圍的群众去揭穿国民党右派。

必須使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者注意：目前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部署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經歷着危急的时期；只有在展开群众运动的坚决方針下，革命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則革命就会遇到极大的危險。因此，現在实施指示比任何时期都更必要。”

更早些，还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即在国民党右派和蔣介石政变前一年，共产国际就警告过中国共产党，向它指出“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們开除出去”。

对于殖民地革命第一阶段反帝統一战綫的策略，共产国际过去和現在都是这样理解的。

反对派是不是知道这些指导性的文件呢？当然是知道的。为什么他們对这些指导性的文件絕口不談呢？因为他們所力求的是糾紛，不是真理。

要知道有一个时期，反对派現在的首領們，特別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懂得一点儿列寧主义，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基本上坚持了共产国际所奉行的、列寧同志在他的提綱<sup>①</sup>中給我們規定的那一政策。我指的是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間共产国际举行第六次

<sup>①</sup> 見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見《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卷第124—130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全会的时候，当时季諾維也夫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当时他还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还没有来得及投到托洛茨基阵营去。我所以谈到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是因为这次全会在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間曾經一致通过一个关于中国革命的決議<sup>①</sup>，其中对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对广州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所做的估計，大致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所做的一样，可是反对派現在却千方百計地迴避这个估計了。我所以谈到这个決議，是因为季諾維也夫当时贊成这个決議，并且中央委員中沒有一个人反对它，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以及現在反对派的其他首領也不例外。

让我从这个決議中举出几段。

請看在这个決議中关于国民党是怎样說的：

“上海和香港中国工人的政治罢工（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九月）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解放斗争中造成了一个轉折点…… 无产阶级的政治发动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一切革命民主組織首先是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其中坚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結成了同盟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sup>②</sup>，这个联盟的基础就是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全部軍事封建生活制度、爭取国家独立并建立統一的革命民主政权的斗争中这些阶层的阶级利益的共同性。”（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決議）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东方委员会所起草的关于中国問題的決議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在全会會議上通过（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提綱和決議》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31—136頁）。

——《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总之，广州国民党是四个“階級”的联盟。你們可以看出，这几乎就是当时共产国际主席季諾維也夫（而不是別人）所祝福过的“馬尔丁諾夫主义”<sup>①</sup>。

关于广州国民党政府：

“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府<sup>②</sup>已經和最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城市民主派群众联系起来，依靠他們击潰了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帮（并进行着使广东省全部政治生活彻底民主化的工作）。这样看来，作为中国人民爭取独立的先鋒队的广州政府是國內未来革命民主建設的典范。”<sup>③</sup>（同上）可見代表着四个“階級”联盟的广州国民党政府是革命的政府，不但是革命的，而且是中国未来革命民主政府的典范。

关于工人、农民和資产階級的統一战綫：

“在新的危險面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当展开最广泛的政治工作，組織群众性的发动去支持国民革命軍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陣营中的內部矛盾，并以革命民主組織領導下的最广大居民阶层（工人、农民和資产階級）的民族革命統一战綫去对抗帝国主义者。”<sup>④</sup>（同上）

由此可見，在殖民地国家內，在殖民地革命的一定阶段同資产階級成立暫时的联盟和協議，不但是可以容許的，而且簡直是必要的。

① 馬尔丁諾夫(从前是孟什維克，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接收入党)在他論述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发展問題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革命可以由資产階級民主革命和平轉变为无产階級革命的論点。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苏維埃联盟企图把馬尔丁諾夫提出这个錯誤論点的責任推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領導身上。——《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②③④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这倒很像列宁在他的关于共产党人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的策略的著名指示中告诉我们的话。不过很可惜，季诺维也夫已经把这一点忘记了。

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

“暂时聚集在国民党周围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个别阶层，最近一年来离开了国民党，这就使得国民党的右翼中形成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公开反对国民党同劳动群众的紧密联盟，主张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内开除出去，并反对广州政府的革命政策。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一月）斥责了这个右翼，确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成立战斗联盟是必要的，这样就确定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活动的革命方向，保证了国民党能得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支持。”<sup>①</sup>（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决议）

可见共产党人如果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退出国民党就会是严重的错误。不过很可惜，曾经赞成这个决议的季诺维也夫过了个把月就把这一点忘记了。因为还在一九二六年四月间（过了一个月）季诺维也夫就要求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了。

关于中国共产党内的各种倾向和关于不容许跳过革命的国民党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决将在反对两种同样有害的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一方面反对右的取消主义，因为这种右的取消主义忽视中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任务，而主张和一般民主民族运动毫无原则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反对极左

<sup>①</sup>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的情緒，因为这种极左的情緒力求跳过运动的革命民主阶段而直接跳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去，忘記了农民这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的决定因素。”<sup>①</sup>（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決議）

你們可以看見，現在用来揭穿反对派那种跳过中国发展的国民党阶段、低估农民运动和跳到苏维埃方面去的行为的一切证据这里都有了。真是命中要害。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是不是知道这个決議呢？

应当认为是知道的。無論如何季諾維也夫总不会不知道这个決議，因为这个決議是在他担任主席的时候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上通过的，而且他本人是贊成这个決議的。为什么現在反对派的首領們却避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高机关的这个決議呢？为什么他們对这个決議絕口不談呢？因为这个決議在中国革命的各项問題上都反对他們。因为这个決議推翻了反对派現在的全部托洛茨基立場，因为反对派的首領們已經离开了共产国际，离开了列宁主义，現在他們害怕自己的过去，害怕自己的影子，不得不畏縮地避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的決議。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談談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如果說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革命的鋒芒主要指向外国帝国主义，那末第二阶段的特点是革命的鋒芒主要指向国内的敌人，首先是指向封建主，指向封建制度。

第一阶段解决了打倒外国帝国主义的任务沒有呢？沒有，沒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有解决。它把这一任务交给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执行去了。它只是初步推动了革命群众去反对帝国主义以结束自己的行程并把这个事业交给未来。

应当认为革命的第二阶段也不能完全解决驱逐帝国主义者们的任务。它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这样做是为了把这个事业交给中国革命的下一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去完成。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难道大家不知道在我国革命史上也有过类似的事实（虽然环境不同、情况不同）？难道大家不知道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没有完全解决自己的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而把这个任务交给革命的下一阶段即交给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才完全地彻底地解决了根除封建残余的任务？因此，如果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不能完全完成土地革命，如果革命的第二阶段在推动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并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封建残余之后把这个事业交给革命的下一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去完成，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只会有利于中国将来的苏维埃革命。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当革命运动的中心显然已由广州移到武汉，并且除了武汉的革命中心以外，在南京又形成了一个反革命中心的时候，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尽量利用机会来公开地组织党、无产阶级（工会）和农民（农民协会），一般说来，公开地组织革命。

就是推动武汉国民党人向左转，转向土地革命方面。

就是把武汉国民党变成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心，变成将来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

这个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



事实表明它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它能够用进一步发展革命的精神教育广大工农群众。

当时反对派要求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維埃。但这是冒险主义，这是冒进，因为立即成立苏維埃在当时就是跳过中国发展的左派国民党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武汉国民党还維持着同共产党人的联盟，还没有在广大工农群众面前丧失威信和暴露自己的面目，还没有把自己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組織的作用全部发挥净尽。

因为在群众还没有根据本身的經驗确信武汉政府不中用、有必要把它推翻的时候，提出成立苏維埃和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就是冒进，就是脱离群众，使自己失去群众的支持，因而也就是断送已经开始的事业。

反对派以为只要他们自己了解武汉国民党的不可靠、不稳固和没有充分的革命性（任何一个政治上有經驗的工作者都不难了解这一点），就足以使群众也了解这一切，就足以用苏維埃来代替国民党，就足以带领群众。然而这是反对派常犯的“极左的”錯誤，他们总把自己的認識和了解当做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認識和了解。

反对派說得对，党应该向前迈进。这是一个普通的馬克思主义原理，不遵守这个原理就不成其为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全部真理是：党不仅要向前迈进，而且要带领千百万群众。向前迈进而不带领千百万群众，事实上就是脱离运动。向前迈进而脱离后卫，不善于带领后卫，就是冒进，就会使群众运动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前进。列宁式的领导其实就在于使先锋队善于带领后卫，使先锋队向前迈进而不脱离群众。然而为了

使先锋队不脱离群众，为了使先锋队真正能带领千百万群众，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使群众自己根据本身的经验确信先锋队的指示、指令和口号的正确。

反对派倒霉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承认这个领导千百万群众的普通的列宁原则，他们不懂得没有千百万群众的支持，单是一个党，单是一个先进的集团，是无法进行革命的，革命归根到底是要由千百万劳动群众来“干”的。

为什么我们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虽然深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却没有提出推翻临时政府并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践口号呢？

因为无论后方或前方的广大劳动群众以至苏维埃本身，都还接受不了这样的口号，都还相信临时政府有革命性。

因为临时政府还没有因支持后方和前方的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和威信扫地。

为什么列宁痛斥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提出立即推翻临时政府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的巴格达齐也夫集团呢？

因为巴格达齐也夫的企图是一种危险的冒进，使布尔什维克党有脱离千百万工农群众的危险。

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巴格达齐也夫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的致命伤。

季诺维也夫说我谈论巴格达齐也夫主义是把现在的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混为一谈。这当然是废话。第一、我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自己就已经附带说“这里的比拟是有条件的”，“我做这个比拟是附有一切保留条件的，如果注意到当前中国的形势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的差别，那就会看出这一切保留条件都是必要

的”<sup>①</sup>。第二、如果断言在說明某一国家的革命中的某些派別和某些錯誤时完全不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相比拟，那就太荒謬了。难道一个国家的革命不能向其他国家的革命（即使这些革命不是同一类型的）学习嗎？这样，还要革命科学干什么呢？

实际上，季諾維也夫否认革命科学有存在的可能。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一个时期曾經斥責齐赫澤、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等人，說他們是实行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中的“路易·勃朗主义”，难道这不是事实嗎？只要看一看列宁的《路易·勃朗主义》<sup>②</sup>这篇文章就会明白，列宁虽然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和我們的十月革命不是同一类型的革命，但他在說明十月革命前某些活动家的錯誤时还是广泛地引用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来做比拟。既然可以談論十月革命前的一个时期齐赫澤和策烈铁里的“路易·勃朗主义”，为什么不能談論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的“巴格达齐也夫主义”呢？

反对派断言武汉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但是，季諾維也夫当时为什么断言“必須用一切办法帮助”武汉国民党，使它成为反对中国卡維涅克之流的中心呢？为什么是武汉地区而不是别的什么地区成了土地运动最发展的中心呢？正是武汉地区（湖南、湖北）在今年年初是土地运动最发展的中心，这难道不是事实嗎？为什么那个沒有群众性的土地运动的广州可以称为“革命根据地”（托洛茨基），而已經开始并发展了土地革命的武汉地区倒不能算做革命运动的中心和“根据地”呢？既然如此，为什么反对派还要求共

①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卷第322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四卷第14—17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产党留在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内呢？难道反对派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是主張同“反革命的”武汉国民党成立联盟嗎？反对派怎么会这样“健忘”和糊塗呢？

反对派看到同武汉国民党的联盟时间不长就幸灾乐禍，断言共产国际沒有把武汉国民党可能垮台这一点警告中国共产党人。几乎无须证明，反对派的幸灾乐禍只是证明他們政治上的破产。反对派大概以为在殖民地国家中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应当是永久的。然而只有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淨淨的人才会这样想。如果在中国封建主和帝国主义现阶段比革命更有力量，如果这些敌对力量的压力使武汉国民党向右轉并使中国革命遭到暫时的失败，那也只有感染了失败主义情緒的人才会因此而幸灾乐禍。至于反对派断言共产国际沒有把武汉国民党可能垮台这一点警告中国共产党，那是反对派武庫里現在大量儲存的一种慣用的誹謗。

让我引证几个文件来駁斥反对派的誹謗。

第一个文件（一九二七年五月）：

“現在国民党对内政策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农村中的全部政权归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为口号，在各省尤其是在广东有系統地扩展土地革命。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就在于此。在中国建立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軍事大軍的基础就在于此。实际上，沒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否則就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①……

必須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揮人員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軍，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必須在蔣介石的后方及其部队中加强瓦解工作，援助广东省起义的农民，那里的地主統治是特別难以忍受的。”

第二个文件(一九二七年五月)：

“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沒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將軍們的可怜的玩物。必須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們坚决主張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对譚平山的巡視产生顾虑是有某些根据的。不應該脫离工农运动，而應該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否則就会把事业断送。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領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須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領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領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們坚定起来，或者使他們变成廢物。国民党的現存机构必須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須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領袖来补充它，必須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會員来扩大地方組織。否則，国民党就有脫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險。

必須根除对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动員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約五万的革命工农，編成几个新軍，用軍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揮人員，組織(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軍隊。否則就不能保证不失敗。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沒有别的办法。

組織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

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农的軍官。不能只是劝告。現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須懲辦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他們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拋棄的。”<sup>①</sup>

你們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是預見到事变的，它及时地发出了关于危險的信号，并警告中国共产党人說：如果国民党人不能成为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武汉国民党是会灭亡的。

加米涅夫說中国革命的失敗应当归咎于共产国际的政策，說我們“在中国培植了卡維涅克之流”。同志們，只有存心叛党的人才这样說我們的党。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失敗时期即俄国卡維涅克之流登台的时候，孟什維克就是这样說布尔什維克的。列宁在其《論口号》<sup>②</sup>一文中写道，七月的失敗就是“卡維涅克之流的胜利”。孟什維克当时心怀恶意，硬說俄国卡維涅克之流的出現应当归咎于列宁的政策。加米涅夫是不是也以为一九一七年七月失敗时期俄国卡維涅克之流的出現，应当归咎于列宁的政策、归咎于我們党的政策，而不应当归咎于別的呢？加米涅夫在这方面模仿孟什維克先生們是否体面呢？（笑声）我沒有想到反对派的同志們竟会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

大家知道，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遭到失敗，而且这次失敗比現在中国革命的失敗更为严重。孟什維克当时說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应当归咎于布尔什維克的极端革命的策略。加米涅夫在这里是不是也想仿效孟什維克对我国革命历史的解釋而向布尔什維克橫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②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五卷第173—180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加攻击呢？

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失敗的原因在哪里呢？也許在于列宁的政策，而不在于階級力量的对比吧？

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失敗的原因在哪里呢？也許在于共产国际的政策，而不在于階級力量的对比吧？

怎么能断言某个政党的策略能够取消或轉換階級力量的对比呢？一九〇五年我們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为什么当时我們遭到失敗呢？难道事实不是說明，如果采取反对派的政策，中国革命的失敗就会比实际上所遭到的更快嗎？对于那些忘記了革命期間階級力量的对比而企图只用某个政党的策略來說明一切的人應該怎么說呢？对于这些人只有一句話可說：他們背棄了馬克思主义。

**結論** 反对派最主要的錯誤是：

(一)反对派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二)反对派看不見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間、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之間的差別。

(三)反对派在殖民地国家革命第一阶段如何对待民族資產階級这一問題上背棄了列宁的策略。

(四)反对派不了解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問題。

(五)反对派在先鋒队(党)和后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相互关系問題上違反了列宁的策略原則。

(六)反对派背棄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員會第六次和第七次全會的決議。

反对派大肆吹噓他們在中国問題上的政策，断言如果采取这个政策，現在中国的情形就会好些。几乎无須证明，假如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反对派的反列宁主义的、冒險主义的政策，它就会由于反

对派所犯的极严重的错误而使自己完全陷于绝境。

中国共产党在短时期内从一个五六千人的小集团发展为拥有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将近三百万无产者组织到工会里来；中国共产党把千百万农民从沉眠中唤醒并把几千万农民吸收到革命的农民协会里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整团整师的国民革命军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由愿望变成了事实，——中国共产党在短时期内获得这一切成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遵循列宁所规定的道路、遵循共产国际所指示的道路前进的。

不用说，如果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采取反对派的政策，采取他们的错误意见，采取他们的反列宁的方针，中国革命的这些成就不是根本没有，就是微乎其微。

恐怕只有“极左的”叛徒和冒险主义者才能怀疑这一点。

（见《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卷第9—34页）



## 斯 大 林

# 关于中国問題

——摘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在《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上的演說

在季諾維也夫看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似乎把中国和美国混为一談了。这当然是胡說。在我的报告中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什么把中国和美国混为一談的事。事实上，在我的报告中只是談到中国人民有求得民族統一和从外国羈絆下获得民族解放的权利。我在強調反对帝国主义报刊的問題时曾經說，既然你們，帝国主义者先生們，认为（至少是在口头上）爭取統一和从外国羈絆下获得解放的意大利的民族战争、美国的民族战争和德国的民族战争都是合理的，那末，中国为什么不如这些国家，为什么中国人民沒有求得自己民族統一和民族解放的权利呢？

这就是我在报告中所說的話，我根本沒有談到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任务的問題。

在和資產階級报刊作斗争时这样提問題是否恰当呢？显然是恰当的。季諾維也夫不懂得这样簡單的事理，但是这只能怪他自己愚蠢，不能怪別的。

原来季諾維也夫认为把当时是革命的武汉国民党变成未来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核心的政策是不正确的。試問这有什么不正确呢？武汉国民党在今年年初是革命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嗎？如果当时武汉国民党不是革命的，为什么季諾維也夫大喊“用一切办法支持”武汉国民党呢？如果当时武汉国民党不是革命的，为什么反对派发誓說他們是主張共产党留在武汉国民党內的呢？如果共产党人加入了武汉国民党并且在国民党里有了威信，而他們却不試图拉国民党同路人跟着自己走，也不試試把武汉国民党变成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那末，这样的共产党人还有什么价值呢？依我說，这样的共产党人是一錢不值的。

固然，这个試图并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在現阶段，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主比革命的力量强大，中国革命因此遭到了暫时的失敗。但是，难道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共产党的政策不正确嗎？

一九〇五年俄国共产党人也曾經試图把当时存在的苏維埃变成未来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然而当时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不利，由于沙皇制度和封建主比革命的力量强大，这个試图也没有成功。由此是否應該得出結論說当时布尔什維克的政策不正确呢？显然是不應該的。

其次，季諾維也夫断言列宁曾經主張在中国立即組織工人代表苏維埃。季諾維也夫并且引证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列宁关于殖民地問題的提綱。但季諾維也夫在这里簡直是在把党引入迷途。

在报刊上已經讲过好几次，但是这里还得再說一遍：在列宁的提綱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工人代表苏維埃的問題。

在报刊上已經讲过好几次，但是这里还得再說一遍：列宁在他

的提綱里指的不是工人代表蘇維埃，而是“農民蘇維埃”、“人民蘇維埃”、“勞動者蘇維埃”，而且他特別附帶說明，他指的是那些“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國家。

可以不可以把中國算做“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國家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可以不可以在中國建立農民蘇維埃、勞動者蘇維埃、人民蘇維埃而不先建立工人階級的階級蘇維埃呢？顯然是不可以的。那末，反對派為什麼要引證列寧的提綱來欺騙黨呢？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卷第60—62頁）

## 斯大林

# 关于反对派在中国三个問題 上的政治面貌

——摘自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  
察委员会联席會議上的演說节录：《俄  
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

現在談談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反对派最倒霉的地方在于他們不了解自己在这里胡扯的是什么。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說中談到中国的政策，但是他不肯承认反对派关于中国問題沒有过任何路綫，任何政策。反对派有过摇摆不定，有过犹豫不决，有过反复无常，但沒有过任何路綫。在关于中国的三个問題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問題、苏維埃問題和中国革命性质問題上，我們发生过爭論。在所有这些問題上，反对派都失敗了，因为他們沒有过任何路綫。

关于参加国民党問題。一九二六年四月，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會議通过贊成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決議后一个月，反对派要求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为什么呢？因为被蒋介石的第一次襲击（一九二六年三月）所吓倒的反对派实际上是要求附和蒋介石，想使共产党人从中国各革命力量所进行的斗争中退出来。

但是反对派表面上說，他們要求退出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人不能够参加資产階級的革命組織，而国民党不能不算是这样的組織。可是一年以后，一九二七年四月，反对派又要求共产党人参加武汉国民党。为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呢？难道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已經不再是資产階級的組織了嗎？这里有什么路綫，哪怕是路綫的影子呢？

关于苏維埃問題。在这方面，反对派也沒有过确定的路綫。一九二七年四月，一部分反对派要求立即在中国組織苏維埃以推翻武汉国民党（托洛茨基）。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反对派也要求立即組織苏維埃，然而这是为了支持武汉国民党，不是为了推翻它（季諾維也夫）。这就叫做他們的路綫！并且两部分反对派，托洛茨基也罷，季諾維也夫也罷，都要求組織苏維埃，同时又要求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参加执政党。真是天曉得！要建立苏維埃，同时又要求共产党人参加执政党即参加国民党，——这种蠢事是再蠢的人也想不出来的。这也叫做路綫！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問題。共产国际过去认为現在还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农民土地革命。而反对派对这个问题的意見怎样呢？他們对这个問題从来就沒有过确定的意見。有时他們断言中国不能有土地革命，因为那里根本沒有封建制度；有时他們宣称中国可能有而且必須有土地革命，但是他們又不承认中国的封建残余有重大意义，这就教人不明白，既然这样，又从哪里来的土地革命呢；有时他們断言中国革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爭取关税自主的革命。真是天曉得！

反对派在中国革命的几个爭論問題上的所謂“路綫”就是如此。

这不是路綫，而是犹豫不决，一塌糊塗，完全沒有路綫。

这些人居然也来批評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立場！同志們，这岂不可笑嗎？

托洛茨基在这里讲到了广东的革命运动，讲到了賀龙和叶挺的軍隊，責备我們似乎正在成立新的国民党来領導这个运动。我不来駁斥托洛茨基这种无中生有的誹謗。我只想說南方革命运动的一切事件，如叶挺和賀龙的軍隊从武汉出发，向广东挺进，同农民革命运动結合等等，——这一切事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发动的。托洛茨基是不是知道这一点呢？如果他多少有些知識的話，他是应当知道这一点的。

如果这个运动获有进展，如果中国革命新的高漲成为事实，那末，誰来領導这个运动呢？当然是苏維埃。从前，在国民党兴盛时期，沒有立即成立苏維埃的有利条件，可是現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結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威信扫地的時候，在运动获得进展的情况下，苏維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結在自己周圍的基本力量。誰来領導苏維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即使革命的国民党再次出現于舞台。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設想既可成立苏維埃，同时共产党人又可参加国民党。把这两个不能相容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不懂得苏維埃的本性和使命。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卷第 133—135 頁）

斯大林

##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七日)

《真理报》第二五五号)

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因为它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中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

过去的革命，结局通常都是由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执掌政权。剥削者更换了，剥削仍然存在。奴隶解放运动时期的情形是如此。农奴起义时期的情形是如此。英、法、德三国有名的“大”革命时期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不提巴黎公社，因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扭转历史的第一次光荣的英勇的然而没有成功的尝试。

十月革命根本不同于那些革命。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不是由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而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集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至今所有存在过的被压迫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的政权，组织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中的根本转变，是世

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根本转变，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本转变。

十月革命所以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根据就在这里。

世界各国被压迫阶级所以对十月革命表示深切的同情，把它看做自己获得解放的保障，根源也就在这里。

可以指出几个基本问题来说明十月革命对全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影响。

(一)十月革命卓越的地方，首先是它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战线，在一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推翻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并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被雇佣阶级、被奴役阶级、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升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以自己的榜样来鼓舞世界各国无产者。

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十月革命剥夺了地主、资本家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并把这些东西变成公有财产，因而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对立起来。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资本家的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不变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十月革命夺得了资产阶级手里的政权，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并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因而把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同资产阶级国会制度这一资本主义民主制对立起来。拉法格还在一八八七年就正确地说过，在革命后的第一天，“所有从前的资本家都将被剥夺选



举权”<sup>①</sup>。

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謂現在有可能通过資產階級国会制度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套騙人鬼話。

可是，十月革命并没有而且也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十月革命摧毁了資產階級旧制度以后，就着手建設社会主义新制度。十月革命的十周年，也就是党、工会、苏維埃、合作社、文化組織、运输业、工业和紅軍的建設的十周年。苏联社会主义在建設战綫上显著的成就清楚地說明：无产階級能够在不要資產階級并且反对資產階級的情况下順利地管理国家，能够在不要資產階級并且反对資產階級的情况下順利地建設工业，能够在不要資產階級并且反对資產階級的情况下順利地領導整个国民經济，能够不顾資本主义包围而順利地建設社会主义。

那种认为被剝削者离不开剝削者正如头部和軀体的其他各部离不开胃部一样的陈旧“理論”，并不是古代史上著名羅馬元老梅涅尼·阿格利巴一个人所独有的东西。这种“理論”現在是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政治“哲学”基础，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同帝国主义資產階級結成联盟这一政策的基础。这种带偏見性的“理論”現在是妨害資本主义國家的无产階級革命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这种騙人的“理論”以致命的打击。

十月革命的諸如此类的結果，过去和現在都不能不对資本主义國家內工人階級的革命运动发生重大的影响，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嗎？

共产主义在資本主义國家內不断发展，世界各国无产者对苏

<sup>①</sup> 見波爾·拉法格《革命后的第一天》（見《拉法格文集》一九二五年版第一卷第329—330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联工人阶级的同情日益增长，以及许多工人代表团络绎不绝地到苏维埃国家参观，——所有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说明十月革命所散播的种子已经开始结果了。

(二)十月革命不仅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在“宗主国”内动摇了帝国主义，而且还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后方，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外围，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

十月革命既然打倒了地主和资本家，也就粉碎了民族殖民地压迫的锁链，把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内所有一切被压迫民族都毫无例外地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不解放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的特点就是它在苏联进行的这种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仇视和各民族冲突为旗帜，而是以苏联各民族工人农民互相信任和亲密团结为旗帜，不是为了民族主义，而是为了国际主义。

正因为我国的民族殖民地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在国际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所以向来被蔑视的民族、被奴役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升到了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民族的地位，并以自己的榜样来鼓舞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

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在世界各被压迫国家中、在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时代。

从前，“照例总是”认为：世界自古以来就分成低等人种和高等人种，分成黑种人和白种人，前者没有达到文明境地的能力，注定成为剥削的对象，后者是文明的唯一代表者，负有剥削前者的使命。

现在应该认为这种奇谈被打破了，被抛棄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奇谈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在事实上

表明，那些获得解放而被引上苏維埃发展軌道的非欧洲民族，他們推进真正先进文化和真正先进文明的能力是丝毫不亚于欧洲民族的。

从前，“照例总是”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分离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隔开的方法，使各民族劳动群众間的民族敌視加深的方法，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唯一方法。

現在应该认为这种奇談被推翻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这种奇談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用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方法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根据自願原則并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結成兄弟般的联盟，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世界各国劳动者将来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之內联合的榜样）的存在不能不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

不用說，十月革命的諸如此类的結果，过去和現在都不能不对殖民地和附屬国的革命运动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其他各国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日益发展以及这些民族对苏联的同情日益增长，——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說明了这一点。

安然剝削和压迫殖民地和附屬国的时代已經过去了。

殖民地和附屬国的解放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觉醒的时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时代已經到来了。

（三）十月革命既然把革命种子散播到帝国主义的中心和后方，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宗主国”的势力，动搖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統治，因而也就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本身的生存发生了問題。

既然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由于糾紛

和軍事冲突不可避免，以及由于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大屠杀，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已經变成资本主义腐朽和衰亡的过程，那末，十月革命和一个大国因此而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事实，就不能不加速这一过程，一步一步地破坏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不仅如此，十月革命不仅震撼了帝国主义，同时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即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基地，现在它可以把这个基地作为靠山了。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公开的中心，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中心，现在它能团结在这个中心的周围，組織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了。

首先，这就是說，十月革命使世界资本主义受了一个永远治不好的致命伤。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永远不能恢复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有过的那种“均势”和“稳固”了。

资本主义可以得到局部稳定，可以使自己的生产合理化，可以把国家管理权交给法西斯主义，可以暂时压制工人阶级，但是它永远不能恢复它从前所炫耀的那种“安宁”和“信心”，那种“均势”和“稳固”了，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已經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革命烈火必然时而在帝国主义中心、时而在帝国主义外围燃烧起来，使资本主义的补綴方法一概无效，使资本主义的死期日近一日。这正像有名的寓言中所說的：“尾巴拔出来，鼻子陷进去；鼻子拔出来，尾巴陷进去。”

其次，这就是說，十月革命已經把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力量和比重、英勇精神和战斗决心提到了一定的高度，迫使統治阶级重視它們，把它們看做一个新的重要因素。现在已經不能再把世界劳

动群众看做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盲目人群”了，因为十月革命給他們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并指出前途的灯塔。从前没有一个全世界性的公开的会场可以从那里表明并陈述被压迫阶级的希望和意願，可是現在已經有这种会场了，这就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未必用得着怀疑，如果这个会场被消灭，那末肆无忌惮的黑暗的反动势力就会长期籠罩着“各先进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不能否认，甚至单是“布尔什維克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就牵制着黑暗的反动势力而便利于被压迫阶级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其实就是这个緣故，世界各国剝削者才像野兽一样地仇恨布尔什維克。

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正像从前在封建制度灭亡时期，“雅各宾党人”这一名詞曾經使世界各国貴族胆顫心惊、深恶痛絕一样，現今在资本主义灭亡时期，“布尔什維克”这一名詞也使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胆顫心惊、深恶痛絕。另一方面，正像从前巴黎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代表的基地和学校一样，現在莫斯科是新兴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的基地和学校。对雅各宾党人的仇恨并没有挽救封建制度免于崩潰。对布尔什維克的仇恨也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免于必然的灭亡，——这还用怀疑嗎？

资本主义“穩固”的时代已經过去了，所謂资产阶级制度不可动摇的奇談也一同过去了。

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經到来了。

(四)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經濟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时是意識上的革命，是工人阶级思想上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旗帜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旗帜下誕

生并巩固起来的。因此，十月革命标志着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的胜利，列宁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第三国际对第二国际的胜利。

十月革命在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間，在列宁主义政策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之間掘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沟。

从前，无产階級专政胜利以前，社会民主党能拿馬克思主义旗帜来炫耀，虽然不公开否认无产階級专政思想，但是也絲毫不設法，絕對不設法使这个思想早日实现，——很明显，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做法对于資本主义是沒有任何危险的。当时，在那个时期，社会民主党表面上是和馬克思主义合在一起的，或者几乎是合在一起的。

现在，无产階級专政胜利以后，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出馬克思主义会导致什么結果，馬克思主义的胜利会意味着什么，社会民主党再也不能拿馬克思主义旗帜来炫耀，再也不能向无产階級专政思想献媚，不然就会給資本主义造成相当的危險。社会民主党既然早已丧失了馬克思主义的精神，結果也就不得不离开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公然不諱地反对馬克思主义的产儿，反对十月革命，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階級专政了。

现在社会民主党必然和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而且确实和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了，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誰不全心全意地公开支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階級专政，誰不对本国資产階級进行革命斗争，誰不为本国无产階級专政的胜利創造条件，誰就不能自命为馬克思主义者。

社会民主党和馬克思主义之間已經橫着一道鴻沟。从此以后，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馬克思主义的唯一的代表和堡垒了。

可是問題并不只限于这些。十月革命不仅使社会民主党和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而且更进一步把社会民主党抛到那些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而公开拥护资本主义的人們的陣营中去了。阿德勒之流、鮑威尔之流、維尔斯之流、列維之流、龙格之流、勃魯姆之流这些先生咒罵“苏維埃制度”而贊揚国会制度的“民主”，就是想以此說明，为了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在各“文明”国家保存资本主义奴隶制度，他們現在进行斗争，而且将来依然要进行斗争。

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列宁說得非常对：现在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客是“資产階級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理人”；他們在“无产阶级同資产階級的国内战争”中是必然要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巴黎公社活动家’”的<sup>①</sup>。

不消灭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衰亡的时代，同时就是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衰亡的时代。

十月革命的偉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表明了列宁主义必然战胜世界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

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統治的时代已經完結了。

列宁主义和第三国际統治的时代已經到来了。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卷第 203—212 頁)

<sup>①</sup> 見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二卷第 186 頁)。——《斯大林全集》編者注

## 斯大林論中国革命的重大成就

——摘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員  
会的政治报告(十二月三日)

不难了解，各国法西斯化的政府所施行的这种殘暴压制不能不引起各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和宗主国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革命运动增长的事实，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命运不能沒有决定的意义。

你們自己判断吧。整个地球上十九亿零五百万人口中，有十一亿三千四百万住在殖民地和附屬国，有一亿四千三百万住在苏联，有二亿六千四百万住在中間国家里，只有三亿六千三百万是住在那些压迫殖民地和附屬国的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里。

很明显，殖民地和附屬国的革命觉醒預示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末日。中国革命还没有导致直接战胜帝国主义这一事实对于革命的前途不会有什么决定的意义。偉大的人民革命总是不会在它的发动的第一回合就取得彻底胜利的。这样的革命总是經過米潮和退潮而成长和加强起来的。各国情形都是如此，包括俄国在內。中国情形也将是如此。

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它已經把几亿被剝削被压迫者从长期的沉眠中喚醒并使他們行动起来，它已經彻底揭穿了各系軍閥的反革命性，撕破了那帮效忠反革命的国民党分子的假面具，現



固了共产党在下层民众中間的威信，把整个运动推上了更高的阶段，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被压迫阶级千百万人民中間引起了新的希望。只有瞎子和懦夫才会怀疑中国工人和农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

(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卷第 241—242 頁)

一九六五年 七月 六日